

◇中国伊朗学译丛

元明文献中的忽鲁谟斯

(瑞典) 廉亚明

(德国) 谭 克 著

姚继德 译

译者小序

宁夏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元明文献中的忽鲁谟斯 / 康正明等著. — 银川: 宁夏人民出版社, 2007.12

ISBN 978-7-227-03656-1

I. 元… II. 康… III. IV. I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第 号

元明文献中的忽鲁谟斯

王世福 著

责任编辑

装帧设计

责任印制

宁夏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出版人 杨宏峰

地址 银川市北京东路 139 号出版大厦(750001)

网址 www.nxcbn.com

电子信箱 ncbmail@126.com

邮购电话 0951-5044611

经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 宁夏雅昌彩色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1/6

印张

字数

版次 2007 年 12 月第 1 版

印次 2007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227-03656-1

定价 8.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总序

总序

奉至仁至慈的真主之名

伊朗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国家之一，伊朗文化连续几个世纪，对世界各国的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从信德河岸到尼罗河，从中国到欧洲都留下了伊朗文明的足迹。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伊朗古老文明把亚洲、欧洲和非洲连接在一起，形成了古波斯文明圈。伊朗独特的地理位置，古老的波斯文明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都对其他文明的形成、发展与交流起到了深远影响，波斯文明引起了各国专家学者的关注。伊中两个伟大的文明古国，历史悠久，源远流长，为人类创造了灿烂的文明，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产。有着数千年的丝绸之路，就是伊中两国友谊的最好见证。伊朗和中国曾是亚洲、乃至世界的强国，两国人民开拓的举世闻名的古丝绸之路，是传达两国人民友谊的信使。我们的祖先通过丝绸之路，不仅从事贸易活动，而且还进行文化、艺术、文明、思想、精神和社会的交流，伊斯兰教就是通过这条丝绸之路传入中国的，并对中国文明产生了深远影响。伊朗人民深受中国人民的热爱和尊重，在中



元明文献中的忽鲁谟斯.....

国留下的波斯文明古迹就是最好的历史见证。随着历史的发展,丝绸之路沿线城市虽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时至今日,伊斯兰教和古波斯留下的历史文化遗迹依然清晰可见。从这些历史文化遗迹中,我们可以看到波斯语在这些地区的发展,及其对人们产生的巨大影响。

伊中两国的友好文化关系一直保持到了今天,不过,两国新一代人尚需要相互之间的全面了解和认识。两国在文化、政治、经济、科技等领域的全方位合作,有助于促进两国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在这方面,伊中两国的有关大学和研究机构肩负着重大使命,除加强相互之间的文化交流外,双方应规划长远目标,翻译大量书籍,互相介绍,互相吸收,取长补短,把伊中文化交流推向一个新的高度。毫无疑问,文化的交流发展,将有助于推动两国在工业、贸易、经济等领域的全面发展。

伊朗学已成为一个世界性的研究课题,世界各国热爱伊朗历史文化的专家学者们正在孜孜不倦地从各个角度对伊朗进行广泛研究。在伟大的中国,中国伊朗学专家们用犀利优美的文笔在伊朗古典文学、现代文学、历史和文化诸领域里撰写和翻译了不少专著,丰富了两国的学术殿堂,巩固了伊中两国的文化关系。有鉴于此,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驻华大使馆文化处为了加快多年来已经开始的伊中文化合作,让更多的中国人民了解和认识伊朗文明与文化,与宁夏人民出版社合作出版伊朗学领域的系列学术专著,其中包括《元明文献中的忽鲁谟斯》、《伊朗学在欧洲在东亚》《中国伊朗学论集》。

总序

尊敬的读者《元明文献中的忽鲁谟斯》一书是该丛书的第一本专著，由两位欧洲当代著名汉学家德国马尔堡菲利普斯大学汉学系廉亚明博士 (Dr. Ralph Kauz) 和慕尼黑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葡萄鬼”博士 (Dr. Rodrich Ptak) 撰写而成，是关于元明时代中国与波斯湾主要国家“忽鲁谟斯”国政治、外交、经济、贸易和文化交流史的论著。作者在书中以中国元、明两朝记载中国与波斯湾国家，尤其与伊朗在文化、经济、贸易、政治交往关系的一手文献，特别是明初中国穆斯林航海家郑和七下西洋的航海日志和航海图为基础，撰写了这部专著。其他两部专著也将随后出版。毋庸置疑，这套中国伊朗学丛书对中国读者了解中伊两个文明古国悠久的历史关系具有重要意义。

在此，我要衷心感谢云南大学伊朗学研究中心主任，尊敬的姚继德博士为翻译、编辑该丛书付出的心血和努力。并对宁夏人民出版社为出版本丛书给予的真诚合作，表示衷心的感谢！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驻华大使馆
文化参赞阿高杰里博士
2007年12月6日于北京



元明文献中的忽鲁谟斯.....

译者小序

这是一部研究元明时期中国与波斯湾地区外交、文化和经济关系史的专著，译者受伊朗驻华使馆文化处委托翻译出版。原文以英文发表在法国著名学术刊物《法兰西远东学院学报》2001年总第88期上（Bulletin de l'école Française d'Extrême-Orient, 88, 2001, Paris）。两位作者都是欧洲目前颇有影响的汉学家和东方学家，他们分别是德国马尔堡汉学系的廉亚明博士（Dr. Ralph Kauz）和慕尼黑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葡萄鬼”博士（Dr. Roderich Ptak）。其中第一作者廉亚明博士曾于20世纪90年代末在南京大学历史系作访问研究，回国后一直致力于中国与波斯湾地区古代文化交流关系的研究，本文即其力作之一。该文发表不久，便被伊朗学者麦赫尔达德·瓦赫达提翻译为波斯文，在伊朗发表。论文对元末明代中国与当时波斯湾口古国忽鲁谟斯（Hormuz，今伊朗南部波斯湾口的霍尔木兹甘省一带）的外交、贸易关系，尤其是明初郑和下西洋与波斯湾地区的密切联系，依据中国和西方史料进行了完整的梳理。

译者小序

研究，并对柔克义（W.W. Rockhill）、夏德（Friedrich Hirth）和伯希和（Paul Pelliot）等西方已故的老一辈汉学家的个别观点进行了纠正，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2006年3月云南大学伊朗研究中心成立时，伊朗驻华使馆文化参赞阿高杰里博士（Dr. Javad Aghajari）建议我将之逐译出来，在中国发表。

廉亚明博士与译者曾于2003年年初，因我校与伊朗德黑兰大学、菲尔多西大学和拉扎维大学联合举办“首届赛典赤·瞻思丁研究国际学术会议”，经南京大学元史研究室主任刘迎胜教授的介绍，有过学术联系，算是学术同道。经我联系，他于2006年年初很快就寄来了该文的抽印本一册，并表示非常乐意由我翻译后在中国发表。我尚未开译，2007年年初，伊朗驻华使馆文化参赞阿高杰里博士寄来了一份他们委托北京一位学者由波斯文转译的中文译稿，嘱我审校。我对照英文原著浏览其稿，错误之多，不忍卒读。我以为致错原因有二：原著主要依据中国元、明文献典籍进行分析，伊朗译者不识中文，且对中国古代与波斯湾地区的交往历史也不甚了解，尽管在翻译中结合伊朗古代文献作过少量注释，但仍错讹百出。北京译者仅据波斯文译文翻译，故而成此结果。因此，我提出仍由我根据英文原文重新翻译后，再行出版。阿高杰里参赞同意我的建议，经我在暑期里的集中工作，终于将之翻译完毕，现提交出版，以饕国内学界。

在此需作几点说明：译者曾将初译稿寄给廉亚明博

元明文献中的忽鲁谟斯.....

士审读，他又委托其助手何墨凯先生（Markus Hofmüller）对译稿进行了认真校对，改正了个别错讹和遗漏，补译了注释和参考文献中的部分法、德、葡文文献，俾译文更臻完善，特此致谢。其中仍有少量的波斯文和阿拉伯文（均为拉丁转写）文献，除译者熟悉者外，均保留原文。此外，文中涉及的西方汉学家的名字，凡国内学界有定译，或其本人有通行的汉文名号者，译文中都作了采用，余者即遵学术通例，保留其原文，未作音译处理。

尽管如此，囿于学力，译文中仍存错讹，尚望学界先进不吝赐教。

姚继德

2007年9月16日于昆明素菲斋

目
录

总 序	阿高杰里 1
译者小序	姚继德 4
前 言	1
中文以外的文献选	8
忽鲁谟斯的地缘政治及其在国际贸易中的地位 ...	17
中国文献中关于忽鲁谟斯的首批报告	30
明初忽鲁谟斯与中国之间的往来使节	46
明代文献中的忽鲁谟斯	69
《瀛涯胜览》和《西洋番国志》	70
忽鲁谟斯的地理位置	71
人民与风俗	71
环境和物产	77
结束语	80
《星槎胜览》	82
环境和风俗	82
人 民	84
贸易和物产	84
《寰宇通志》和《大明一统志》	85
《西洋朝贡典录》	87
其他文献	88
地方编年史	93
文学著作	93
综合性的史地文献	94
百科全书类文献	95
编年史文献	95
航海日志与航海图	96
结 语	102
附录一：人名、地名、机构名及术语名录	105
附录二：中文图书文献名录	114
附录三：西文图书文献名录	119

前言

伊朗忽鲁谟斯 (Hormuz) 是郑和最后四次下西洋的重要目的地之一。^① 在他第四、五、六次船队停泊过的其他港口和国家的名字被记载之前, 忽鲁谟斯的名字已出现在刘家港和长乐的两通著名碑铭中, 这表明忽鲁谟斯的重要性。^② 郑和的船队通常是在冬季抵达忽鲁谟斯, 在那里大约停留两个月, 从 1 月中旬到 3 月中旬, 当西南季风到来时, 他们便踏上归国的航程。比如郑和的最后一支船队于 1433 年 1 月 17 日抵达忽鲁谟斯, 同年 3 月 9 日自忽鲁谟斯起锚返航, 船队快速地经过印度

① 忽鲁谟斯 (今霍尔木兹省一带) 的正确拼写是 Hurmuz 或 Hurmuz, 但在本文中拼写为 Hormuz。

② 马欢著, 米勒斯 (J. V. G. Mills) 编译《瀛涯胜览》(1433), 哈克路特学会号外系列丛书第 42 号 (剑桥: 剑桥大学出版社 1971 年版), 第 12-18 页 (米勒斯简称为《马欢》); Jan J.L. Duyvendak 著《15 世纪初中国人海上探险日期考》, 载《通译》34 卷 (1938) 第 343-355 页 (在第 345、347、348、350、353 和 354 页都提到忽鲁谟斯)。另可参见: Teobaldo Fiesli 著, D.L. Morison 译《中世纪时的中国与非洲》, 收《卡斯非洲研究书库》总第 144 号, 伦敦: Frank Cass, 1972 版, 第 56-65 页。另见 Dominique Lelievre 著《龙之光: 明初海上大探险》中的《导言》(巴黎: 法兰西帝国书局 1996 年版) 第 95-98 页。这两通碑铭在中国现代许多著作中广为转引。



元明文献中的忽鲁谟斯.....

洋和南中国海，历时近 5 个月的航行后，于当年 7 月 22 日回到北京。^①

中国官员在忽鲁谟斯逗留期间，必定同当地上层人士有过频繁交往。由此使得忽鲁谟斯诸王获得了有关中国商业实力及朝贡贸易制度性质的许多知识。因此他们多次遣使前往中国，这些使节在明代文献中被称为“贡使”，这些贡使将马匹及方物送给中国宫廷。与此同时，中国人也认识到了忽鲁谟斯在与中东和地中海地区贸易中所发挥的直接作用。

位于波斯湾口的忽鲁谟斯是西亚和阿拉伯海周边国家之间航行船只停泊的良港。从古代的萨珊王朝 (Sasanians) 到 11 世纪时，西拉夫 (Siraf) 港在国际贸易中具有类似的地位。西拉夫是萨珊王国最重要的港埠，曾一度成为伊朗南方最富的城市之一。12 世纪时，基什岛 (波斯文为 Kish) 逐渐取代西拉夫成为波斯湾的主要港口。基什岛取代西拉夫以及后来忽鲁谟斯取代基什岛，在很大程度上是因其地理位置所致：基什岛位于西拉夫东南，靠近霍尔木兹海峡。因此，它可以切断所有前往西拉夫船只的航道，而忽鲁谟斯则可以监督所有驶往基什岛的船只，因为它位于基什岛的东部。

在两个多世纪中，忽鲁谟斯王国一直保持着在贸易

① 祝允明著《前闻记》，收《丛书集成初编》第 290 号（上海：商务印书馆 1966 年版），第 72 等页。参见伯希和 (Paul Pelliot) 《郑和下西洋考》(Les grands voyages maritimes chinois au début du xve siècle)，刊《通报》卷 30 (1933)，第 305-311 页，以及米勒斯著《马欢》，第 17-18 页。

方面的重要地位。它后来的衰落主要是由外部原因引起的。在 16 世纪初刚在伊朗执政的萨法维王朝 *Safavides* 想征服忽鲁谟斯。他们甚至曾一度欲同葡萄牙人合作，但此计划未付诸实施。最终在 1515 年（回历 921 年）时，阿封苏·德·阿尔布库尔克（*Alfonso de Albuquerque*）控制了忽鲁谟斯。虽然忽鲁谟斯在“埃斯塔多印度政权”（*Eestado da India*）统治下没有恢复往日的地位，但它仍是印度至近东航线上的重要港口。17 世纪初，葡萄牙人的统治终结，此时萨法维人又与东印度公司联手。可是到了 1622 年（回历 1032 年）忽鲁谟斯的统治权发生更易之际，绝大多数建筑物遭到破坏，萨法维人遂决定将所有船只的航行路线转到忽鲁谟斯岛对面位于伊朗本土的古姆鲁（*Gomru*）。古姆鲁被新主人称之为阿巴斯港（*Bandar' Abbas*），它的崛起最终导致了忽鲁谟斯地位的衰落。今天的忽鲁谟斯不过是一个荒岛而已。^①

在中国文献，尤其是元明时期的文献中，提到忽鲁谟斯的资料极其丰富。本书将对所有重要的原始文献加以讨论，对元明之前为数不多的报告和著作虽也涉及，

① 参阅：Ronaed Ferrier 著《14 世纪中叶到萨法维朝末期的贸易》，收 Peter Jackson 和 Laurence Lockardt 主编的《剑桥伊朗通史》卷 6；《帖木儿朝和萨法维王朝》（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426 页，以及 Michael N. Pearson 主编《印度洋区域的香料·导论》，收《扩张中的世界》第 11 号（Aldershot: Ashgate publishing Ltd, 1996），第 15-37 卷，第 29-30 页。关于阿巴斯港，可参阅 Laurence Lockhardt 撰写的“忽鲁谟斯”（*Hormuz*）条，载《伊斯兰百科全书》，莱顿：E.J.Brill，1960 年第 2 版，第 583 页。

元明文献中的忽鲁谟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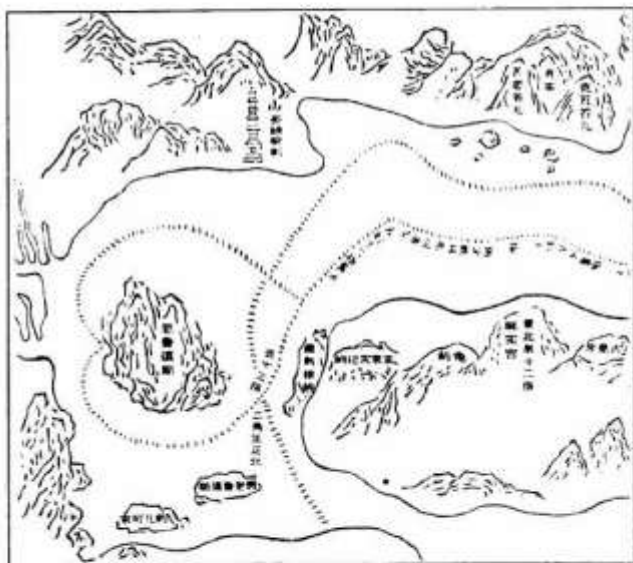
但只作简要提及，旨在反映出中国对忽鲁谟斯国及其人民的“认识”。我们将精选出新的历史、社会或经济资料，这些资料可以从米勒斯（J.V.G.Mills）及其他学者杰出的翻译作品中获得，进而将中国著作中的可靠记载，与现当代欧洲人和伊朗人的论述资料加以比较，通过比较来展示中国著作家们对忽鲁谟斯的看法。然而，本书未对这些叙述文献的风格和范式进行分析。这类分析有待于另行组织。^①



现代地图



① 葡萄牙 (Roderich Ptak) 著《两份元代文献〈岛夷志略〉与〈异域志〉中记载的海洋亚洲的形象》(下称《海洋亚洲的形象》), 刊《宋元研究》25 卷 (1995), 第 47-75 页。



茅坤地图上的忽鲁谟斯

简言之，我们在进入中国文献的分析之前，首先将通过研究具有重要意义的伊朗文献（包括对早期阿拉伯文献的综合观点）来开始这项工作，对忽鲁谟斯的历史和社会进行简要阐述。在“中国章”里，我们将首先考虑元代的文献，其中《岛夷志略》最为重要。该书介绍了名叫“甘里里”的地方，柔克义（W.W.Rokhill）认为是科摩罗群岛（Comoro Islands），但藤田丰八（Fujita Toyohoshi）、沈曾植、苏继庠则认为该地名应为忽鲁谟

元明文献中●忽鲁谟斯.....

斯。^① 接下来的一章是有关忽鲁谟斯和中国之间在明代互派使节的记述。该章主要根据《明实录》中记载的资料，也涉及彼此的“认识”问题，其关注的重点是（忽鲁谟斯国）贡使来华及中国使团的年代。重编该年表是本书第二项主要任务。后面的章节则着重讨论中国古代及明朝中期的历史、地理书上的记述。在此，“认识”问题再次具有重要意义。研究中涉及的文本，包括马欢的《瀛涯胜览》（首序时间为公元1416年/回历819年，次序时间为公元1444年/回历836年，编后记时间为公元1451年/回历837年，但总的标注为公元1433年），费信的《星槎胜览》（序言时间为公元1436/回历840年），二书都是第一手资料，由随同郑和下西洋的书记官记写而成。^② 巩珍也是郑和船队的下西洋官员，其著作《西洋番国志》前言时间为公元1434年（回历

① 见柔克义撰《14世纪中国与印度洋群岛和沿海的关系及贸易》，刊《通报》第15期（1914），第419-447页，第16期（1915），第61-159页，第236-271页，第374-392页，第435-467页，第604-626页。但本文只涉及《通报》第16期，有关“甘埋里”章节的翻译在第623页。汪大渊著、苏继麻校释《岛夷志略校释》，中外交史籍丛刊本（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364-369页。苏氏的校释最佳，本书将采用之。另外几位学者也认为“甘埋里”即“忽鲁谟斯”，见朱杰勤《中国和伊朗历史上的友好关系》，刊《历史研究》1978年第7期，第72-82页。

② 《明实录》（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96年版）133卷。当代的几部著作也为研究该文献提供了便利，如李国祥等编《明实录类纂·涉外史料卷》（武汉出版社1999年版），渡边宏石氏《〈明实录〉所记明代来华贡使地域分类索引（1368-1466）》，刊《东洋文库》第33辑（1975），第285-347页。

837年),其正文与马欢《瀛涯胜览》一书非常相似。^①这些文献及后来的著作,如《殊域周咨录》、《西洋朝贡典录》及《明史》中的忽鲁谟斯章,只是偶获关注,因为这些资料都来源于古代的历史地理文献和《明实录》。^②本书最后一章是关于中国航海志和海图中的忽鲁谟斯,意在使以前各章节的论述达到令人满意的结果。本章还将证明忽鲁谟斯是明初航海家们在沿途停泊的一个主要港口。

① 见马欢著、冯承钧校释《瀛涯胜览校注》(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第63~68页,以及前引米勒斯《马欢》,尤其是“马欢及其著作”部分,第34~36页,第165~172页;费信著、冯承钧校释《星槎胜览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54年版),第1~7页及其《前记》,第35~37页;亦见费信著、米勒斯译、葡萄牙鬼校注《星槎胜览》(下称费信《星槎胜览》),刊《南中国与海洋亚洲》第4辑(威斯巴登:Harrassowitz Verlag 1996年版),第9~3页,第70~71页。巩珍著、向达校释《西洋藩国志》,《中外交通史籍丛刊本》(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2版),第1~4页,第41~44页。关于每本书的简注和编辑史,可参见:Wolfgang Franke著《明代史文献导论》(吉隆坡、新加坡:马来亚大学出版社1968年版),第220、222页,以及Donatella Guida著《南洋的形象——明末史书中的记载和成见》(Immagini del Nanyang. Realtà e stereotipi nella storiografia cinese verso la fine della dinastia Ming) Opera Universitaria, Dipartimento di Studi Asiatici, Istituto Universitario Orientale Napoli, Serie didactica 2(那不勒斯:1991年版),第62~70页。

② 张廷玉等纂《明史》(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326卷,第8452~8453页(本书以下涉及的所有正史,均以中华书局本为准)。黄省曾撰、谢方校注《西洋朝贡典录》,《中外交通史籍丛刊本》(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106~111页。严从简撰、余思黎校注《殊域周咨录》,《中外交通史籍丛刊本》(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318~320页。

元明文献中●忽鲁谟斯.....

中文以外的文献选

忽鲁谟斯在整个中世纪末期虽未获得完全独立，但它却享有高度的自治。其首领是从 13 世纪至 16 世纪统治波斯王室成员。正式的隶属关系主要以纳税的方式来体现，但它向帖木儿王朝及其他大国的进贡表明，忽鲁谟斯和强大的内地政权间存在着经济合作。因此，臣属与合作是相互联合的需要。显然大部分波斯地方史编纂者认为这种情况是正常的，他们都以普通的话题来讨论忽鲁谟斯，而未给予特别或过多的重视。

鄂法兰 (Fran.Jean Aubin) 是第一位完全承认忽鲁谟斯在欧洲人进入之前在阿拉伯海和波斯湾社会发挥独特作用的现代学者，他也是第一位关注忽鲁谟斯与其宗

主国之间特殊关系的人。^①我们在以后的段落中将会频频引用他的论述。

可遗憾的是，没有任何忽鲁谟斯地方史在当代保留下来。在公元 1350 年（回历 751 年）之后，由忽鲁谟斯国王土兰沙（Turanshah）编撰的一部《王书》（Shahnameh），可能在公元 1622 年（回历 1023 年）的战争中被英国人和萨法维人毁坏，但佩德鲁·泰克希拉（Pedro Teixeira）将该书的部分内容翻译成了葡萄牙文，

① 鄂法兰（Fran.Jeam Aubin）著《13-15 世纪时期的忽鲁谟斯君王》（Les Princes d'Ormuz du XIIIe au XVe siècle，刊《亚洲学报》（Journal Asiatique）第 241 期（1953），第 77-138 页（第 122-123 页上的“税赋”部分）；鄂法兰著《16 世纪初的忽鲁谟斯国》（Le Royaume d'Ormuz au début du XVIe siècle，刊 Mare Luso-Indicum（1973），第 77-179 页。Valeria Fiorani Piacentini 著《忽鲁谟斯的市场和政权（8-15 世纪末）：一个波斯湾沿岸的文明史》（L'emporia ed il regno de Hormaz（VII-fine XV sec.d.Cr）vicende Storiche, problemi ed aspetti di una civiltà costiera del Golfo Persico），Memorie dell'Istituto Lombardo-Accademia di Scienze e Lettere 35.1（米兰：Istituto Lombardo di Scienze et Lettere，1975），这是另一部重要著作，尽管只简要提到忽鲁谟斯。

元明文献中●忽鲁谟斯●

这一葡萄牙文著作则成为后来许多研究的起点。^①因此，在本书中波斯文的忽鲁谟斯史料将被更多地使用，我们将提到的有如下重要文本：

1) 在 13 世纪（回历 7 世纪）统治克尔曼（Kirman）的《凯拉赫塔人历史》（The History of the Qarakhita'i），忽鲁谟斯曾长期向其称臣纳贡。这部历史由纳速拉丁·克尔曼尼（Nasir ad-Din Kirmani）所撰。^②值得注意的是，忽鲁谟斯从 10 到 13 世纪初（回历 4-7 世纪）曾是克尔曼和锡斯坦（Sistan）两省的主要港口。^③

① 鄂法兰著《13-15 世纪时期的忽鲁谟斯君王》，第 79 页；Pedro Teixeira 著，William F. Sinclair 译，Donald Ferguson 作注、序；《泰克希拉旅行纪及其〈忽鲁谟斯列王〉和〈列王纪〉精粹》（下称《泰克希拉旅行纪》），伦敦：Hakluyt Society 1902 年版，第 90 页注释 1（导言），第 153-195 页。是书包括失传的编年史简编，由卡斯帕尔·达·克鲁兹（Gaspar da Cruz）主编，他是多米尼加学派的一个僧侣，曾于公历 1565 或 1566 年（回历 972 或 973 年）在忽鲁谟斯建了一个修道院（请参阅 256-267 页及 256 页注）。该文最新的葡萄牙版本，见：Frei Gaspar da Cruz 著，Rui Manuel Loureiro 主编《中国事件报道》（Fratado das Coisas da China [Evora' 1567-1570]），里斯本：Edições Cotovia and Comissão Nacional para as Comemorações dos Descobrimentos Portugueses，1997，第 267-279 页。后来的两篇论文是：Paul Schwarz 著《忽鲁谟斯》，刊《Zeitschrift der Deutschen Morgenländischen Gesellschaft》68 卷（1914），第 531-543 页，及 Bertold Spuler 著《蒙古人在伊朗伊儿汗王朝（1220-1350）的政策、统治和文化》（柏林：Akademie-Verlag，1968 年第 3 版，第 147-152 页）。

② 阿巴斯·艾杰巴尔（Abbas Eghbal）编《尊敬的陛下之珠钿》（Simt al-ula li-l-hadrati l-ulya'）（下称《陛下之珠钿》），德黑兰：Shirkat-i sihami-yi zāp 出版社，伊朗历 1328 年/公历 1949 年版。

③ Paul Schwarz 著，《中世纪阿拉伯舆地书中的伊朗》（Iran in Mittelalter nach dem Arabischen Geographen）2 卷，（希尔德斯海姆及纽约：Georg Olms Verlag，1969），第 242-243 页。

2) 蒙古人从未占领过忽鲁谟斯，但有关蒙古人出现在伊朗的一部重要著作《瓦萨夫编年史》（The Chronicle of Wassaf），对研究忽鲁谟斯历史非常重要。它叙述了从伊儿汗王朝（Ilkhanides）到公元 1323 年（回历 723 年）的历史事件。^①

3) 帖木儿王朝（Timurides）从公元 14 世纪（回历 8 世纪）末占领伊朗时期出现过多部编年史，但像蒙古人一样，他们也从未统治过忽鲁谟斯。有三部著名的帖木儿朝史书提及忽鲁谟斯：两部由沙米（Shami）和雅兹迪（Yazdi）分别撰写的《凯旋书》（Zafarnamə）及阿卜杜勒·拉扎克·撒马尔甘迪（'Abd ar-Razzaq Samarqandī）的《星槎胜览》和《海洋总汇》（Motale' ol sa' adin va majma' al Bahrin）。在这三部史书中，沙米的史书比其他史书更古老；这部著作的写作完成于 1404 年（回历 807 年）。^②

① 沙哈布丁·阿卜杜勒·沙拉夫·设拉子（被誉为瓦萨夫·哈兹拉特）著，M.M.伊斯法罕尼校注《城邦分析和时代分析》Tajziyat al-amsar wa tazjiyat al-a'sar（孟买：1853 年版；德黑兰：伊本西纳出版社，伊朗历 1339 年再版本，下称《瓦萨夫史》）。

② 内扎姆丁·沙米著，费利克斯·塔维尔（Felix Tauer）校注《凯旋书》（Zafarnamə）2 卷。（布拉格：Orientalni ustav，1937；Staeni Pedagogiche Nakladalestvi，1956（下称《沙米》）；沙拉夫丁·阿里·雅兹迪著，穆罕默德·阿巴斯校注《凯旋书》（2 卷），德黑兰：阿米尔卡证尔出版社 1958 年版（下称《雅兹迪》）；阿卜杜勒·拉扎克·撒马尔甘迪著，M.沙菲校注《星槎胜览》和《海洋总汇》，拉合尔：1941-1949 年版（以下称《撒马尔甘迪》）。关于帖木儿史，请参阅 John Woods 著《帖木儿朝兴起史》，刊《近东研究》第 46 期（1987），第 81-108 页。杰出的史学家哈菲兹·阿卜鲁不在我们的名单中，因为其主要著作《历史精华》（Zubdat at-tawarikh）涉及忽鲁谟斯的内容甚少（与其《地理》相反）。

元明文献中 忽鲁谟斯

但更吸引人的是萨尔甘迪的书。作者于公元 1442 年（回历 846 年）在去印度途中经过忽鲁谟斯，因此留下了许多有关忽鲁谟斯的记录。^①

4) 除了撒马尔甘迪的史书及地方史学家尼姆迪希氏（Nimdihi）于 1499 年至 1501 年之间撰写的编年史之外^②，其他所有编年史只集中谈论政治发展，而没有提供社会和经济全方位的详细情况。此外，这些史料中也没有任何文字提到郑和的船队。只有两份波斯文文献谈到忽鲁谟斯王子同中国明朝的关系。第一份是穆因·德丁·纳坦兹（Mu'in ad-Din Natanzī）《穆因历史选编》（Muntakhab at-Tavarikh-i Mu'in），是穆因·德丁·纳坦兹于 1414 年 10 月 7 日献给帖木儿国王沙赫拉赫（Shahrakh）的著作。^③该书提到，中国皇帝寄给忽鲁谟

① 《撒马尔甘迪》，第 764-771 页，第 842-846 页；还可参阅：Etienne Quatremère 编译《考波斯文著作〈Matla-assaadein ou-madjma-albahrein〉及其中的两位苏丹沙洛克和阿卜·赛德的历史》（Notice de l'ouvrage persan qui a pour titre: Matla-assaadein ou-madjma-albahrein et qui contient l'histoire des deux sultans Schah-Rokh et Abou Said），刊 Extrait des notices et extraits des manuscrits de la bibliothèque du roi 14.1（巴黎：1843），第 429-493 页。

② 尼姆迪希著《马哈穆德·沙西的故事》（Tabaqat-i Mahmud-Shahi），请参阅：鄂法兰《16 世纪初的忽鲁谟斯国》，第 84 页；鄂法兰著《尼姆迪希的生活及其著作》（Indo-Islamica I, la vie et l'œuvre de Nimdihi），刊《Revue des Études Islamiques》第 34 期（1966），第 61-81 页。

③ 穆因·德丁·纳坦兹著，鄂法兰校注《穆因历史选编》，德黑兰：哈亚姆书店 1957 年版（下称《穆因历史选编》）。关于此书复杂的修史过程，请参阅 Woods 著《帖木儿朝兴起史》第 89-93 页。

斯王子巴赫曼沙 (Bahman Shah, 他正确的名字应是古特布·丁·塔赫姆坦 Qutb ad-Din Tahamtan, 约从 1400 年至 1417 年间摄政) 一些书信。^① 这种记述引出许多问题, 下面将对此进行讨论。^② 第二份文献是由贾法尔·本·穆罕默德·本·哈桑 (Jāfar ben Mohammad ben Hasan) 撰写的《编年史》, 也简称为《贾法尔史》(Tarikh-i Jāfar) 或《卡比尔史》(Tarikh-i Kabir)。该书记载的事件截止到 1446 年。^③ 主要记载了帖木儿死 (1405 年) 后的事件, 但有一章是关于忽鲁谟斯王子的, 其中简要提到中国船只在赛弗丁·马哈尔 (Seif al-Din Mahār) 政权时 (约 1417~1436 年) 驶抵忽鲁谟斯。与此有关的部分译文, 可参阅辛兹 (Walter Hinz) 的文章, 此文是根据俄国东方学家巴尔托德 (Wilhelm Barthold) 的手稿撰写的。^④

① 鄂法兰著《16 世纪初的忽鲁谟斯国》, 第 129-131 页注释 313。

② 纳坦兹著《穆因历史选编》, 第 18 页; 鄂法兰著《16 世纪初的忽鲁谟斯国》, 第 115 页。

③ 此书尚未校订, 原稿保存在圣彼得堡, 弗莱堡大学东方学会有其微缩胶片。我们要特别感谢瓦尔内尔·恩德教授 (Werner Endé) 提供的相关部分复印件。下称《贾发尔史》(Tarikh-i Jāfar)。

④ Shiro Ando 著《帖木儿朝的埃米尔——14-15 世纪中亚部落贵族的研究》(Timuridische Emire nach dem Mu'izz al-ansab, Untersuchung zur Stammesaristokratie Zentralasiens im 14. und 15. Jahrhundert) 收 Islāmkundliche Untersuchungen 第 153 辑 (柏林: Klaus Schwarz Verlag, 1992, 第 8 页; Abbas Ziaryab《卡比尔史》中论帖木儿的后继者的报道》(Der Bericht über die Nachfolger Timurs aus dem Ta'rikh-i kabir des Ga'far ibn Muhammad al-Husaini, 美因兹, 1960; 博士论文: Walther Hinz 著《帖木儿朝历史的原始资料研究》(Quellenstudien zur Geschichte der Timuriden), 刊 Zeitschrift der Deutschen Morgenländischen Gesellschaft 第 90 期 (1936, 第 379-383 页。



元明文献中忽鲁谟斯.....

在此我们将转而简要地谈谈阿拉伯文的各种不同的资料。早期的阿拉伯文献经常谈到的是旧忽鲁谟斯，即靠近米纳布（Minab）的一个大陆城市。该港口直到加隆岛（Jarun）取而代之前，一直都是忽鲁谟斯的首都。^①有关旧忽鲁谟斯的情况，可以在伊本·胡尔达兹比赫（Ibn Khurdadhbih）的史书《道里邦国志》（公元9世纪）中找到。他在书中描述了自巴士拉（Basra）到中国的道路，并强调了旧忽鲁谟斯是克尔曼的贸易中心。此处，他还提到了旧忽鲁谟斯的坎儿井和椰枣树，以及如同绝大部分编年史书中提到的难以忍受的酷热。^②有关古代忽鲁谟斯的更多的信息，我们还可以从伊斯塔哈里（Istakhari）、穆格达希（Muqadassi）及其他人的著作中获得，比如商人的房舍和仓库，分布在城市周围的乡村，频繁举行的集市，市中心有一座主清真寺等诸如此类的信息。^③

所有这些阿拉伯文记述的年代都非常古老。这些资

① 当今伊朗史学界对中世纪忽鲁谟斯历史的研究微不足道，在此只提一文，因其还涉及阿拉伯地理学家马利亚姆·米尔·艾哈迈迪著《古代阿拉伯舆地书中的忽鲁谟斯岛》（Jazireh - yi Hurmuz dar mutun-i jughrafiya'i wa tarikhi-yi qadim），刊《地理研究季刊》卷5.2（1990/1991），第101-123页。

② Schwarz著，《中世纪阿拉伯舆地书中的伊朗》，第242-243页。

③ “伊斯塔哈里”（Istakhri）和“穆格达希”（Muqadassi）（10世纪下半叶），同《中世纪阿拉伯舆地书中的伊朗》一书，第243页。此外，可参见Guy Le Strange著《东方哈里发的国土》（The Lands of the Eastern Caliphate），伦敦：1905年初版，1966再版本，第318-319页。

料虽然十分有趣，但却不能把它们作为调查元明时代相关著作的起点。元明时期的文献应当同后来的文献，诸如萨马尔甘迪的文献，以及著名的《马可·波罗行纪》、《伊本·白图泰游记》、奥多里科（Odorico of Pordenone）、阿法纳桑吉·尼基亭（Afanasanj Nikitin）及其他人的著作相比较。这些后来的文献中的许多细节要素都可在中国当代和近现代史书中发现。最后还有葡萄牙文的编年史，这些葡萄牙文编年史虽然写于 16 或 17 世纪，但包含了许多早期发生的事件，其中包括 15 世纪的政治、社会和经济状况。

如前所述，波斯编年史既未提到中国人到达忽鲁谟斯之事，也未谈及从忽鲁谟斯前往中国或其他方向的许多航行。但在非中文文献谈及亚丁（Aden）的例子中，倒是提到许多也门拉苏里王朝（The Rasulid Monarchy）与明朝初期关系的详细情况。^① 这事可能纯属偶然，或者反映了这样一种事实：即亚丁对于中国的价值大于忽鲁谟斯，或者波斯作家认为中国在波斯湾地区的影响不

① R.B.Serjeant 氏《13-16 世纪也门的商贾与贸易》，收 R.B.Serjeant 和 G. Rex Smith 编《南阿拉伯地区的社会与贸易》（Aldershot: Ashgate publishing Ltd, 1996），第 1 条，第 61-82 页。见 Denys Lombard 和鄂法兰主编《13-20 世纪印度洋和南中国海的亚洲商人》（Marchands et homes d'affaires dans L'Océan Lkdieu et la Mer de chine 13e- 20e siecles），Ports, routs, trafies 第 29 辑（巴黎: Editions de l' École des Hautes Études en Sciences Sociales 1988），K.N.Chaudhur 著《伊本·塔嘎里·伯迪记载的亚丁和吉达的中国海船考》，刊《皇家亚洲学会会刊》第 1 期，（1989）第 112 页。

元明文献中●忽鲁谟斯.....

大。但无论属于哪种情况，要描绘出 14 世纪至 15 世纪初的中国与忽鲁谟斯的交往，以及忽鲁谟斯在当时波斯湾所处的地缘战略环境的蓝图，我们仍需要从以下三类文献——中国文献、各种欧洲文献及波斯文著作中零星存在的文献的综合分析中得以实现。

忽鲁谟斯的地缘政治 及其在国际贸易中的地位

与波斯湾北岸平行的绵延不断的山脉，阻碍了伊朗大陆沿海各大城市的发展。在 11 世纪之前，西拉夫则是唯一的一个例外。如前所述，西拉夫扮演着萨珊王朝主要港口的角色。在阿拉伯人推翻萨珊王朝后，巴士拉成为西拉夫附近的又一重要港埠。但远洋海船大多不去沿岸各港，而宁肯去群岛中的某个岛屿。因此，一些地方如哈拉克（Khark）、拉万（Lavan）、基什（Qais）、格什姆（Qishm）等在海上贸易中更占有重要地位，这些地方看来比较安全，且位于或靠近波斯湾的主要航道上^①。忽鲁谟斯岛又叫做加隆岛（Jarun）^②，则是其中又一个例子，该岛于 1300 年时成为了忽鲁谟斯国的首都。王国以前的首都位于伊朗大陆的米纳布附近，由于契丹人

① Eckart Ehlers 著《伊朗：基本地理概况》（Iran: Grundzüge einer geographischen Landeskunde）（Darmstadt: Wissenschaftliche Buchgesellschaft, 1980），第 12 页。

② 有关忽鲁谟斯、加隆两个地名的研究情况，可参阅鄂法兰著《16 世纪初的忽鲁谟斯国》，第 80-81 页。

元明文献中●忽鲁谟斯●

的多次入侵而被迫迁都。新首都相当安全，对商业冒险来说具有优越地位。从前被称为“旧忽鲁谟斯”的地方则继续存在，不过它主要作为农业区和夏天的避暑胜地。

忽鲁谟斯岛位于阿巴斯港东南方东部 11 海里处，方圆约 4.8 海里，天气炎热，潮湿多雨；所有到忽鲁谟斯访问的人几乎都抱怨这里的天气炎热。岛屿的地面由含盐的拱形丘陵组成，地表断裂，呈盐山状。^① 泰克希拉明确地描绘了这种含盐的结构：“这些盐在炽热的阳光下凝结，经常是水还在下面流动，我已在盐上行走。”^② 在岛上只有一口井可以利用，用它来浇灌皇家花园，人们被迫从大陆取水，存入水窖中。当葡萄牙人包围忽鲁谟斯酋长国时，它便不复存在了。^③ 由于地不平坦和土壤贫瘠，在岛上没有任何像样的农田，同样在岛上也没有任何值得一提的其他自然资源。这种恶劣环境迫使城里的人们只好依靠进口，因此他们只能通过贸易来保障自己的生活。当忽鲁谟斯在贸易达到高峰时，能够保障大约 5 万人的生活需要。^④

① Ehlers 著《伊朗》，Grundzuge，第 37 页；Ludwig W. Adamec 主编《伊朗历史地名词典》卷 4：“扎黑丹及伊朗东南部”条（Graz Akademische Druck- und Verlagsanstalt，1988），第 181 页。

② Teixeira 著《泰克希拉旅行纪》第 165 页。

③ 鄂法兰著《16 世纪初的忽鲁谟斯国》，第 96-97 页和第 165-166 页；Joao de Barros 著《亚洲——葡萄牙人在东方海域的发行和占领》（Asia. Dos feitos que as poregueses fizeram no descobrimento e conquista dos mares do oriente）（里斯本：Livraria Sam Carlos，1973；据 1977-1978 年版的抄写本），第 2 编，第 2 册，第 5 章。

④ 鄂法兰著《16 世纪初的忽鲁谟斯国》，第 150 页。

忽鲁谟斯从一个满足克尔曼和锡斯坦需要的地方城市，崛起为同国际接轨的一大商业中心。忽鲁谟斯的繁荣取决于它的内部因素。忽鲁谟斯为了保障其经济发展只好为贸易和商业交流提供安定的环境，唯有这样外国商船才会源源不断地在忽鲁谟斯港停泊。保持这种局面需要长期监控伊朗大陆及远至印度的局势变化。在印度方面，保持与喀拉拉港（Kerala）、古吉拉特港（Gujarat）的贸易至关重要。同阿拉伯半岛及非洲沿岸主要港口的联系，同今天的伊拉克地区和通过叙利亚与地中海东部地区进行的贸易亦同样重要。各贸易集团如犹太商人、亚美尼亚商人，其中最重要的是在十五六世纪支配贸易活动的古吉拉特商人，都利用忽鲁谟斯在亚洲各海域建立了贸易网络。从政治角度讲，忽鲁谟斯接受统治伊朗的政权的指令。因此，忽鲁谟斯王子拥有大陆邻居“诸侯”的封号，有时只以实际上的形式，有时则以权力上的形式出现。忽鲁谟斯同伊朗大陆和平友好的状态，则意味着它可以利用拉鲁尔（Lar）、设拉子（Shiraz）、呼罗珊（Kharasan）、伊斯法罕（Isfahan）、大不里士（Tabriz）、苏尔坦尼亚（Sultaniya）商路。^①倘若这样的话，忽鲁谟斯不仅是波斯湾海上航行不可缺少的中途重要港口，而且还是海上和陆上长途贸易的重要交汇地。只有位于亚洲海岸的少数贸易中心才具有这种多功能的地位。

我们可以一下子举出许多导致忽鲁谟斯地位提高的重大事件。尽管蒙古军队在追击花剌子模最后一位国王

^① Fioram Piacentini 著《忽鲁谟斯的商场和政权》，第 88, 93 页。

元明文献中●忽鲁谟斯●

贾拉勒丁·曼克伯尔惕 (Jalal ad-Din Mankubirti) 时已穿过伊朗高原接近忽鲁谟斯的外围, 但他们没有进攻王国。从 13 世纪初以降, 忽鲁谟斯同基什岛为争夺贸易霸权方面展开了竞争。1229 年基什岛短时间被忽鲁谟斯国王赛弗丁 (Saif ad-Din) 占领, 他声称向蒙古人纳贡的萨勒古里朝 (Salghurides) 埃米尔阿塔贝克·阿布巴克尔 (Atabak Abu Bakr) 委派他干了这件事。因为事情并非如此, 阿塔贝克在 1230 年 11 月迫使赛弗丁撤退。^① 萨勒古里人在法尔斯 (Fars) 建立了自己的政治中心, 忽鲁谟斯在 13 世纪大部时间内被迫同克尔曼的喀拉赫塔家族 (Qarakhitai) 保持关系, 并仰赖该家族。忽鲁谟斯重要的统治者之一, 是拉坎丁·马哈茂德·加拉哈提 (Rukn ad-Din Mahmud Qalhati)。他是忽鲁谟斯第二大城市加拉哈特 (Qalhat) 的前总督, 该城在今天的阿曼 (他名字的最后部分就来源于此)。他扩展了自己的疆土, 最终与自己的克尔曼宗主发生冲突。他还试图重新占领基什岛, 但他被蒙古人从那儿驱逐出来。就在这个时候, 当地的贸易开始繁荣起来。此后, 忽鲁谟斯商人可能定期前往印度旅行。随着忽鲁谟斯人关系网的扩大, 基什的重要性相对降低。^②

① Spuler 著《Mongolen》，第 140-142、148 页；鄂法兰著《13-15 世纪时期的忽鲁谟斯君主》第 81 页。

② 同上书，第 83-84 页。哲朗岛地理上的重要性，可参阅：J.C.Wilkinson 撰的相关词条，收《伊斯兰百科全书》，Patricia Risso 著《阿曼与马斯喀特现代史》（纽约：圣马丁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4、10、11 页。

几年之后，忽鲁谟斯成为伊儿汗王朝的臣属国，向蒙古人称臣纳贡。^①起初这种默契是想给双方带来好处，但西亚连年的战争使波斯湾与地中海之间的贸易活动一时减少。从忽鲁谟斯到南亚以及更远地区的同东方的贸易反而增加了。^②公元 1272 年，马可·波罗访问了当时仍在马哈茂德·加勒哈提统治下的忽鲁谟斯。他报道说：“印度各地的商人”都驾着船只来到忽鲁谟斯，这时的忽鲁谟斯“统治着许多城市和乡村”。马可·波罗还列举了在该港口交易商品的名目，如香料、宝石、珍珠、丝绸、黄金、象牙、马匹等。波斯湾的许多地方都出产珍珠，这是一种颇受青睐的出口商品。同印度的马匹交易也占有重要地位，印度需要马匹，并从好多地方进口，忽鲁谟斯的马匹大多是从伊朗和阿拉伯世界进口。马可·波罗还描述了运输马匹的方式，由于营养不良，气候不适，以及印度人拒绝西亚商人派的饲养员等原因，这些马匹很快在印度死亡。他的描述在很多方面

① 鄂法兰著《13-15 世纪时期的忽鲁谟斯君王》，第 121 页。

② Bertold Spuler 著《中世纪伊朗和中亚的经济发展》（Die wirtschaftliche Entwicklung des iranischen Raumes und Mittelasiens im Mittelalter，收他主编的《东方学手册》（Handbuch der Orientalistik），第 1 部《中东地区》，第 6 卷，第 6 段第 1 篇（莱顿：E. J. Brill，1977），第 116-159 页，尤其是第 145 页。



元明文献中●忽鲁谟斯.....

同瓦萨夫的情况类似。^①

及至 13 世纪末，基什岛再次获得了以前的地位。主要是因为有一位被誉为马立克·伊斯兰（Malik al-Islam）的能力非凡的摄政王。他通过与印度和中国的贸易积累了大量财富，并向伊儿汗人租用法尔斯省和几个附属岛屿达四年（租期从 1293 年/回历 693 年开始）。^②他在忽鲁谟斯的对手是巴哈尔丁·阿亚兹（Baha' ad-Din Ayaz），即马哈茂德·加勒哈提政权中的突厥人。在加勒哈特退位前，阿亚兹曾于 1311 至 1312 年间统治忽鲁谟斯。他使忽鲁谟斯国富有生气，并成功地在基什岛的挑战面前捍卫了忽鲁谟斯的经济地位。若干年后证明，他将首都迁往加隆的决定是正确的，因为在米尔扎·穆罕默德（Mirza Muhammad）统治下的帖木儿人曾于 1394

① 马可·波罗著，A.C. Moule 与伯希和译注：《马可·波罗行纪》卷 1（纽约：AMS Press 1976 年版），卷 1 第 123-124、386 页及第 123 页引文；《瓦萨夫史》，第 302 页。关于珍珠请参阅 R. A. Donkin 著《无价之宝——珍珠与采珠：大发现时代的起源》，收《美国哲学学会文集》，第 224 号（费城：美国哲学学会，1998），第 123-129 页。关于马匹请参阅 Simon Digby 著《德里苏丹朝的战争与大象：一项军事供给的研究》（牛津：Orient Monographs, 1971），第 31 页，以及葡萄牙鬼著《海上的马匹——15 世纪中国海外贸易中被遗忘的一面》（Pferde auf see: ein vergessener Aspekt des maritimen chinesischen Handels im frühen 15. Jahrhundert），刊《东方社会史和经济研究》第 34 卷（1990），第 204-207 页。

② 这位摄政王叫谢赫·伊斯兰·贾马勒丁·伊卜拉欣·本·穆罕默德·梯比。他自己可能到过中国，但在中国文献中缺载。参见：鄂法兰著《13-15 世纪时期的忽鲁谟斯君主》第 89-90 页，91 页注释 2；《瓦萨夫史》第 302 页上记述了马立克伊斯兰朝的战马交易情况。

年占领旧忽鲁谟斯，但从未获得新港。^①

在 14 世纪时，忽鲁谟斯巩固了自己在国际贸易中的地位。统治集团内部的争权夺利没有对王国的外交关系产生重大影响。在阿亚兹下台之后，忽鲁谟斯的王子重新上台，新统治者伊扎丁·库尔丹沙（‘Izz ad-Din Kordanshah）再次同基什和法尔斯省人发生争执。他甚至曾一度被敌人俘虏，但却成功地逃回忽鲁谟斯。在古特卜丁·塔赫马坦二世（Qutb ad-Din Tahamtan II，卒于 1346 年）统治下，忽鲁谟斯与基什的敌对状态彻底终结。基什岛及受其保护的独立领地被占领，成为了巴林的一个重要岛屿。^②伊本·白图泰在塔赫马坦二世统治时期曾经到访忽鲁谟斯（1331 年），他记载说：“忽鲁谟斯城大而优美，市肆繁荣，犹如印度之信德港，人们把印度陶器从那里运往伊拉克、法尔斯和呼罗珊。”^③

该时期还见证了伊儿汗帝国的逐渐瓦解。在若干继任者中，穆扎法尔人（Muzaffarides）可能是最重要的统治集团。忽鲁谟斯王子向他们称臣纳贡，并因此得到名誉上的臣属地位。^④当帖木儿征服中东后，忽鲁谟斯曾

① Spuler 著《Die Mongulen》，第 150 页；鄂法兰著《13-15 世纪时期的忽鲁谟斯君王》，第 94-95、112 页。

② 同上书，第 100-102 页，第 103-106 页。

③ 伊本·白图泰著，H.A.R.Gibb 译注《伊本·白图泰游记》，C.Defremery 和 B.R.Sanguinetti 据阿拉伯文本译注，共三卷，新德里：Munshiram Manoharlal 出版社，1999 年根据 Hakluyt Society 本重印本，第 2 卷第 400 页。

④ 鄂法兰著《13-15 世纪时期的忽鲁谟斯君王》，第 111 页。

元明文献中●忽鲁谟斯.....

停止纳贡达四年。这正是在 1394 年的短期战争中，忽鲁谟斯丧失了伊朗大陆上的几座要塞的原因。当忽鲁谟斯国王穆罕默德沙（Muhammad Shah）同意支付自己债务时，战争宣告结束。^①据鄂法兰说，所有这些冒险并未给帖木儿人带来任何好处，因为他们缺乏占领加隆的必要的船只，他们只摧毁了忽鲁谟斯的部分要塞。正如从这些事件中看到的那样，即使是面对诸如帖木儿人这样的威武之师时，忽鲁谟斯人也并不心甘情愿地缴纳贡赋。帖木儿人对忽鲁谟斯的另一次出兵发生在 1429 年，也以失败而告终。由易卜拉欣苏丹（Ibrahim Sultan）率领的这次出兵的原因欠详。^②

这时郑和的船队出现在了波斯湾。郑和抵达时恰逢古特卜丁·费鲁兹·沙阿（Qutb ad-Din Firuzshah）（1400?~1417）和赛弗丁·马哈尔（Saif ad-Din Mahar，1417~1436）执政时。这两位执政者对 15 世纪的忽鲁谟斯产生了深刻影响，他们的两位继任人是土兰沙二世（Turanshah II，1436~1470）和萨勒加沙（Salghurshah）（1475~1505）。

在忽鲁谟斯历史上乍一看，该时期摄政人数少似乎说明政局稳定，但实际上其制度根本不稳定。在登上忽鲁谟斯王位的 10 位国王中有 9 位被杀或被迫下台。土兰沙是唯一一位寿终正寝的忽鲁谟斯国王。在忽鲁谟斯内部十分频繁的冲突中，他与赛弗丁之间的纷争可视为忽鲁谟斯内

① 雅兹迪《凯旋书》卷 1，第 578-579 页。

② 鄂法兰著《13-15 世纪时期的忽鲁谟斯君王》，第 113-115、129 页；《撒马尔甘迪》，第 619-620 页。

订的典型。土兰沙在加勒哈特发起的反叛揭开了冲突，他在那里封锁了开往忽鲁谟斯的商船，继而占领了忽鲁谟斯的首都和波斯湾岛屿，迫使赛弗丁逃到盟友沙赫鲁赫（Shakhrukh）处寻求避难。沙赫鲁赫派兵讨伐土兰沙，但双方最终又握手言和。^①这种冲突显然没有促进经济的发展，同时冲突也并未导致长时间的经济萧条。

与此同时，帖木儿人陷入了同土库曼加喇·古优鲁王朝（Qara Quyunlu）及阿格·古优鲁王朝（Aq Quyunlu）的激烈斗争中，土库曼人阿格·古优鲁取得了最后胜利。忽鲁谟斯被迫向他们纳贡，直到帖木儿王朝让位于萨法维王朝。在此期间，忽鲁谟斯同其在伊朗大陆上的主要贸易伙伴呼罗珊的关系从未中断。在它同呼罗珊的贸易保持繁荣的同时，忽鲁谟斯的政治开始了衰落。在葡萄牙人进入前的几十年里，忽鲁谟斯的局势急剧恶化，以致菲奥兰尼·皮亚琴提尼（Fiorani Piacentini）把它描述成陷入了“完全混乱”、趋于“政治崩溃”的状态。^②据诺昂·德·巴罗斯（João de Barros）说，当阿尔布克奎（Albuquerque）向该岛发起进攻时，他只有7艘船和460人，而忽鲁谟斯还有3万人的军队，其中有4000波斯弓箭手，还有60艘大船停泊在港湾里，但所有这些军队都无济于事。^③

① 鄂法兰著《13-15世纪时期的忽鲁谟斯君王》，第129、132-133页，扎里亚卜著作，第95-97页。

② 鄂法兰著《13-15世纪时期的忽鲁谟斯君王》，第119页；Piacentini《忽鲁谟斯的商场和政权》，第99页。

③ Barros著《亚洲》，第2编，第2册，第1、2章。

元明文献中的忽鲁谟斯.....

如前所述，在中国资料的有关章节中，我们将对忽鲁谟斯社会经济形势进行讨论。但是在本部分也许有必要稍微提及有关问题的要点。首先，忽鲁谟斯是一个拥有不同民族和宗教的多元文化社会。它拥有各种类型的商店、客栈和娱乐场所，异常豪华，有许多富人，但同时某些萧条的迹象也很明显。^① 马可·波罗非常赞赏用椰枣酿造的深受当地人民喜爱的忽鲁谟斯饮料。^② 忽鲁谟斯社会的主要成分是阿拉伯人和波斯人，此外还有犹太人、印度人和其他人。鄂法兰认为，忽鲁谟斯主要是一个印度教和伊斯兰教混合的社会，而不是一个伊斯兰法统治下的城市。^③

忽鲁谟斯在地区范围内不得不同基什岛和其他邻近的港口开展竞争，在国际范围内也被迫捍卫自己与亚丁竞争中的地位。地中海东部地区和印度之间的贸易是通过波斯湾和红海进行的。事实上，所有主要的商队都通过同这两个地区建立联系而从中获利。中国人也不例外。当前往忽鲁谟斯旅行时，他们也探索前往亚丁和吉达（Jiddah）的航线。此外，从马欢的记载中我们知道，大明船队在苏门答腊港（通往北苏门答腊海岸的重要港口）已经分航，主船队继续向科摩罗角（Cape Comorin）、柯钦（Cochin）、古里（Calicut）方向航行，最后抵达忽鲁

① 鄂法兰著《16世纪初的忽鲁谟斯》，第119、159-160页。

② 马可·波罗著，A.C.Moule与伯希和译注《马可·波罗行纪》，第123页。

③ 鄂法兰著《13-15世纪时期的忽鲁谟斯》，第162-163页。

波斯，与此同时小船队则直接驶向亚丁。第二条航线很可能直接走通往马尔代夫群岛（Maldives）的水路。经该航道上前往亚丁的一位船队指挥官是周满将军。^①

红海是所谓的卡里姆商人（Tujjar al-Karim）的领地，^②一批穆斯林商人在马姆鲁克时期（Mamluk）的埃及、阿拉伯半岛南部和非洲东部之间扮演着中介角色，而中国和印度的商人则为另一方的中介。卡里姆商人以其雄厚的资产支持着埃及的经济。他们还用向马姆鲁克人提供巨额贷款的方式帮助他们对抗处于领先地位的帖木儿王朝，但是马姆鲁克人在很长时期内都未能实现商业社会的发展。当苏丹巴尔萨贝（Sultan Barsbay 1422~1438）为恢复国家的财政而开始垄断国际贸易时，卡里姆人则失去了自己的地位。在亚历山大的威尼斯人也遇到了这种情况。^③因此贸易额锐减，对马姆鲁克帝国的繁荣产生了负面影响。

鄂法兰把卡里姆人的衰落与卡泽伦（Kazarun）苏菲教团的灭绝进行了比较。该苏菲教团是由萨法维首位

① 米勒斯著《马戏》，第154-155页。

② 卡里姆（Karim）一名的来源尚未确定。一种可能的解释，可参阅索卜希·叶海亚·拉比卜在《伊斯兰百科全书》上的“Karim”词条，该名称早在12世纪初即已出现。也可以在Geniza的记载（约1181年）中看到，此名称指在印度洋旅行的一艘护卫船。见S.D.Goitein著《伊斯兰史及其制度研究》，莱顿：E.J.Brill，1966年版，第351-360页。

③ Walter J.Fischel著《埃及马姆鲁克时期的香料贸易》，收入Pearson主编《印度洋地区的香料》，第51-68页，尤其是第54-55和第65-67页。

元明文献中的忽鲁谟斯.....

国王伊斯玛勒 (Ismā'il) 所派遣的,也正是他把伊朗变成了一个以什叶派为主的国家。卡泽伦教团或伊斯哈格耶教团 (Ishaqiyya 此名来自其创始人谢赫·阿布·伊斯哈格 Shaikh Abu Ishaq) 的馆舍 (Khaneghah) 从土耳其发展到了印度,正如伊本·白图泰描述的那样,沿途为穆斯林商人服务的银行和驿站不计其数。^①与此相反,卡里姆人则从未建立过类似的机构,也未创立过教团。这也可用于波斯湾地区的商人,他们并不认为自己是卡扎伦教团的追随者。^②因此,我们最好将波斯湾地区的卡里姆人同另外一方,即笼统地称为“阿拉伯—波斯商人”区别开来。

尽管在文字资料中未公开谈及,但在卡里姆人和忽鲁谟斯的阿拉伯—波斯商人之间一定存在着某种程度的竞争。我们也可以作出这样的推测,即印度和近东的贸易额如此之大,以致于双方在不被迫挑战对手的情况下,其利益都可以得到保障。更有可能的是,双方之间进行某些协调活动,以在彼此之间建立永久性的联系。^③十分有趣而又值得注意的是,马欢已知晓经由忽鲁谟斯

① 鄂法兰著《15及16世纪在红海和波斯湾的商人》(Marchands de mer rouge et du Golfe persique au tournant des 15e et 16e siècles, 收入鄂法兰和 Sombard 主编的《Marchands et homes d'affaires》,第83-90页,尤其是第85-86页。

② Hamid Algar, 见《伊斯兰百科全书》中的词条。

③ 参见《伊斯兰百科全书》,第58页,以及 Serjeant《也门商贾》,第69页。另一种观点见前引 Piacentini《忽鲁谟斯的商场和政权》,第86、87页。

前往中亚和埃及的路线。^①这表明卡里姆人的“世界”与阿拉伯—波斯人的“世界”之间的联系没有任何障碍。鄂法兰氏认为，这种罕见的平衡是建立在宗教和传统的基础之上的。^②当欧洲人，特别是荷兰人和英国人到来后，这种平衡就被打破了。

① 米勒斯著《马戏》，第 74 页。

② 鄂法兰著《16 世纪在红海和波斯湾的商人》，第 90 页。

元明文献中 忽鲁谟斯

中国文献中 关于忽鲁谟斯的首批报告

正如我们在前言中提到的那样，中文里最早描述忽鲁谟斯的是《岛夷志略》（1349年）一书。其作者汪大渊（约生于公元1311年）曾两次泛海。他是否真的如他所说的实地考察过99个地方，目前尚存争议。但总体来说，他的观察比其他许多文献上谈到的情况更加“真实”。^①

除忽鲁谟斯外，汪大渊书中还提到了印度洋西部包括波斯湾和红海地区的数个国家和港口。但除了诸如麦加（Mecca）和摩苏尔（Mosul/al-Mawsil）的少数几个地方外，其他地方的辨认都尚存争议。最近的研究表明，书中的许多地名被证明是非洲东部和北部的某些地方。^②

① 汪大渊的生平及其著作，可参阅：苏继良校释本第10~11页的《校注序》；许永璋著《汪大渊生平考辨三题》，刊《海交史研究》1997年第98~102页；亦可参见葡萄牙鬼著《海洋亚洲的形貌》，第52~54页，第73页，以及柔克义撰《14世纪中国与印度洋群岛和沿海的关系及贸易》，第64~63页。

② 参阅葡萄牙鬼著《汪大渊〈岛夷志略〉注释》（134950，收Claudine Salmom编《亚洲之旅的报道》（Recits de voyages asiatiques Genres, mentalites, cnsepluon de l'espace Actes du colloque EFEOEHSS de decembwr1994），收Études thematiques第5辑（巴黎：École française d'Extrême-Orient，1996），第134~136页。

如汪著中把“忽鲁漠斯”称为“甘埋里”(Ganmaili),就引起许多混淆,而柔克义又把该中文地名误为科摩罗群岛。我们还将在后面讨论这个问题,在此提供有关“甘埋里”的由柔克义结合苏继庠校注的一章英译文:^①

其国迤南冯之地,与佛朗(Folang/Frank\$)相近。乘风张帆二月可至小咀喃(Quilon)。其地船名为马船,大于商船。不使钉灰,用椰索板成片。每舶二三层,用板横栈,渗漏不胜,梢人日夜轮辟水不使竭。下以乳香压重,上载马数百匹,头小尾轻,鹿身吊肚,四蹄削铁,高七尺许,日夜可行千里。

所有木香、琥珀之类,均自佛朗国(Frank\$)来,商贩于西洋互易。去货丁香、豆蔻、青缎、麝香、红色烧珠、苏杭色缎、苏木、青白花器、瓷瓶、铁条,以胡椒载而返。椒之所以贵者,皆因此船运去尤多,较商舶之取,十不及其一焉。

上述文字由三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提到“甘埋里”的地理位置,第二部分谈到当地造船的情形,第三部分则关注交易的货品。汪著在谈及其他国家的段落时也有

^① 《岛夷志略》,第364-369页;柔克义撰《14世纪中国与印度洋群岛和沿海的关系及贸易》,第623-624页。请注意:柔克义译文所据版本与苏继庠所据版本不同,故在此书中凡有疑问之处都按苏本。



元明文献中●忽鲁谟斯●

类似划分，但通常是在第二部分谈当地民俗，而非造船或其他的“技术”问题。

下面我们将就上述记述——进行历史文献学的探讨：

(1) 首句中的“南冯”一名在其他资料中不曾见到，要确认它实非易事。苏继庠认为，南冯可能是 *Namakdan* 之省音，属于附近的一个岛屿。此说颇为牵强，但我们也提不出更好的解释。^① (2) 关于前往印度西南海岸小咀喃的航程，苏继庠认为应为“一月”，而非“二月”，其他文献也持这种观点。^② (3) 小咀喃在汪著中还提及一处，其中也提到了“马船”。^③ (4) 马可·波罗也见过这种船，他说：“其船舶极劣，常见沉没，盖因无铁钉，用线缝系船舶所致。取印度胡桃（椰子）树皮捣之成线，如同马鬃，即以此线缝船，海水浸之不烂，然不能御风暴。船上有一桅、一帆、一舵，无甲板。装货时，则以皮革覆之，复以贩售印度之马置于其上。”^④ 汪大渊和马可·波罗的描述大体相似，在某些细节上还相互补充印证，其中一例就是造船时使用椰索。但也有不同之处，如马可·波罗注意到印度洋上航

① 《岛夷志略》，第368页注释2；柔克义撰《14世纪中国与印度洋群岛和沿海的关系及贸易》，第623页误。

② 《岛夷志略》，第365页注释4。据马欢说，古里到忽鲁谟斯需25日航程（米勒斯著《马欢》，第165页），祝允明在《前闻记》中则说航行需34天（摘自该书17页）。

③ 《岛夷志略》，第321-324页。

④ 马可·波罗著，Moule与伯希和译注《马可·波罗行纪》，第124页。

行的商船无甲板，而汪著则臆测有二三层甲板。(5) 我们已强调了向印度贩运马匹的重要性。但还可补充两点，一是该细节不赞同柔克义有关“甘埋里”即科摩罗群岛的观点；船上可“载马数百匹”^①似不可能。(6) 乳香产自哈德拉毛 (Hadramaut) 沿岸。令人奇怪的是，这种货品需要堆放在下层库房中，因为它是贵重货物，需要保持干燥。当然应该承认，我们对乳香从产地到印度及其他地点的运输方式或出口数量一无所知。有大量证据表明，古代从西亚运抵远东的大量乳香是作为输往中国的贡品，但到了蒙元时期的情况是否仍然如此，则很难说矣。^② (7) 琥珀可能来自欧洲北部，系经由法兰克 (即罗马或更广泛地说地中海东部) 贩来的。真正的木香是喜马拉雅山上的一种香草，其根可用作万能药。类似的植物可能自阿拉伯半岛和索马里沿岸贩运到诸如忽鲁谟斯等地，但木香等商品如何从法兰克出口被贩运到忽鲁谟斯港，我们却一无所知。可能在远古时，中国人就认识这两种商品了。特别是琥珀，在很多文学作品中

① 参见 Simon Digby 著《亚洲海上贸易》，收入 Tapan roychaudhuri 和 Irfan Habib 主编《剑桥印度经济史 (1200-1710)》卷 1，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 1982 年版，第 125-159 页 (尤其是第 128 页)。

② 参见 Dieter Mareinet, Karlheinz Lohr 和 Jürg Janien 著《乳香及没药——古之瑰宝在今朝之光中》Weihrauch und Myrrhe. Kostbar teilen der vergangenheit in sieht der Gegenwart，柏林：Akademic-verlag:1989；Nigel Grosm, Grankin cense 及 Myrrh 著《阿拉伯香料贸易研究》(伦敦及贝鲁特：Songmen and Librairie du siban, 1981)；林天伟《宋代香药贸易史稿》(香港：中国学社 1960 年版) 图表第 174-208 页。



元明文献中●忽鲁谟斯●●●●●

颇受青睐和赞誉。^① (8) 汪著中提到的其他物品产自忽鲁谟斯的东部。丁香产自马鲁古群岛 (Moluccas)，豆蔻产自班达群岛 (Banda Islands)，麝香是从中国西藏边界及其他中亚地区运往中国、缅甸和西亚的港口，苏木是东南亚某些港口的出口货品。^② 造成该清单难以理解的表述是“去货”(意为被贩运到那里的货物)和“以胡椒载而返”。我们不晓得所有这些货物运往何方，它们应当来自东方，但句子的结构如此，人们以为最初的几种货物从丁香到铁条都是从忽鲁谟斯贩运到印度的，而在那里再将胡椒带回忽鲁谟斯。这种结论毫无意义。一种解释是把该词完全同中国商人的活动联系起来，即从中国经由印度抵达近东及其反向的旅行。他们可能先将丁香和其他货物从印度贩到忽鲁谟斯，“贩于西洋”一

① 参阅：夏德 (Friedrich Hirth) 与柔克义译注《赵汝适：12-13 世纪中国与阿拉伯的贸易研究》(下称《赵汝适》)，台北：成文出版公司重印本，(1970 年)，第 16 页注释 1，第 221 页；赵汝适著，杨伯文校释《诸蕃志校释》，中外文通史丛刊本，中华书局 1996 年版(下卷)，第 194 页，Paul Wheatley 著《宋代海上贸易商品地理考》，刊《皇家亚洲学会马来分会会刊》卷 32 第 2 期 (1959)，第 62-81 页；劳费尔 (Berthold Laufer) 著《中国伊朗编》，刊《人类学系列》第 15 卷第 3 期，芝加哥：自然史博物馆 1915 年版，第 462-464 页；劳费尔著《亚洲琥珀历史札记》，收《美国人类学会论文集》第 1 辑 (1905-1907)，第 211-244 页；Edward H. Schafer 著《康国金橘》，伯克利和洛杉矶：加州大学出版社 1963 年版，第 172 页、第 247-249 页。藤田丰八认为，汪大渊书中的“产”系衍字，但删除后又难于回答问题，因此如前所述，这两种“物产”当“来自”佛朗。按：柔克义将琥珀误为龙涎香。

② 肉豆蔻与小豆蔻常被混淆，因为它们的中文名字相似。商人将小豆蔻从印度贩来，商品流动的方向相同，即从东向西。

句的译文即据此，然后再返回印度，在返国途中把胡椒输往中国。另一解释与此不同，即丁香、豆蔻等物从忽鲁谟斯被再次出口到了阿拉伯海岸的一些地方，即输往了出售印度胡椒的港口，但此说非常离奇。(9) 对最后一句话的解释同样困难。其意似说胡椒的需求量极大，而中国船舶运量远不如其竞争者。但此说可能也不正确。^① 所以我们可以作这样的推测，即书中的这个地方有误。汪大渊曾到过亚洲的主要港口，他肯定知晓忽鲁谟斯与印度之间的贸易关系，因此他的原文可能是正确的，但出版者在校勘时弄错了。^②

至此，我们回到“甘埋里”这一中文地名的研究上来。我们很难理解柔克义为何将“甘埋里”当成科摩罗群岛。汪著中的细节已提醒柔克义应将“甘埋里”看作是中东的某地，甚至“甘埋里”同科摩罗名称之间的相似之处也值得怀疑，柔克义可能将盖迈尔岛 (Jazirat al-qamar 意为月亮岛) 和古马勒岛 (Jazirat al-qumr) 的

① 另一解释可参阅 Paul Wheatly 著《僧祇人的土地：公元1500年前中国人关于非洲东部的知识评注》（下称《僧祇人的土地》），收入 Robert.W. Steel 及 R.Mansell Prothero 编《地理学者与回归线：利物浦札记》，伦敦：Longmans 1964 年版，第 159-160 页。

② 一种胡椒产在非洲西部，名叫马拉圭塔 (Malaguettā 胡椒，但中世纪中国人消费的是黑胡椒 (piper nigra 或 piper longum)。可参见：夏德和柔克义译注《赵汝适》第 222-224 页，赵汝适著、杨博文校释《诸蕃志校释》（下卷）第 195-197 页，或劳费尔著《中国伊朗编》第 374-375 页。中国胡椒的进口情况，见曹永和《东亚的胡椒贸易》，刊《通鉴》第 68 卷，第 4-5 期 (1982 年)，第 221-249 页。



元明文献中 忽鲁谟斯

阿拉伯文名与科摩罗和“甘埋里”联系起来。中文里的“古马勒”出自昆仑一名，与“昆仑层期”一名相关，它与在马达加斯加俘获的簪妮奴（昆仑奴，Zanj）有关，因此“古马勒”应指马达加斯加，而非科摩罗群岛。^① 还需补充的是，中世纪时的科摩罗群岛是个蛮荒之地，同邻近地方鲜有贸易联系。^②

但是我们应该如何来解释“甘埋里”一名呢？特别是在后来的中文资料中，通常把波斯语中的 Hurmoz 一词转写成“忽鲁谟斯”（及其他形式）。^③ 甚至在元或

① 费瑯 (Gabriel Ferand) 著《阿拉伯舆地书中的拉姆尼岛、拉默里岛、瓦克瓦克岛、科摩罗群岛和马达加斯加》(Les îles Romni, Limery wikwik, komor des géographes arabes, et Madagascar), 刊《亚洲学报》第 10 期 (1907), 第 529-532 页; 以及他的《昆仑及南海古代航行考》, 刊《亚洲学报》(14, 11, 1919), 第 209-213 页; Jan J.L. Duyvendak 著《中国对非洲的发现》, 1947 年 1 月 22-23 日在伦敦大学的演讲稿, 伦敦: Arthur Probsthain, 1949 年, 第 22-23 号; Wheatley 著《僧祇人的土地》, 第 159-160 页, 及其《中国—非洲文选》, 收 H.Neville Chittick 和 Robert I. Rotberg 主编《非洲东部与东方: 前殖民地时代的文化整合》, 纽约及伦敦: 非洲出版公司 1975 年版, 第 86-90 页; Almut Netolitzky 著《周去非及其〈岭外代答〉》(Das Ling-wai tai-ta vou Chou Chu-fai, Eine landeskunde sudchinas aus dem 12. Jahrhundert, Münchener Ostasiatische Studien 第 21 辑, 威斯巴登: Franz Steiner verlag, 1977), 第 49 页的注释第 238-239。

② 见 Michael N. Pearson 著《近代葡萄牙对印度斯瓦西里海岸和港口的入侵》, 巴尔的摩: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出版社 1998 年版, 第 147 页。

③ 忽鲁谟斯在中文中的不同转写形式, 可参见: 陈家荣、谢方和陆峻岭编辑《古代南海地名汇释》, 北京: 中华书局 1986 年版, 第 949 页; 也可参阅伯希和《郑和下西洋考》, 第 242-243 页注释 1。

元以前编撰的其他著作（元前著作将在后面解释）中，我们发现与“忽鲁谟斯”一名明显类似的许多转写形式。比如在陈大震的《大德南海志》（1304年成书，收入《永乐大典》）中使用了“阔里抹思”，明代成书的《元史》中则有“忽里模子”一名，第三个字有时也写成“谟”。^①

要是换个角度来处理问题的话，我们必须记住一点，即当汪大渊造访忽鲁谟斯国或闻知该地地名时，其都城已迁往加隆岛了。从此以后，“加隆”一名有时便以伊朗大陆的忽鲁谟斯领土 *jarunat* 的形式出现。与此同时，“忽鲁谟斯”一名也得以保留，不仅指其旧都忽鲁谟斯，而且指伊朗大陆的一个地方，甚至就指整个忽鲁谟斯王国本身。^② 然而其他名称也可能出现过。在《伊本·白图泰游记》中就有一例：“忽鲁谟斯乃一滨海城市，亦称莫格斯坦（*Mughistan*）”，属于克尔曼国靠海

① 《元史》卷63，第1571页；伯希和著《马可·波罗行纪校释》三卷本，巴黎：Imprimerie nationale，1959-1973年版，卷1，第581页。其首段文字参见《永乐大典》“中国学术名著”系列四《类书丛编》1，卷1-100，台北：世界书局1962年版，册64，卷11907第94页下，或现代校刊本《大德南海志残本》，广州市地方志研究所1986年版，第38页。对此书进行的最新研究是邱炫煜的《从〈大德南海志〉看宋末元初广州的海外贸易》，收张炎宪主编《中国海洋发展史论文集》卷6，中央研究院中山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所专书40，台北：中央研究院史学研究所1997年版，第173-215页；也可参阅喻常森著《元代海外贸易》，西北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25页。注释：“阔里抹思”的首字有时写作“𠵿”，“抹”字常写作“𠵿”。此外，“𠵿”的粤语发音是 *fut*。

② 鄂法兰著《16世纪初的忽鲁谟斯国》，第80-82页。*Mogh* 意为椰枣树，*Moghstan* 相当于椰枣之乡、长椰枣的地方。

元明文献中忽鲁谟斯.....

的一个地区，“对面海中即新忽鲁谟斯。”^①简言之，自13世纪初以降，新旧忽鲁谟斯出现过数名，有些名称在一定程度上被交替使用。但从读音上看，没有一个名称接近中文里的“甘埋里”。

苏继庾认为，要克服发音问题，我们须对马可·波罗将“忽鲁谟斯”异读如 Charmusa (Curmos, Cormos 等) 引起足够的重视。他认为两种情况下的首音相通，马可·波罗拼作 ch (cha) 或 c，而汪大渊写作 g (ga)，于是他认为可用“甘里埋”取代“甘埋里”，这种倒置的形式更接近“忽鲁谟斯”的读音。^②

虽然该建议得到广泛认可，但并非最终结论。首先马可·波罗的写法可能出自他个人的理解，其次在中文里“忽鲁谟斯”一名的尾音是兹 (z)。但也有这样的可能，即可以将“甘里埋”倒置形式与克尔曼地区联系起来。如果这是正确的，那么这个大区域名称将再次专门指称忽鲁谟斯“固有的”涵义。另一种可能是，将不倒置的“甘埋里” (Ganmaili) 等同于 Gumru，即后来开埠的阿巴斯港 (见前述)。Gumru 可能是对 gumruk 的误读，成为了指称“海关”的专用术语。^③该词在发音上与“甘埋里” Ganmaili (广东话发作 Gammailik) 很相近，但这也仅指位于大陆的港口及其同克尔曼和设拉子

① 伊本·白图泰著，Gibb 译注《伊本白图泰游记注释》卷 II，第 400 页。

② 伯希和《马可·波罗行纪校注》，第 576 页 Conrmos 条；《岛夷志略》，第 366 页注释 1。

③ Le Strange 著《东方哈里发的土地》，第 319 页。

的陆路联系，而不是指彼岸的外国船只停泊的地方。尽管如此，我们也不能否定这种可能性，即汪大渊或为他提供信息的人用 Gamru 一名指整个忽鲁谟斯王国。

在下最后的结论之前，我们要作出几点评注。其一，从发音角度将 Jarun 变成 Ganmaili 实际上是完全不可能的。其二，赵汝适在其名著《诸蕃志》中提到一个叫“甘眉”的地方，该地名出现在一份隶属于大食（阿拉伯人或波斯人）的国家名录中，其中也提到了“基什”。如前所述，“基什”是当时波斯湾的一个重要港口，所以《诸蕃志》的另一处也曾提到它。夏德和柔克义对“基什”的鉴别没有任何问题，至于“甘眉”，他们二人认为该地与科摩罗群岛有关。也有这种可能性，即当柔克义后来翻译汪著时，将“甘埋里”扩展成了“甘眉”（Ganmel），因此也就把它当成科摩罗群岛的名称。苏继庠在这方面更加务实，他既同意沈曾植早先的观点，也承认“甘眉”和“甘埋里”之间的关联，并认为前者是后者（或“甘里埋”）的倒置形式，都指“忽鲁谟斯”。^①其三，汪大渊在《古里佛》章中说：“其珊瑚、珍珠、乳香诸等货，皆由甘理、佛朗来也。”如前所述，珍珠取自波斯湾，珊瑚来自地中海，乳香产自阿拉伯半岛。因此“甘理”可能是“甘埋里”、“忽鲁

^① 《岛夷志略》，第366页注释1；夏德和柔克义《赵汝适》，第117页，第122页注释12；赵汝适著、杨博文校释《诸蕃志校释》卷上，第90页、第96页注释21及27，第108-109页（见该页注释1中提到的资料）。

元明文献中忽鲁谟斯.....

谟斯”或 Gamru 的另一个形式，特别是当人们考虑到 li 和 mai 两字的相似性时。但苏继庠认为“甘理”当指“忽鲁谟斯”的属地哲朗岛（Qalhat），它在茅坤的航海图（它指示了郑和的行海路线，下文将谈及）上又称为“加刺哈”（可能就是《诸蕃志》里的阿拉伯属地之一的“伽力吉”）。^①支持苏继庠看法的主要依据可能是，汪大渊在两个地方谈到“甘埋里”和“甘理”，主观上是想把二者区分开来。总之，苏氏可能有误，不能完全把两地区别开来。其四，《宋史》中记载有一份纳贡国家名录，其中就有“甘眉流”（开头两字与“甘眉”同）。名录上的国家都从事于海上贸易，但“大食”不在其中，而是列入了其他国家行列，这表明“甘眉流”与大食无涉。因此，“甘眉流”当是另一个国家，而非“忽鲁谟斯”。^②

上述的许多地名都难以正确解释“甘埋里”究竟何在。从发音上看，它同古地名“甘眉”、“甘理”、

① 《岛夷志略》，第 325、第 329-330 页注释 12；夏德和柔克义《赵汝适》第 117 页，122 页注释 12；赵汝适著，杨博文校释《诸蕃志校释》卷上，第 90 页，第 95 页注释 14；《古代南海地名汇释》第 307、431 页；海军海洋测绘研究所、大连海军学院航海史研究室编《新编郑和航海图集》（北京：人民交通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77、78、81 页；米勒斯著《马欢》，第 188 页注释 74，第 248、296-297 页；柔克义著《诸蕃志校释》，第 454 页再次将“甘里”释为“甘埋里”，指科摩罗群岛。

② 《宋史》卷 119，第 2813 页。有作者把“甘眉流”写作“丹眉六”、“丹流眉”、“丁流眉”等名，如《古代南海地名汇释》，第 212、213、252 页。

Gamru 和“克尔曼”都有关联。甚至倒置说（即以“甘里埋”代替“甘埋里”）也似是而非，除非是汪大渊没有注意到或故意忽略“忽鲁谟斯”一名的尾音“斯”。因此我们最后只能说：第一，“新忽鲁谟斯”在 14 世纪初是个非常重要的地方，汪大渊报告中描述的许多因素提到的这个地方不容怀疑。事实上当时的“忽鲁谟斯”太有名了，以至于汪大渊不得不提到它的名字。第二，由于“忽鲁谟斯”是中东的一个重要港埠，于是人们想知道汪大渊为何不给“忽鲁谟斯”选择一个与传统形式相似的“忽鲁莫斯”（“莫”可读作“姆”）呢？伯希和对此作出了解释：大概元时的中国认为“忽鲁谟斯”隶属于伊儿汗王朝，^①故汪大渊作如此称谓，他有充分的理由用另外一个称谓代替“忽鲁莫斯”，这样就为解释留下足够的余地。

如前所述，元代的文献以及更早的著作中提到的几个地名，可以比“甘埋里”更易于同“忽鲁谟斯”联系在一起。我们在此有必要简要地考察一下这些文献。最古的地名可能是出自唐时《大唐西域记》的“鹤秣城”，

^① 伯希和《马可·波罗行纪校释》，第 582 页。伯希和关于中国和忽鲁谟斯无直接联系的看法是错误的。

元明文献中忽鲁谟斯.....

贝尔氏 (Beal) 拼作 Humoon。^①另一地名叫“忽露摩” (Hulumo, 末字也可读成 mei)。伯希和从成书于 12 世纪的著作《文昌杂录》中发现了这个地名。根据该书“忽露摩”多少靠近“层檀”。^②部分学者把《宋史》及其他文献中描述的“层檀”认为是“桑给巴尔” (Zanguebar), 而有些人则把它与塞尔柱突厥 (Seljuk Turks) 相提并论。^③由于塞尔柱突厥与“忽鲁谟斯”相邻, “忽露摩”指的可能就是此地。第三条文献较为清楚, 它出现在题赠给杨枢的一份铭文 (收黄潜编纂的一本书中) 中。杨枢出

① 玄奘著, 季羡林校注《大唐西域记校注》, 中外交通史籍丛刊本 (北京: 中华书局 1990 年第 2 版), 第 941、942 页; 《古代南海地名汇释》, 第 851-852 页, 第 949 页; 《岛夷志略核释》第 367 页注释 1; 玄奘著, 贝尔 (Samuel Beal) 译《西游记》2 卷 (德里: Oriental Books Reprint Corp. 1969 年据伦敦 1884 年版重印本, 卷 1 第 278 页。此外, 慧立、彦凉撰《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 收 Taisho Shin shu Daizokyo 卷 50 (东京 1977 年重印本), 文第 2053 号, 卷 4 第 243 页 (下部) (“鹤林城”, 在一则注中说首字可写成“鹤”, 因此写作“鹤林城”); 道宣撰、范祥雍编《释迦方志》, 中外交通史籍丛刊本, 北京: 中华书局 1983 年版, 上卷, 第 23 页 (“胡卢没”, 下卷第 86 页 (“鹤林城”), 在《钦定古今图书集成》中也收有《大唐西域记》, 但“忽鲁谟斯”写成“忽露摩”, 见该书 66 页注 27。另参阅 Sally Hovey Wriggins 译《玄奘高僧沿丝绸之路朝圣记》 (Boulder: Westview Press 1996 年版), 第 139 页。

② 庞元英《文昌杂录》, 收《四部丛书集成》卷 1, 4A; 伯希和著《马可·波罗行纪校释》卷 1, 第 580-581 页。《古代南海地名汇释》572 页上有不同建议。

③ 《宋史》卷 490, 第 4122-4123 页。要了解不同的观点, 可参阅: 夏德和柔克义著《赵汝适》, 第 126-127 页; 赵汝适著、杨博文校《诸蕃志校释》, 上卷第 100-101 页, 注释 1; 伯希和著《马可·波罗行纪校释》卷 1, 第 580-581 页; Wheatley 著《中国—非洲文选》, 第 88 页; 《古代南海地名汇释》, 第 460 页。

身于一户专门从事海外贸易的大富人家，他曾两度到过波斯旅行，并于1307年在忽鲁谟斯登陆。“忽鲁谟斯”现写作“霍尔木兹”（“木”可读成“莫”）。他在那里购买马匹、“黑犬”、琥珀、葡萄酒和“外国盐”（硝石）。后因他素孚众望，获授“松江嘉定等处水师指挥使”职。^①其他提及“忽鲁谟斯”的文献见《元史》和《大德南海记》（见前述）。《元史》中出现的另一个地名也可能是“忽鲁谟斯”，该地名叫“哈儿马某”。有学者主张将“某”改为“其”，这样就变成了“忽鲁谟斯”的异译“哈儿马其”，但伯希和反对这么做。此外，在泉州的一通碑文里提到有一位使臣于1299年时被派往忽鲁谟斯，还记有一位名叫“不阿里”（也有不同写法）的人于1299年死在中国的消息。据刘迎胜教授的考证，不阿里的祖先来自哲朗（Qalahat）的地方，但其生平细节显然与印度南部的马八儿国（Maba' ar）和班

① 《金华黄先生文集》，《四部丛刊初编·集部》卷77，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67年第2版；卷35第365页（下册）；伯希和《马可·波罗行纪校释》卷1，第581-582页（亦见第120-121页下Caçan条）；伯希和著《郑和下西洋考》第431-432页（引钱大昕文）；《古代南海地名汇释》第366页；喻常森《元代海外贸易》第112、114-115页；陈高华《元代的航海世家甘浦杨氏——兼说元代其他航海家族》，刊《海交史研究》1995年第1期，第4-8页；Karashima Noboru著《13-14世纪南印度与中国的贸易关系》，刊《东西海交关系研究》1989年第1期，第75页。

元明文献中忽鲁谟斯

德亚斯国 (Pandyas) 无关。^①

最后一则记述到“忽鲁谟斯”的简短文献出现在《异域志》中，该书的成书时间和出处不详。可能出自元朝的一位官员周致中之手，他很有可能也像汪大渊那样访问过许多海外国家。周氏的文本被后人篡改了，《异域志》中称“忽鲁谟斯”为“虎六母思”；^②

① 《元史》卷123第3038页载：忽必烈曾派一使节往忽鲁谟斯。伯希和《马可·波罗行纪校释》卷1，第581页；《岛夷志略》第367页注释1；《古代南海地名汇释》第949页。关于1299年使节问题，可参见：朱杰勤著《中国和伊朗》第72页；李玉昆著《泉州海外交通史略》，泉州历史文化丛书，厦门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8页。关于不阿里请参阅：刘迎胜著《从〈不阿里神道碑铭〉看南印度与元朝及波斯湾的交通》，刊《历史地理》1985年第7期，第90-95页；刘迎胜著《从〈不阿里神道碑铭〉看11-15世纪中国与阿曼关系》，收入Matallah bin Ali Habib al-Lawaty主编《阿曼苏丹卡布斯大学1990年丝绸之路国际学会研讨会论文集》（马斯喀特：1990年12月20-21日，阿曼苏丹国文化遗产部1992年），第77-82页；葡萄牙鬼著《元代和明初南印度地区考》，刊《法兰西远东学院学报》卷80第1期（1993），第141-142页。不阿里的故事同马立克·伊斯兰（Malik al-Islami）有联系，他的儿子法哈尔丁·艾哈迈德（Fakhr ad-Din Ahmad）于1299年被派往中国，后来在科罗曼德尔（Coromandal）海岸附近逝世。参见：鄂法兰著《13-15世纪时期的忽鲁谟斯君王》，第99页；在《大德南海志》中也提到了“加刺哈特”，参见伯希和《马可·波罗行纪校释》第582页及刘迎胜（1985）文第91页。有关穆斯林在泉州出现的论著颇丰，可参考吴文良《泉州宗教石刻》，“考古学专刊”乙种7，北京：科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60页及拓片147，以及《海交史研究》的相关文章。

② 周致中著，陆峻岭校注《异域志》，中外交通史料丛刊本，中华书局1981年版；此书与耶律楚材《西游录》一起被收入系列丛书中，第23页。另参见葡萄牙鬼著《海洋亚洲的形象》第49、52页。

虎六母思，其国在西南海中，回纥之国。
其地至热，出番布、珍宝，与西洋国颇同。^①

周致中的书中充满了许多离奇的故事，并对《异域图志》（可能是明初作品）及后来的一些百科全书产生了一定影响。但不知何故，这些文献中都没有对“虎六母思”的记述进行统一。因此，我们将转到另一个命题，即明代中国与忽鲁谟斯的外交关系上来。在下章中对明初文献中记载的双方外交使团的事迹进行研究。

① “回纥”系唐代对维吾尔人的旧称，“西洋国”似乎是古里。参见葡萄牙人著《完美的夷国：元明文献中的古里》（Ein mustergültiges 'Barbarenland': Kalikut nach chinesischen Quellen der Yuan- und Ming-Zeit，收入 Denys Lombard 和葡萄牙人主编《海洋亚洲的形象与现实》，刊《南中国与海洋亚洲》第1辑，威斯巴登：Harrassowitz Verlag，1994，第86-88页；葡萄牙人著《明初中国与古里的通使与贡使》，刊《皇家亚洲学会会刊》（1989）第81期，注释1及第83页。

元明文献中●忽鲁谟斯.....

明初忽鲁谟斯 与中国之间的往来使节

郑和前三次下西洋（公元 1405~1407 年、1407~1409 年和 1409~1411 年）的终点站是马拉巴尔（Malabar）海岸。毫无疑问，当时的明朝廷知道印度以远的许多国家，但郑和奉旨启锚前往这些遥远的西洋国访问的时间是壬辰年 11 月 18 日（公元 1412 年 11 月 18 日，回历 815 年斋月）。有趣的是，在这道 1412 年的圣旨中只提到印度洋西部的一个地方——忽鲁谟斯。^①郑和于 1413 年年底或 1414 年年初借北部季风到来之际离开中国，考虑到船队要在沿途港口停泊，他可能在 1414 年年末或 1415 年年初才抵达忽鲁谟斯。郑和很可

①《明实录》（太宗实录）卷 134，第 1639 页。刘家港和长乐碑中还提到“忽鲁谟斯等国”是第四次航行的目的地；见 Duyvendak 著《15 世纪初中国人海上探险日期考》第 347、393 页。《明实录》提到的访问地名“比刺”和“迭刺”仍存争议。参见《古代南海地名汇释》第 176~177 页，第 391 页。Geoffrey K. Wade 翻译了有关中国与南亚、东南亚及更远的西洋国家关系的所有《明实录》中的文献，其论著有《〈明实录〉中的 14~17 世纪东南亚史料》8 卷，香港：1994 年，未出版的博士论文。在下文中我们多引用 Wade 的译文。

能于 1415 年 1 月或 3 月时起锚返航，因为主船队于 1415 年 8 月 12 日（回历 818 年 6 月 5 日 7 月归锚）回到了中国。^①

据《明实录》的记载，在郑和第四次下西洋回国之前，忽鲁谟斯国派遣的第一个使团已抵达南京。当郑和的船队还在返回印度的途中时，该使团已于 1414 年 8 月 28 日（回历 817 年 6 月 11 日 7 月甲寅）献上贡品。忽鲁谟斯国使团首领名叫“己即丁”（首字“己”易误为“巳”或“已”）。伯希和认为该名是 Izz ad-Din 的译音。^②

在下面我们将看到，该使团在后来的著作中有些混淆。先看《明史》的记载：^③

永乐十年（1412 年），天子以西洋近国已航海贡琛，稽颡阙下，而远者犹未宾服，乃命郑和赍玺书往诸国，赐诸番王公嫔妃锦缎彩绵等物。于是，忽鲁谟斯王遣己即丁携金叶表文、马匹、方物来献。永乐十二年（1414 年）抵京，鸿胪卿奉旨赐宴，并依贡品作价如数赐还云。

①《明实录》（太宗实录）卷 166，第 1859 页；米勒斯著《马欢》第 9、12~13 和第 15~17 页；葡萄鬼著《明初中国与古里的通使与贡使》第 81~111 页，尤其是第 101 页。

②《明实录》（太宗实录）卷 154，第 1776 页；伯希和著《郑和下西洋考》，第 431~432 页。

③《明史》卷 326，第 8452 页。

元明文献中忽鲁谟斯

显然,《明史》的编纂者认为郑和促成了当时的忽鲁谟斯国王古特卜丁·费鲁兹沙派遣了 1411 年使团——旨在执行 1412 年御旨。这种观点看来是不对的,因为郑和的第四次远航船队在 1413 年年底尚未离开中国。对此可有两种解释:一是忽鲁谟斯国王主动派来了贡使;二是他通过其他途径收到了中国皇帝的信。

不管怎样,在我们此前能看到的著作中,《明史》的编者从未犯过这类严重的错误。第一部文献是《寰宇通志》(1452 年成书),是一部非常流行的采用了错误资料的长卷,其资料来源于《大明一统志》(1461 年初版)。不知何故,两书编者都将“忽鲁谟斯”当成两个国家——“忽鲁谋思”和“忽鲁母恩”(显然是将“思”错成“恩”),而没有注意到两者实为一国。关于“忽鲁谋思”书中说:该国在永乐年间派来了一位叫“马刺足”的贡使,但未注明具体的年份。关于“忽鲁母恩”书中说:该国于永乐三年(1405 年)遣己(巳)即丁来贡。^①毋庸赘言,这些说法在《明实录》中不能得到证实。

在另一些资料中还重复了这件事。有的甚至把两次贡使来华时间都说成在永乐三年(1405 年),有的资料

① 陈循等纂《寰宇通志》10 册(台北:广文书局 1968 年版)卷 118,卷 220;李贤等纂《大明一统志》第 10 卷(台北:文海出版社 1965 年版)卷 90,第 5563~5564 页。两书情况可参阅:L. Carrington Goodrich 著《14~15 世纪奥地文献考释》,收 Monumenta Serica 卷 15(1956),第 203~212 页;亦见伯希和著《郑和下西洋考》,第 431~432 页。

则说成在永乐五年（1407年）、永乐七年（1409年）等。^①然而我们要知道，当时郑和船队尚未访问忽鲁谟斯。

在此我们要回到忽鲁谟斯国末期的情况。在纳坦兹氏（Natanzi）的《历史》书上有一则资料说，明代中国与忽鲁谟斯的首次外交通使发生的古特布丁统治忽鲁谟斯时期。纳坦兹注释说：“他是这样的一个人物，以至于密思尔（Misr/埃及马姆鲁克朝）苏丹和契丹大汗（Khans of Khata'i，中国大汗）都通过陆海两路寄信给他。”^②毫无疑问，把同中国与埃及的关系扯到一起可提高忽鲁谟斯国王的声誉。但该书中并未说明中国皇帝的信（或一些信）是何时送到忽鲁谟斯的。在1417年年中之前，古特布丁一直统治着忽鲁谟斯，而纳坦兹氏是在1414年10月呈交的《历史》，所以在此之前发生类似事件的各种日期似乎都是可能的。^③总之，当时双边关系业已建立，但无论是在中国文献还是在其他资料中均未发现更多的细节。

① 郑鹤声、郑一钧编《郑和下西洋资料汇编》，齐鲁书社1983年版，第1801~1804页；还可参阅：《皇明四夷考》、《咸宾录》、《武备志》、《商辇》、《皇明象胥录》、《罪惟录》、《明史》等（见下面的《其他文献》段的详细书目），以及《西洋朝贡典录》卷下，第111页。

② 《穆因历史选编》第18页。纳坦兹称古特卜丁的本名为“巴赫曼”（Bahmani），正确的应是塔哈马坦（Tahamtan）。参阅鄂法兰著《16世纪初的忽鲁谟斯国》第129~131页注释131。

③ 鄂法兰著《16世纪初的忽鲁谟斯国》，第131页。

元明文献中●忽鲁谟斯.....

对上述难题我们没有肯定的答案，不过有几个证据可以帮助我们缩小问题的答案。第一个问题是 1414 年的忽鲁谟斯贡使问题。如果这位贡使直接前往中国，他应在 1414 年年初离开忽鲁谟斯，并于当年的 5 月或 6 月（回历 817 年 2 月或 3 月）抵达满刺加（今马六甲）。正如我们所知，那时郑和还在前往印度的途中，或许他是在满刺加或附近遇到忽鲁谟斯贡使，将 1412 年的御旨告诉了贡使。如果是这样的话，就可以解释《明史》编者认为中国皇帝的御旨和忽鲁谟斯贡使之间存在因果关系的原因，但未能解释纳坦兹氏提到的中国皇帝寄信一事。因为郑和不可能在 1414 年 10 月（回历 817 年 8 月）之前（即忽鲁谟斯贡使出发之前）到达忽鲁谟斯。其次，费信说他加入了杨敕率领的中国使团，该使团于 1412 年（回历 815 年）前往榜葛刺（今孟加拉国），1414 年（回历 813 年）返回中国。如果该使团于 1412 年年末或 1413 年初离开中国，则存在这种可能性：即有一位中国特使已经出发正从满刺加前往忽鲁谟斯的途中，忽鲁谟斯是他在数月后才能抵达的目的地，而此时的忽鲁谟斯贡使已即丁尚在为 1414 年的访问作准备。或者是当杨敕和费信开始海上航行时，忽鲁谟斯 1414 年派遣的贡使也在来华途中，于是双方在东南亚的某地不期而遇。但无论是哪种情况都存在这种可能，即杨刺

或费信将己即丁带到了中国。^①第三,《殊域周咨录》(成书于1574年)称:郑和第三次下西洋时(1409~1411年),将船队分成三队,其中的一队被派往忽鲁谟斯和亚丁。在另一地方则说,郑和本人于永乐七年(1409年/回历812年)抵达忽鲁谟斯。这些说法可能都来源于陆容的《菽园杂记》,其中提到郑和第三次下西洋的目的地中有忽鲁谟斯。此外,在一块碑铭上记载说,一个叫周闻(1385~1470年/伊历787~875年)的人于永乐七年(1409年)被选派随大明帝国船队访问了“忽鲁谟斯等国”。如果该碑文可信,则周闻就参加了1413年、1417年、1421年和1431年,以及1424年的另外一次西洋之行。但我们对此知之不详,他抵达的目的地也未载明。因此,他是否真的到了忽鲁谟斯,我们不得而知。如果《殊域周咨录》和碑文属实,那么答案可能是船队在某地分航后,周闻被编入了直接前往波斯湾的船队。因此,可能是一些船在前三次的航行中有一次到了印度洋以外的地区。但如前所述,对于这些问题,我们却无法在《明实录》或其他古代文献中得到证

① 详见费信《星槎胜览》,第31页注释3。关于中国和榜葛刺关系的论著颇多,可参见Haraprasad Ray著《印中关系中的贸易与外交:15世纪的榜葛刺研究》,新德里:Radiant Publishers 1993,第64页等。与明朝有关的资料选,可参阅耿引曾纂《汉文南亚史科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北京大学南亚研究所编《中国载籍中南亚史料汇编》(两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



元明文献中●忽鲁谟斯.....

实。^①毋庸赘言，忽鲁谟斯国王早先通过“单方便使”收到的书信，与1412年（回历815年）收到的书信不同。第四，尽管伊朗国内政治上长期动乱，但忽鲁谟斯仍能通过设拉子同中国保持着联系。根据《明实录》的记载，设拉子派遣的使臣曾于1413年夏来华朝贡，他显然是通过陆路到达中国，并很快又从陆路返回。也许是他带了中国皇帝的信返回后，很快从设拉子去了忽鲁谟斯，这时1414年初（回历816年末）的忽鲁谟斯使节正准备去中国。^②但是，正如前所述，这只是一种猜测。最后，在明中后期提到的忽鲁谟斯国在1414年（回历817年）之前向中国派遣了一次（或数次）贡使之事，可能并非完全不正确。理由如次：在《寰宇通志》和《大明一统志》两书中都报告了《明实录》中未曾记载的某些细节。虽然这些细节在多大程度值得相信，我们不得而知，但我们最好不要去否定它们。换言之

① 严从简著、余思黎校释《殊域周咨录》卷8第306、307页，卷9第318页；陵客撰《菽园杂记》，丛书集成两卷本第329-330页，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卷3第23页；还可参阅：伯希和著《郑和下西洋考》，第282-284页；郑一钧著《论郑和下西洋》（北京：海洋出版社1985年版），第208-211页；纪念伟大航海家郑和下西洋580周年组委会编《郑和史迹文物选》，人民交通出版社1985年版，第24-25页，第43页；清代宗教著作《天妃显圣录》中说：陈庆于永乐七年（1409年）出使，他也许属于“分队”指挥官之一。参见 Gerd W. W. 著《天妃显圣录》（Die Aufzeichnungen von der manifestierten Heiligkeit der Himmelsprinzessin），刊 Monument serica monograph series 第29辑（Nettetal: Steyler-Verlag, 1992）第222-225页。

② 《明实录》（太宗实录）卷140，第1690页（六月癸酉）。

之，可能是《明实录》的编者没有注意到忽鲁谟斯稍早曾派遣过一次贡使（尽管有点不太可能），于是《寰宇通志》和《大明一统志》的编者混淆了，以致他们用两个不同的名字两次提到该国。从而表明某些细节同他们（可能）曾经见到的档案有出入，而这些档案目前已经遗失。

在此我们回到 1414 年贡使问题上，并概括一下后来的全部使团情况。此事可以直接完成，因为这些原始资料比上面讨论到的时间要清楚得多。为方便起见，兹将忽鲁谟斯与中国的外交活动按照《明实录》记载的年代顺序分段节录如下：

1) 永乐十二年（1414 年）8 月 28 日（回历 817 年 6 月 11 日）：已即丁使团随同彭亨贡使来华，献马匹和方物。^①但《明实录》中没有提及《明史》上记载的金叶表。

永乐十三年冬十月乙未（1415 年 12 月 20 日/回历 818 年斋月）：忽鲁谟斯等国的贡使请辞，皇帝命礼部赏赐钞币、文绮、通宝等钱物。已即丁是否在其中没有记录，他名字未被提到，我们也不知道他们是如何回去的。他们或许在中国一直住到了 1417 年，在郑和第五次下西洋时才一起离开中国。另一种可能是，稍候的侯显于 1415 年 8 月（回历 818 年 6 月）奉旨前去榜葛刺，他于 1415 年 11 月 20 日（回历斋月 16 日）之后从中国

^① 《明实录》（太宗实录），卷 154 第 1776 页。

元明文献中 忽鲁谟斯

动身时，才把这些贡使带走。^①最后，因已即丁的名字未列在回国贡使的名单中，所以不能排除这样一种可能，即《明实录》有关1415年11月（回历斋月）的贡使可能与忽鲁谟斯第二位佚名的贡使早于（或晚于）已即丁到了中国。

《星槎胜览》的作者费信说，他于1415年随郑和到了榜葛刺，继续访问了忽鲁谟斯和其他国家之后于1416年返回中国。此事引起几点疑问：其一，郑和1417年之前尚未回去；其二，《明实录》未证实费信访问之事；其三，即使费信真的在1415年出使的话，可能是加入侯显的使团，该使团应在1415~1416年（回历818~819年）冬季离开中国。但如果这样，出访忽鲁谟斯和访问归来的时间将减少一年。只有在非常适宜的气候条件下才能完成如此快速的“往返航行”。^②

2) 永乐十四年十一月戊子（1416年11月19日/回历819年斋月27日）：“占城……忽鲁谟斯等国各遣使献马匹及犀象方物。”由于《明实录》有关记载的文法结构不清，我们很难分清什么贡品来自哪国。^③我们对这些贡使如何来华也不得而知。也许忽鲁谟斯贡使是从

① 同上书，卷166第1589页（侯显），卷169第1882页（赏赐贡使）；Duyvendak 著《15世纪初中国人海上探险日期考》第379~380页；葡萄牙著《明初中国与古里的通使与贡使》第101页。

② 详见费信《星槎胜览》，第32页及注释4，第73~74页及注释208。

③ 《明实录》（太宗实录）卷182，第1963页。

忽鲁谟斯随同费信的船来的，抑或是在来华途中遇到了侯显。

永乐十四年十一月丙辰（1416年11月26日/回历819年10月5日）：“赐满刺加……忽鲁谟斯等国及宣慰司使臣宴。”^①

永乐十四年十二月丁卯（1416年12月28日/回历819年11月8日）：“古里……忽鲁谟斯诸国及旧港宣慰使司使臣辞还，悉赐文绮裘衣，遣中官郑和等赍敕及锦绮、纱罗、丝绢等物偕往赐各国王。”他们可能是随郑和第五次下西洋的船队于1417年年初回国。^②当年的五月郑和在泉州。在泉州的一处穆斯林墓地附近发现的《郑和下西洋行香碑》中称：“钦差总兵郑和，前往忽鲁谟斯等国公干，永乐十五年五月十六日（公元1417年5月30日）于此行香，望灵圣庇佑。”（忽鲁谟斯在该碑中是唯一被提到的国家）此碑因表明了郑和的宗教信仰而在许多研究中广为引用。我们可以这样推测：其他更远的下西洋航行是通过正常途径进行的，郑和的

① 《明实录》（太宗实录），卷182，第1963-1964页。

② 《明实录》（太宗实录），卷183，第1969-1970页；葡萄牙人著《明初中国与古里的通使与贡使》，第102页。

元明文献中 忽鲁谟斯

船队可能于 1417 年年底或 1418 年年初抵达忽鲁谟斯。^①

3) 永乐十九年正月戊子 (1421 年 2 月 26 日/回历 824 年 2 月 22 日): “忽鲁谟斯等国贡使再次献马及方物。”同条下还记载说: 礼部奉旨赐宴招待这些贡使。有趣的是, 忽鲁谟斯国的名字排在 16 个遣使国家名单的首位, 但未记录这些使臣的名字。这些贡使如何及何时抵达中国, 记载欠详。但他们可能来得更早, 是在 1419 年夏郑和船队第五次下西洋归国时随船抵达中国的。^② 如果这样, 就同刘家港及长乐的石铭记载不谋而和。两通碑刻在提到郑和船队第五次下西洋时都说: “永乐十五

① 碑文可参阅: 郑鹤声、郑一钧编《郑和下西洋资料汇编》卷 2, 第 982-983 页; 《西洋番国志》第 50-51 页; 《郑和史料文献选》第 59 页; 陈达生主撰《泉州伊斯兰教石刻》, 福建人民出版社 1984 年版, 第 55 页, 第 60 页, 图版 206 号, 第 96-97 页; 葡萄牙著《明代戏剧及小说中的郑和下西洋研究》(Cheng Hos Abenteuer im Drama und Roman der Ming-Zeit. Hsia His-yan; Eine Übersetzung und untersuchung. His-yang Chi: Ein Deutungsversuch), 刊 Münchener Ostasialische Studien 第 41 辑 (Stuttgart: Frani Steiner verlag, 1986), 第 107 页注释 15。从理论上讲, 在我们的编年表中, 《明实录》后来记载的当是永乐十八年 (1420 年 6 月 14 日/回历 823 年 6 月 2 日) 的事。该条中说: “永乐十八年 (1420 年) 五月辛未, 命行在兵部, 凡使西洋忽鲁谟斯等国回还官旗二次至四次者, 俱升一级。于是升龙江左卫指挥朱真为大宁都指挥僉事, 掌龙江左卫事, 水军右指挥使唐敬为都指挥僉事。余升如例。”有关他们同忽鲁谟斯的联系情况, 我们一无所知, 所以该记载对本文毫无意义。参见《明实录》(太宗实录) 卷 225, 第 2211 页。在长乐碑和《明实录》(太宗实录) 卷 168 第 1870 页中也提到朱真和唐敬。

② 同上书, 卷 214, 第 2149 页 (郑和返航); 卷 233, 第 2255 页 (纳贡)。

年，统舟师往西域；”接着提到各国贡品时说：“其忽鲁谟斯（其名字排在名单首位）进狮子、金钱豹、西马。”^①这两通碑刻均未提到外国贡使到达中国的具体日期，但我们有两种可能的解释：（1）这些贡使确实是与郑和于1419年抵达的中国，抵达后等到了1421年2月（回历824年2月）时才正式在京城被召见。（2）另一名贡使于1420年初离开忽鲁谟斯单独来华访问，但他的访问在《明实录》中没有记载。在这种情况下，碑刻中提到的是一个使团，而《明实录》中提到的是另一个使团。

永乐十九年正月丙巳（1421年3月3日/回历824年2月3日）：在《明实录》2月份记事中提到各国贡使随郑和第六次下西洋的船队返回：“忽鲁谟斯等十六国使臣还国，赐钞币、文绮……复遣太监郑和等赍敕及锦绮、罗綾绢等物，赐诸国就与使臣偕行。”^②忽鲁谟斯的名字仍排在首位。有趣的是，刘家港和长乐的碑文都提“忽鲁谟斯等国”，强调了忽鲁谟斯的重要性，并补充说：“永乐十九年，统领舟师，遣忽鲁谟斯等各国使臣久居京师者，悉还本国。”这似乎可以支持上述的第一种解释。

就在这个时候，帖木儿皇帝沙赫鲁赫（Shahrukh）派遣的一使团来华，而帖木儿王子正驻在中国。基亚斯丁·纳嘎沙氏（Ghiyath al-Din Naqqash）记载了该使团

① 碑文的译文见 Duyvendak 著《15世纪初中国人海上探险日期考》，第348、345页。

② 《明实录》（太宗实录）卷233，第2256页。

元明文献中忽鲁谟斯.....

的详情。他说使团于 1420 年 12 月 14 日（回历 823 年 12 月 8 日）抵达中国，1421 年 5 月（回历 824 年 5 月 1 日）离开中国。^①但未提及帖木儿贡使看到忽鲁谟斯同行一事。显然两个使团是独自行动的。这也许可以看作是中国对亚洲海岸地区的政治影响，以及帖木儿王朝时期忽鲁谟斯自治的标志。

4) 对中国来说，1420~1422 年（回历 823~825 年）是一段“特殊的”年份，因为在这几年发生好多很不寻常的事件。帝国的首都从南京迁到北京——这可以对郑和 1419 年夏回国和 1421 年 2 月正式接见贡使相隔时间太长作出解释。1422 年 5 月初（回历 825 年 5 月末），新建的宫殿被焚毁——基亚斯丁的记述中称之为“非常不吉利的事件”，以及皇帝的一个大敌阿鲁泰（Alutai 或 Aruktai）在 1421 年（回历 824 年）拒绝纳贡。次年，帝国对蒙古第三次征讨开始。^②尽管当时帝国的政治中心北移，但海上“边界”活动仍在继续。除了 1421 年 3 月郑和第六次奉旨下西洋外，在文献中还发现

① W.M.Thachston 译《君王的世纪：帖木儿朝的历史与艺术文献》（麻省剑桥：The Aga Khan Program for Islamic Architecture, 1989），第 279~297 页。基亚斯丁的传奇在《撒马尔甘迪》第 477~529 页有记载。另参见：哈菲兹·阿卜鲁著，赛义德·卡迈勒·哈吉·赛义德·贾瓦迪校释《历史的精华》2 卷本，德黑兰：伊朗文化与伊斯兰指导部 1993~1994 年版，第 817~865 页，日期可参阅第 836 和 862 页。

② Edward L.Farmer 著《明朝初期的政府及两京之演变》，麻省剑桥：哈佛大学出版社 1976 年版，第 112~113 页，第 122~123 页；哈菲兹·阿卜鲁著《历史的精华》卷 2，第 861~862 页。

其他两道圣旨。这两道圣旨均见巩珍著作。其中的永乐十九年十二月初十日（1421年1月13日/回历825年1月19日）圣旨时分有趣，它提到了被派往“忽鲁谟斯等国”的杨庆。而数月前，另外几个使团曾奉命访问了暹罗（Siam）和占婆（Jaunpur）。^①在《明实录》中未记录这些贡使的来华路线，我们对杨庆访问忽鲁谟斯的日期也一无所知。我们可以提出这样的疑问：杨庆同前面有关中国与榜葛刺之间外交关系中提到的杨敕是否有关。此外，《明实录》也未告诉我们他的使命是否同郑和的使命是否一致。

永乐二十一年九月戊戌（1423年10月24日/回历826年11月18日）：根据《明实录》这一天的记载：“礼部奏：西洋古里、忽鲁谟斯、锡兰山、阿丹、祖法儿、刺撒……等十六国遣使千二百人贡方物至京。上赐皇太子曰：天气向寒，西南诸番国贡使，即令礼部于会同馆宴劳之，如例赐赏遣还。其以土物来市者，官给钞，酬其直。”忽鲁谟斯在这16国名单顺序中位于第二位。关于这些贡使如何来华和怎样归国的详情，我们也不得而知。他们也许是跟随几天前到达京师的周鼎来的。^②

① 《西洋番国志》第9-10页；葡萄牙人著《明初中国与古里的通使与贡使》第103-104页，及其他资料。《天妃显圣录》（第227-228页）一书记有1421年访问榜葛刺一事。有关此事详情，请参阅李献璋著、郑彭年译、刘月莲校注《妈祖信仰研究》，澳门海事博物馆1995年版，第125-126页。

② 《明实录》（太祖实录）卷263，第2403页，详见葡萄牙人著《明初中国与古里的通使与贡使》第104页。

元明文献中忽鲁谟斯.....

在此我们可以简要归结一下上述问题。在明永乐年间,《明史》总共记载有4位忽鲁谟斯贡使访华,这与《明实录》记载的情况相符。据《明史》的记载,在接下来的仁宗朝,无忽鲁谟斯贡使来朝。^①在1414年前是否有其他贡使来过中国,我们也不清楚。可能《明实录》漏载了一次此前来华的贡使,但也可能是后来的文献对此作了误载。

5) 宣德元年春正月癸卯(1424年2月15日/回历829年6月6日):尽管仁宗皇帝于洪熙元年(1425年)停止了下西洋活动,但在他短暂的执政期间,中国和忽鲁谟斯的联系也未中断。这种推测是基于《明实录》宣德元年(1424年2月15日/回历829年6月6日)的记载:“骁骑右卫指挥金事刘兴等二百二十人奉使忽鲁谟斯等国还,进方物,命行在礼部记直赐钞。”^②《明实录》对此事仍未记录更多的细节。有关刘兴下西洋并滞留忽鲁谟斯的情况,我们一无所知。此外,《明实录》的记载含糊,没有说清在这220人中是否有忽鲁谟斯(或其他西洋国家的)贡使,或这220人全部(或大部分)是中国官员,是他们在外国采集了贡品(包括采自忽鲁谟斯的贡品)呢,还是代表各国使节献给中国皇帝。如果有忽鲁谟斯“常规的”贡使也在其中的话,他应该至少在1425年(回历828年)初动身,并且他可

① 《明史》卷326,第8452页;葡萄牙著《明初中国与古里的通使与贡使》第105页。

② 《明实录》(宣宗实录)卷13,第347页。

能是由 1417 年 9 (回历 820 年) 即位的忽鲁谟斯国王赛弗丁·马哈尔主动派遣的。总而言之,从 1425 年~1431 年 9 月(回历 828~834 年)间,中国和忽鲁谟斯的联系明显减少。可能是赛弗丁曾努力故意改变了这种状况。

6) 宣德八年闰八月辛亥(1433 年 9 月 14 日/回历 837 年 1 月 28 日):《明实录》这天的记载证实了赛弗丁派遣使臣马刺足抵达一事:“朔苏门答刺国王……忽鲁谟斯国王赛弗丁遣番人马刺足等西洋九国使臣来朝贡,献麒麟、象、马诸物。上御奉天门受之,行在礼部尚书胡濙以麒麟瑞物,卒率群臣辅贺。上曰:远方之物,朕非有爱,但感其尽识远来,故受之,不足贺也。”^①如我们所知,麒麟在中国是吉祥的动物,但宣宗皇帝对此未予更多好评。这次忽鲁谟斯国使臣未列在外国使臣名单之首,而排在了苏门答刺、古里等国使臣之后。

在此之前的宣德五年六月戊寅(1430 年 6 月 29 日/回历 833 年 10 月 7 日),郑和奉旨第七次也是最后一次

① 《明实录》(宣宗实录),卷 105,第 2341 页。有关麒麟(长颈鹿)问题,可参阅: Duyvendak 著《15 世纪初中国人海上探险日期考》第 32~35 页; Filesi 著《中国与非洲》第 29~30 页。Arion rosu 著《印度艺术中的长颈鹿》(Le giraffe dans la faune de l'art indien),刊《法兰西远东学院学报》卷 71(1982),第 47~61 页。有趣的是,《中国回族大词典》主编邱树森等认为马刺足非常重要,在词典中收录了他的名字,见该书第 1029 页。



元明文献中●忽鲁谟斯.....

下西洋，忽鲁谟斯是他本次下洋的主要目的地。^① 祝允明的著作对本次下洋航路有记载。如前所述，郑和的主船队于宣德八年元月（1433年1月17日/回历836年5月25日）抵达忽鲁谟斯，3月自忽鲁谟斯启锚返航，6月回到中国。^② 《明史》的编纂者说的很对，马刺足来华朝贡是郑和第7次下西洋的结果。^③ 他很可能就是搭乘郑和的船来华访问的。

在马刺足及其同事奉献贡品之后的几天，“丙辰，赐日本、苏门答刺等国贡使宴”（1433年9月19日/回历837年2月3日）。^④ 虽然《明实录》有关这天的记载中未提到马刺足的名字，但他很可能参加了宴会，因为他是同苏门答刺代表一起抵达中国的。

宣德八年庚午（1433年10月3日/回历837年2月17日）：“赐苏门答刺国王弟哈利之汉、古里国使葛不满都鲁牙、柯枝国使加不比里麻……忽鲁谟斯国番人马刺足等（10国）六十六人白金、钞币、绢布及金织袈衣、纱罗绢衣，有差其尽从，赐胖袄、倚鞋，赐哈利之汉等冠带。”忽鲁谟斯国贡使马刺足列在名单最后。所有贡使都分成等级，只有两个例外：苏门答刺国王弟哈

① 《明实录》（宣宗实录）卷67，第1676-1677页。这次出使的圣旨见巩珍《西洋番国志》第10页有记载，日期略有出入。请参阅葡萄牙鬼著《明初中国和古里的通使和贡使》第105页及提及资料。

② 参见葡萄牙鬼著《明初中国和古里的通使和贡使》第105页及提及资料。

③ 《明史》卷326，第8452页。

④ 《明实录》（宣宗实录）卷105，第2344页。

利之汉和忽鲁谟斯国贡使马刺足，他被称为“番人”。^①在《明实录》宣德八年9月14日（回历1月28日）的记载中马刺足也被称为“番人”，但用此贬称的原因不详。也许这种不寻常的突出和事实之间有某种关联，以致于后来的《寰宇通志》和《大明一统志》的编纂者决定把忽鲁谟斯列在两条中。如果马刺足到中国只限于1433年的朝贡使命，则是上述两书的编者在将他与永乐朝联系时出错（见前述）。

到了英宗皇帝即位后，他才让上述西洋诸国贡使经爪哇回国：“正统元年闰六月癸巳（1436年8月11日/回历840年1月27日），遣古里……忽鲁谟斯十一国使臣葛卜满都鲁牙等同爪哇使臣郭信等回国。敕爪哇国王扬惟西沙曰：王自我先朝修职弗怠，朕今即位，复遣使朝贡，诚意具悉。宣德时，有古里及真腊等十一国各遣使朝贡未回，今王使回，特赐海船与各使同还，王其加意抚恤，分遣还各国，庶副朕怀远之心，仍命等十一国使赍敕谕其王。”^②因此这些贡使在中国大约滞留了三年。

7) 明英宗终止了永乐、宣德两朝的下西洋政策，郑和以前的下洋船队（郑和本人在此之前已逝世）被弃之不用，抛锚在中国各港口。尽管如此，仍有一些外国使节来到中国。正统六年十二月辛酉（1442年2月9日/回历845年斋月28日）忽鲁谟斯国的贡使抵达。这

^① 同上书，卷105，第2350-2351页。《明史》中用了“使”，参见卷326第8452页。

^② 《明实录》（英宗实录）卷19，第385页。

元明文献中 忽鲁谟斯

位贡使在《明实录》中叫做“哈只阿里”，他按惯例向中国皇宫献了马匹：^①

礼部尚书胡濙等奏^②：忽鲁谟斯国王速鲁檀土兰沙言^③，其居处极边，在先朝时累遣使往来，以道上下之情。今久不复遣使矣，途因撒不即城^④哈只阿里回，获知大明皇帝为天下生灵主宰，不胜高兴。^⑤今复遣哈只阿里来朝贡马，伏望朝廷宽恩，仍如旧遣使以通道路。缘夷情未可轻信，请颁赐彩缎以慰其贡马向化之意，仍降敕以谕之，俾其安分守法，乐处边

① 《明实录》（英宗实录）卷 87，第 1755-1756 页。译文大部分都根据 Wade 译《明实录》第 1303-1304 页文字。

② 关于此人请参阅 L. Carrington Goodrich 和方朝英编《明传记词典》（1368-1644），亚洲学会明代传记史工程 2 卷，纽约及伦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版，卷 1，第 643-645 页。

③ 指法哈尔丁·土兰沙二世（Fakhr ad-Din Turanshah II, 1436-1470/1471 年/回历 840-874-875 年苏丹）。参见鄂法兰著《16 世纪初的忽鲁谟斯国》第 131-133 页。忽鲁谟斯国王有几种名称，如纳坦兹编《穆因历史选编》第 10 页中叫“马立克”（malik），《贾法尔史》第 250 页上叫“沙阿（padishah）”，同书中也叫“苏丹”（sultan）等。

④ 翻译可能有误。“撒不即城”不得而知。逗号后的“但”，“尔”（有“你”之意）。参见郑鹤声、郑一钧编《郑和下西洋资料汇编》卷 2.2，第 1368 页亦作“途”（“最近”之意），不知是作外来词翻译还是表示使者的名字？

⑤ 同上书，第 1638 页“不胜”一词非常有趣，但在李国祥《明实录类纂》第 1046 页缺。

隧。从之。^①

此文件仅在《明实录》中有载。《明史》中不著此事，而是错误地写道：正统元年（1436年/回历840年）后，双边关系中断。^②但《国榷》一书（成书于1653年/回历1063年）对此作了简短报道：“（忽鲁谟斯国王）土兰沙遣使来朝，请通使。礼部尚书请旨，允之。”^③在我们转入更全面的观察之前应指出两点：其一，据《明实录》的记载“哈只阿里”在1442年前已来华出使一次。如果此事属实，他的这次出使中国很可能在14世纪30年代末（回历834年~834年），或至迟在1440年（回历844年）。这次来华可能不是官方访问，因为双方的官方关系中断已久。其二，“以通道路”一句的真正含义是什么？是忽鲁谟斯因为英宗从海上撤退而考虑通过陆路建立外交和贸易关系，还是建议中国恢复从前的“下西洋”计划？

遗憾的是，各种文献中未能提供可以回答这些问题的任何线索。但很清楚，是土兰沙国王主动要求恢复正式关系。土兰沙国王只对贸易和利益感兴趣，不太在乎

① 最末一句的标点有分歧，李国祥书在“向化”后加了引号，从“其居处”到“通道”也加了引号。其目的显然是表明这部分是奏呈给皇帝的话。

② 《明史》卷326，第8452页。

③ 谈迁辑、张宗祥编《国榷》6卷，北京古籍出版社1958年版，卷2，第1620页。按：文章系双关语，也可能是指国王本人亲自来朝。

元明文献中●忽鲁谟斯●●●●●

那种与中国微妙的外交关系。我们作此推测，系根据《贾法尔史》中的几行记载。这些记载与赛弗丁时期（公元1417~1436年/回历820~839年）有关，其中也包含可用于土兰沙王朝的一些观察：^①

在他（赛弗丁）统治期间，许多中国大船满载货物及丝绸锦缎数度来到忽鲁谟斯。他（赛弗丁）向中国人出售无数（一般的）和王室的珍宝，换回许多中国的金、银、丝绸、瓷器等财宝，充实了国库。

贾法尔没有记载中国使团访问的具体时间，但根据前文可以得知，赛弗丁执政时期正值郑和第五次（公元1417~1419年/回历820~822年）、第六次（公元1421~1422年/回历824~825年）和第7次下西洋（公元1431~1433年/回历835~837年）之时。除此之外，尽管《贾法尔史》对中国人的政治意图只字未提，但总体而言中国只希望所有“贸易伙伴”正式来朝。在一部阿拉伯文书中可以看到中国“首领地位”的一个典型例子。根据该书记载，公元1420年（回历823年）一位中国使节访问亚丁，对处于臣属地位的拉苏里君王苏丹马立

① 《贾法尔史》第251页。Hinz著《帖木儿朝历史的原始资料研究》，第381~382页。

克·纳赛尔 (al-Malik an-Nasir) 作了这样的讲话：^①
 “你的首领，中国皇帝向你问候，并忠告你要安仁守法。”然后，马立克·纳赛尔给永乐皇帝写了一封信，确认了中国的首领地位：“谨遵圣意，吾国即陛下疆土也。”晋见忽鲁谟斯国王的使节的行为不可能太出格，但贾法尔可能忽略了这种举止，反而指出在中国与忽鲁谟斯联系中的“大问题”是物质利益。

如果贾法尔的说法正确，那么中国与忽鲁谟斯间的贸易就是一种国家层面的事务了。忽鲁谟斯统治者向中国人出售珍珠，一般商人（如亚丁商人）是直接卷入了同中国的以货易货贸易，还是借助忽鲁谟斯统治者尚不清楚。^②如果是这样，当地的埃米尔很可能从抵达的中

① Sorjeant 著《也门商贾》第 75 页（引 Ibn ad-Dayba）。1420 年的时间有如下疑问：他是否指的周满（也可能是周鼎、李充或杨庆）？据巩珍讲，杨庆于永乐十八年（1420 年）初奉命出使，于是年（回历 823 年）底出使忽鲁谟斯和阿丹（亚丁）。可参阅：《西洋番国志》第 9 页（杨庆），第 35 页（周和李）；米勒斯著《马欢》第 154~155 页。请注意：《西洋番国志》、两个版本的《瀛涯胜览》和 Ibn al-Dayba 都提到下洋海船的数目，即有三艘船（见米勒斯著《马欢》第 155 页注释 4）。据一本作者佚名的《刺苏里编年史》（Rasulid Chronicle）的记载证实，明代对亚丁进行过另一次访问（见 Sorjeant 著《也门商贾》第 74~75 页）。该书中记载的访问时间是 1419 年 1 月（回历 821 年 12 月），与郑和第五次下西洋时间相符。这次下西洋可能在永乐十五年（1417 年）秋启航，永乐十七年（1419 年）夏回国。因此，船队可能于 1419 年 1 月在亚丁作短暂停留。

② 鄂法兰在《16 世纪初的忽鲁谟斯国》第 149 中说，忽鲁谟斯商人不是官方使团。关于亚丁请参见米勒斯著《马欢》第 155 页。

元明文献中●忽鲁谟斯●

国船只中获得了好处。此外，贾法尔的“进口宝物”货单类似费信列举的货单：金、银、青花瓷、丝绸、锦缎（费信还提到安息香、檀木、胡椒等），^①总之，对于这种推测还有这样一些原因：赛弗丁，还可能包括忽鲁谟斯精英们在同中国的官方交往中得到巨大利益，而土兰沙国王也想充实国库，因此促使他提出了恢复贸易关系的建议，甚至不惜以口头上“表示遵从”为代价。

撒马尔甘迪也提到忽鲁谟斯与中国的关系，但他的话很简短。他称“忽鲁谟斯万商云集”，其中有中国本土和漠北（Chin 和 Machin）的商人。他还说：“中国各地之人……用船满载稀世珍宝，披星戴月，风雨无阻，穿洋过海，云集此城（忽鲁谟斯）。”^②有趣的是，撒马尔甘迪根本没有抬高中国地位之意，只是作为一个国家提到而已。他也没有提及中国人来此的政治意图和具体日期。我们很难说，撒马尔甘迪是想让读者了解曾经蔚为“壮观”的郑和下西洋行动，或者为了强调忽鲁谟斯的世界性角色而提到中国。但如同《贾法尔史》那样，似乎十分地清楚：在忽鲁谟斯王国末期，在中国与忽鲁谟斯的双边关系中，物质方面的利益比其他任何东西都重要。

① 费信《星槎胜览》，第 71 页。

② 《撒马尔甘迪》第 768 页。

明代文献中的忽鲁谟斯

1442年（回历846年）的贡使，可能是史料记载中的忽鲁谟斯向中国派遣的最后一次使节。在此之前的几年，明王朝同印度洋地区的贸易业已终缀。中国人有关忽鲁谟斯的记载反映了这种变化。有关忽鲁谟斯的“第一手”全部材料，如有关郑和时代许多遥远的港口及国家的材料，都由随同郑和下西洋的马欢、巩珍、费信收集整理而成，后来的资料只是重复这三位作者的记述，而没有增加新的东西。

如同汪大渊更早的记载（中文里对忽鲁谟斯最早的记述）一样，马欢、巩珍、费信的著作集中体现了当地的民风民俗特点，其记载没有涉及双方历年的外交关系，我们只好依靠《明实录》。马欢和巩珍撰写的两书十分相似，但因马欢的《瀛涯胜览》更早，故本章将先谈这本书，然后再详谈篇幅较短而稍微不同的费信的《星槎胜览》。^①我们将对每本书逐一进行讨论。如前所述，马欢与费信两书均有英译本，因此无需再作全面翻译。

^① 三书文本的相关性在此不作讨论，这里仅作一个彻底的文献学分析。尽管这样做颇具挑战而且非常困难，但在作为一篇长专论还是有可能的。

元明文献中的忽鲁谟斯.....

《瀛涯胜览》和《西洋番国志》

(成书于公元 1416 年 / 回历 819 年 ◇ 成书于公元 1434 年 / 回历 837 年)

马欢是名通事(翻译),曾参加了郑和的第四、六、七共三次下西洋活动。他可能在第四次和第六次出访中两度访问过忽鲁谟斯,因而他有足够的机会为自己的书搜集翔实的资料。然而,由于他自己的序言作于永乐十四年(1416年/回历819年),因此他对忽鲁谟斯的描述可能仅根据第四次下西洋时的考察,除非是他后来修订初稿时加进了新的资料。他在最后一次下西洋时,随同部分中国船只从古里到了麦加,中间没有经过忽鲁谟斯。“朝觐”麦加对他来说可能有特殊意义,因为他是一名穆斯林。他的信仰在《瀛涯胜览》一书的好多部分包括有关忽鲁谟斯章节中都有体现。^① 巩珍只作为郑和的私人秘书参加了第七次下西洋。可以推测,他随同主



① 米勒斯著《马欢》第34-37页;葡萄牙著《完美的夷国:元明文献中的古里》,第96-100页。关于马欢和伊斯兰教的关系,请参阅Lelievre著《光焰》,第263-266页、第340-341页。

船队到了忽鲁谟斯，但《西洋番国志》一书流传不甚广泛。^①根据以上几点，我们再来研究两书中对忽鲁谟斯的描述。

忽鲁谟斯的地理位置

据马欢和巩珍书中的记载，自古里到忽鲁谟斯海上航行需要 25 日。这种估算是符合实际的。马欢说：“其国滨海倚山。”凡有游历经验者都应该知道，忽鲁谟斯首府在加隆岛上。该书可能指的是整个忽鲁谟斯王国和整个伊朗大陆上的国土。巩珍的书中亦作了这样的描述。这两本书都正确地谈到：“各处番船并早番客商都到此地赶集买卖，所以国民皆富。”

人民与风俗

“（忽鲁谟斯）国王国人皆奉回回教门。尊谨诚信，每日五次礼拜，沐浴斋戒，风俗淳厚，无贫苦之家。若有一家遭祸致贫者，众皆赠以衣食钱本而救济之。”马欢的这些观察实即伊斯兰教的五功（此处未含朝觐），最后一句指的是“天课”制度，伊斯兰要求人们要帮贫扶困。巩珍用稍微不同的句子重复说：“王及国人皆奉回回教门，每日五次礼拜，沐浴持斋，为礼甚谨。”马欢的“尊谨诚信”一句，变成了巩珍的“为礼甚谨”。巩珍是否是穆斯林，尚不知晓；如果他不是穆斯林，那

^① 米勒斯著《马欢》第 56 页；《西洋番国志》向达“序”，第 1-4 页。

元明文献中的忽鲁谟斯.....

就可解释为是他修订后的记述。总之，两书作者都介绍忽鲁谟斯乃一虔诚国度，阿丹国（今亚丁）和祖法儿国（今佐法尔）就不像忽鲁谟斯国那样有宗教热诚，只有天方国（今麦加）是一个例外。^①

意大利旅行家吕多维科·迪·瓦特马（Ludovico di Varthema）于1503年（回历909年）访问过忽鲁谟斯，他比第一位到访忽鲁谟斯的葡萄牙人早几年。他只提到其国王是穆斯林，而没有谈及任何其他细节。马可·波罗也同样说到：“（忽鲁谟斯）人民崇拜穆罕默德。”^②如前已述，忽鲁谟斯不是一个专一的穆斯林社会，相反它具有作为一个国际港口的特点，在那里存在着各种违背习俗的事情和堕落，正如马欢所想象的那样，它不是一个“纯粹”而宗教的社会。撒马尔甘迪的观察甚至更客观，他指出在城内见到许多异教徒。^③

马欢接着说到：“人之体貌清白丰伟”——中世纪时的中国人一般认为白皙皮肤比黑色皮肤好——“衣冠济楚标致。”然而马可·波罗却描述说所有忽鲁谟斯人比较黑。^④巴尔伯萨（Barbosa）认为波斯人和阿拉伯人有

① 米勒斯著《马欢》第151、154、173~174页；《西洋番国志》第34、35、44~45页。

② Varthema著，引自Arnold T. Wilson著《波斯湾》（伦敦：Allen and Unwin 1954年版），第106页；《马可·波罗行纪》，卷1第124页。

③ 《撒马尔甘迪》第768页。

④ 《马可·波罗行纪》卷1，第124页。关于肤色请参见：Frank Diaotter著《现代中国的种族演讲稿》，伦敦：Harst and co., 1992年版，第10~17页。

所不同：“（波斯人）身体魁梧，眉清目秀，真诚而善良……而阿拉伯人比他们肤色深和黑。”^① 泰克希拉氏则强调说：“忽鲁谟斯人大都是白皮肤，身材魁伟。”^② 费信只详细描述了忽鲁谟斯人的衣着。

马欢在接下来的段落中谈到忽鲁谟斯人的婚葬礼仪。他强调说：“婚丧之礼，悉遵回回教规。”他还提到伊斯兰法法官“加的”（即阿拉伯语的“哈的”）qadi。此外，他还详细描述了出殡和坟墓的情形。而马可·波罗和奥德里克（Friar Odoric）则更多地强调了妇女的悲恸。^③

接下来马欢谈到了烹饪。他说：“人之饮食，务以酥油拌煮而食。市中烧羊、烧鸡、烧肉、薄饼、哈喇撒，一应面食皆有卖者。”巩珍及《瀛涯胜览》的另一版本将该词写作“哈里撒”，^④ 其正确的读音当为“哈里撒赫”（Haliseh），这是一道用肉和麦面制作的食物。马欢补充说：“二三口之家多不举火做饭，止买熟

① Duarte Barbosa 著，Mansel Longworth Dames 编译《巴尔伯萨印度洋周边国家居民见闻录》，Works Issued by the Hakluyt Society, 系列 2 第 34 及 49 号，2 卷，伦敦：Hakluyt Society 1918-1921 年版，卷 1，第 91 页。

② 《泰克希拉旅行纪》第 168 页。

③ 《马可·波罗行纪》卷 1，第 125 页；Odoric of Pordtnone, 收入玉尔（Henry Yule）编译，Henri Cordier 校订的《东域纪程录丛》，中世纪中国资料汇编 4 卷，台北：成文出版社 1966 年重印本，卷 2 第 112 页。

④ 米勒斯著《马欢》第 167 页注释 1；《西洋番国志》第 42 页。Haliseh 的正确的波斯名字为 Hariseh（虔诚的伊斯兰贤人的礼物）。



元明文献中●忽鲁谟斯●

食而吃。”巴尔伯萨也证实了这一情况。据马可波罗和伊本·白图泰说，忽鲁谟斯人的主要食物是枣子和鱼，但马欢却未提到这些食物，也许他认为这些食物过于廉价和粗糙。^①

在谈了烹调问题之后，马欢转到了忽鲁谟斯的金融制度上。他说：“王以银铸钱，名底那儿”。^②巴尔伯萨也提到了这种皇室特权，但达麦斯氏（Dames）却否定之。^③在葡萄牙人统治时期流行下列货币：10 底那儿的铜币法尔斯（fals）、拉利—坦格（Lari-Tanga）银币、萨迪（Sadi）银币，价值 1000 底那儿的黑扎勒金币（Hazar）也叫做“半阿什拉菲”（half ashrafi）；完整的“阿什拉菲金币”在葡萄牙文中大都称之为“希拉菲姆”

① Barbosa 著，Dames 译《巴尔伯萨印度周边国家居民见闻录》卷 1，第 97 页；《马可·波罗行纪》卷 1，第 124 页；伊本·白图泰著，Gibb 译注《伊本·白图泰游记》第 2 卷，第 400 页。

②《瀛涯胜览》的多数版本及巩珍都误写成“纳迪尔”。参见米勒斯著《马欢》第 167 页注释 3，及《西洋番国志》第 42 页注释 2。关于波斯当时的货币制度，请参见 Bert.G. Fragner 著《社会与经济事物》，收入 Jahson 和 Lockhardt 著《剑桥伊朗通史》第 556~567 页。

③ Barbosa 著，Dames 译《巴尔伯萨印度周边国家居民见闻录》卷 1，第 99~100 页注释 1；可与米勒斯著《马欢》第 167 页注释 6 作比较。

(xerafim)^①。有趣的是，忽鲁谟斯王朝的缔造者名叫穆罕默德·达尔哈姆·库卜 (Shah Muhammad Dirham-kub)，意即“达尔哈姆人的铸造者”。忽鲁谟斯在这么早的时期 (公元 11 世纪/回历 5 世纪) 否铸造了自己的钱币，我们不得而知，但在加隆岛上有波斯湾地区一家重要的铸币厂。忽鲁谟斯现存的钱币是公元 13 世纪 (回历 7 世纪) 以后的钱币，一些金银币上铸有忽鲁谟斯君王的名字，但多数钱币上面都见不到任何名字。忽鲁谟斯显然是由于其声望的原因没有发行钱币，但却为贸易提供了方便。^②最后，马欢把忽鲁谟斯银币称为“底那儿”，

① Fragner 著《社会与经济事物》第 564 页；Walther Hinz 著《中世纪后期波斯湾地区的货币》(Die spätmittelalterlichen währungen in bereich des persischen golfes, 收 E.C.Bosworth 编《伊朗与伊斯兰教，米诺斯基纪念文集》(爱丁堡：爱丁堡大学出版社 1971 年版)，第 306-307 页；Walther Hinz 著《11-19 世纪的伊斯兰金本位——伊斯兰经济史文献》(Islamische währungen des 11. bis 19. Jahrhunderts, 收 Gold: Ein Beitrag zur islamischen wirtschaftsgeschichte (威斯巴登：Harrassowitz Verlag, 1991)，第 79-80 页；H.L. Rabino di Borgomale 著《1500 年-1941 年间伊朗国王的钱币、勋章和印鉴》(N.P.1945)，第 25 页。关于忽鲁谟斯人的钱币，可参见同书《1500-1941 年间伊朗国王的钱币、勋章和印鉴图册》(牛津大学出版社 1951 年版)，图版第 54。因含量较纯，拉利 (Lari) 是印度洋周围流行的最重要货币之一，它因在拉尔城 (Lar) 铸造而得名。请参见前引 Hinz 著作第 304-306 页，及 Fragner 著作第 563-564 页。

② 在图宾根大学博物馆收藏有数枚忽鲁谟斯钱币，感谢鲁茨·伊里奇博士 (Dr. Lutz Ilisch) 提供消息，让我们可以认真研究之。请参阅 Nicholas Lowik 著《未流通的波斯湾伊斯兰钱币》(1982)，第 251-252 页、258-261 页，刊《伊朗研究》(1982 第 11 辑，第 251-252 页、258-261 页。

元明文献中●忽鲁谟斯.....

可能是为了区别伊朗各地不同钱币的名称（如“坦格”*tāngā* 或“沙赫鲁希”*shahrūkhi*）。

马欢还提到了使用回回文字和市场店铺的情况：“书记皆是回回字，其市肆诸般铺面、百物皆有，止无酒馆。国法饮酒者弃市。”这可能是忽鲁谟斯的特殊法律，因为“沙里亚法”（*shari‘a* 伊斯兰法）规定对饮酒者的处罚是打40至80鞭。显然，马欢是极力想把另一因素加到自己对伊斯兰港口城市“理想”的描绘中。我们前面说过，马可波罗饮过椰枣酒（*nabidh*）：“此地用香料酿海枣酒，甚佳。初饮此酒者，必暴泄，然再饮之，则颇有益，使人体胖。”巴尔伯萨也说：“他们在秘密地方饮了葡萄酒，因为忽鲁谟斯法律禁止饮酒。”^①最有可能的是，禁止饮酒在当时不像今天这么严厉。在几个世纪中，酒都是伊朗人生活和文化的一部分，甚至帖木儿人也嗜好饮酒，忽鲁谟斯人不可能与他们有多大区别。

马欢声称的“文武医卜之人，绝胜他处，各色技艺皆有”的“优越”，给读者留下这种印象：即马欢希望创造出一个空中城堡。他用很长篇幅描述了在忽鲁谟斯见到的“羊上高竿”的杂技表演。这类娱乐活动在许多城市肯定都有，我们会想起基亚斯丁（*Ghiyath ad-Din*）访问北京时笔下的那种相似的描述。^②

①《马可·波罗行纪》卷1，第123页；Barbosa著，Dames译《巴尔伯萨印度周边国家居民见闻录》卷1，第96页。

②前引哈菲兹·阿卜鲁·贾瓦迪《历史之精华》，第845-846页。

环境和物产

马欢在简短地描述当地的气候时，要么提到整个国家——因为他提到那里的树木、霜和重露——要么还打算提供一幅理想的画卷。书中补充说：“其国气候寒暑，春开花，秋落叶，有霜无雪，雨少露多”。^① 然后转而描述了加隆岛的主要山峰及其四方的景色：“有一大山，四面出四样之物，一面如海边出之盐，红色，人用铁锄如打石一般凿起一块，有三四十斤者，又不潮湿，欲用食，则搥碎为末而用。一面出红土如银朱之红，一面出白土如石灰，可以粉墙壁。一面出黄土，如姜黄色之黄。俱着头目守管，各处自有客商来贩卖为用。”加隆岛实际上是由盐（主要是岩盐和石膏）组成。其山峰顶部像雪一样白。在南部可发现红色氧化铁，至今仍有少量开采。^② 马欢的描述与《伊朗历史地名词典》的描述相比较而言，则更好理解：“忽鲁谟斯由色彩斑斓耀眼而又参差起伏的山丘覆盖。其主色调是紫红带白色的条纹矿层，而主要地质成分包括盐岩、红色赭石和绿色粘土。”^③ 泰克希拉和巴尔伯萨也描述了开采和向印度出口盐的事。但泰克希拉说这种盐在忽鲁谟斯

① 米勒斯著《马欢》第169页注释1。

② 德国水利研究所编《波斯湾海域航道手册》（Handbuch für das Rote Meer und den Persischen Golf，汉堡，1983年第6版）第321页；Ehleers著《伊朗：基本地理概况》，第56页。

③ Admesc著《伊朗历史地名词典》卷IV，第181页。

元明文献中●忽鲁谟斯●

不使用，因为它会使肉变质。故忽鲁谟斯人只使用海盐。^①伊本·白图泰补充说：忽鲁谟斯人用山里的岩盐制作装饰船及底座等^②。在讨论到费信的记述时，我们还将涉及这个问题。

忽鲁谟斯的日常生活用品，特别是大米、小麦等农产品，主要依靠进口。除了这两种粮食外，马欢还谈到各种坚果、水果和蔬菜。他用“把聃”（波斯语 *badam* 之对音）一词指杏仁状的水果，也使用中国的通用名称。他还详细记述了葡萄干和椰枣。马欢在此再次提到忽鲁谟斯国全境，而不只是加隆岛。一些产品也可能是从伊朗其他地区进口的。巴尔伯萨证实了忽鲁谟斯食品的丰富，但他又指出食品价格昂贵，因为大都是进口食品。

除了日常必须品外，马欢还列举了在忽鲁谟斯见到的各种贵重物品。下列物品名是根据米勒斯氏的翻译而来：“青、红、黄雅姑石^③，并红刺祖把碧、祖母刺、

① Bardosa 著，Dames 译《巴尔伯萨印度周边国家居民见闻录》卷 1，第 91 页；Teixeira 著《泰克希拉旅行纪》第 165 页。

② 伊本·白图泰著，吉布译《伊本·白图泰游记》，第 400 页。

③ “雅姑”一词（来自波斯文 *yaghut* “宝石”）有几种拼写法。米勒斯根据伯茨内达尔（Bestschneider）的意见把这些宝石分成蓝宝石、红宝石、黄刚玉，参见米勒斯著《马欢》第 170 页注释 9。Duyvendak 将“青”译成“黑”，而不是“蓝”。参见他的《马欢再考》（Verhandelingen der Koninklijke Akademie van Wetenschappen te Amsterdam, Afdeling Letterkunde 新系列 32.3），（阿姆斯特丹：Noord-Hollandische Uitgeversmaatschappij 1933 年版），第 68 页；还可参考费信《星槎胜览》，第 47 页注释 72。

猫睛、金刚钻，^①大颗珍珠如龙眼大，重一钱二三分（约 4.47 克），珊瑚树珠，并枝梗、金珀^②、珀珠、神珠、腊珀，黑珀^③番名撒白值。各色美玉器皿，十样锦剪绒花单，其绒起一二分，长二丈，阔一丈。各色梭

① “刺石”：可能与波斯语 *lal*（红宝石）一词有关；“祖把”与阿拉伯语 *dhubab*（原意为“苍蝇”，也指上等的绿宝石）有关；“祖母刺”（《西洋番国志》中作“祖母绿”）与 *zumurrud*（绿宝石）一词有关；“金钢钻”即金刚石、钻石。还可参见：Dayvendak 著《马欢再考》第 68 页注释 6-8；《西洋番国志》第 43 页，注释 3-5；米勒斯著《马欢》第 170 页注释 10-13。

② 采珍珠是波斯湾的一项重要产业，要研究忽鲁谟斯的珍珠，可参阅 Donkin 著《无价之宝——珍珠与采珠：大发现时代的起源》第 125-126 页统计表；西方有关珍珠和采珍珠的现代资料有：Ludovico de Varthema 著，Folker Reichert 译《东方旅行记》（*Reisen im Orient, Fremde Kulturen im alten Berichdten* 2）（Sigmaringen: Jan Thorbecke verlag, 1996），第 115 页；Pierre Bertius 著《世界地图集》（*livre premier des tables geographiques auguel est traite du monde en general*）（阿姆斯特丹：1618）第 716 页；Barbosa 著，Dames 译《巴尔伯萨印度周边国家居民见闻录》卷 1，第 81-82 页。关于珊瑚请参阅葡萄牙人著《公元 1500-1600 年间中国从亚洲海上进口的珊瑚及花冠考》，刊 *Archipe* 第 139 期（1999），第 65-80 页。

③ 《西洋番国志》一书将“钱”放在“值”字后，因此向达认为“番”字当为“撒白”，意为“琥珀”，须把“值钱”置于下一物品名之前。见《西洋番国志》卷 2，第 43 页注释 6。“撒白值”也可能是阿拉伯语 *Sabj*（黑玉）一词，或波斯语 *Shabeh*（美玉）的译音，参见米勒斯著《马欢》第 171 页注释 1；Duyrendak 著《马欢再考》第 69 页注释 2。“龙涎香”（英文 *ambergris* 来自阿拉伯 *anbar* 一词）在中文中通常称为龙涎，虽然在忽鲁谟斯多有交易，但在马欢的物品单中无载。关于龙涎香，还可参阅费信《星槎胜览》，第 64 页注释 142。

元明文献中忽鲁谟斯.....

幅，撒哈刺毡，毯罗、毯纱，^①各番青红丝嵌手帕，等类皆有卖者。”巩珍也提到同样的物品，但又有所增加。他增加了珊瑚树，删去了各色美玉器皿和毛毡，某些字的写法也有所不同。

至于忽鲁谟斯的动物，马欢说到：“驼、马、骡、牛、羊广有。羊有四样：一等大尾绵羊……一等狗尾羊，如山羊样。”奇怪的是，他为何没有提及在印度洋地区的贸易中占有重要地位的马匹，而是介绍了一种名叫“昔雅过失”的动物，^②或即波斯文 *syah-gash*（意为大山猫）的译音。

结束语

马欢在文末归纳了郑和访问忽鲁谟斯的“成效”：“其国王亦将船只载狮子、麒麟、马疋（巩珍未提到马疋）、珠子、宝石等物，并金叶表文，差其头目人等跟随钦差西洋回还宝船，赴阙进贡。”虽然没提及此事的日期，但米勒斯把忽鲁谟斯这次赴华朝贡的时间与第七次下西洋联系在了一起。据《明史》记载，忽鲁谟斯国的金叶表文于永乐十二年（公元1414年/回历817年）

① 毛织品：“梭幅”可能是阿拉伯文 *Saf* 的译音（意为毛料）。“撒哈刺”：可能是 *sagalat*（红布）或 *saqirlat*（宽幅布）的译音。“毯纱林”（此处随《西洋番国志》一书；即“毯罗纱”，“毯”即“毛”，罗纱意为“薄纱”。因此，“毯纱林”是最好的译名。其他不同的解释，可参阅：米勒斯著《马欢》第171页注释6；伯希和著《郑和下西洋考》第437-438页。

② 米勒斯著《马欢》第172页及注释1。

送达中国（见前述），但马欢认为该表文是在中国船队访问忽鲁谟斯之后才送来的。总之，马欢以最优美的形式介绍了忽鲁谟斯，他描绘了忽鲁谟斯居民的生活方式、虔诚的宗教信仰、丰富的物质生活和繁荣的社会状况等，表现出他在有意提升这个港口的地位和重要性。然而，他是以中国人独特的眼光来观察忽鲁谟斯的，他把一个虔诚穆斯林的热诚与“儒家”或“准儒家”的因素融为了一体。

元明文献中●忽鲁谟斯.....

《星槎胜览》

(成书于公元1436年/回历839年)

费信参加了三次郑和下西洋的活动：第三次、第五次、第七次。他还随杨敕出使过榜葛刺（今孟加拉国）和德里（公元1412~1414年/回历815~817年）。他的《星槎胜览》的记载有条不紊，表明他抄袭了马欢的著作。但他对忽鲁谟斯的描述在许多方面又与马欢的不同。^①

环境和风俗

《集录汇编》本的费信《星槎胜览》到了明末万历年间才发现，该书说自古里至忽鲁谟斯要航行10天，这看来时间似乎很短，而在此前的文本中都未提到两地间的具体距离。^②该书中的另一个奇怪的观察是有关自然环境和动物世界的。费信在书中说：“（忽鲁谟斯）

① 米勒斯著《马欢》第59页；米勒斯/葡萄牙鬼著《费信》第17、31~32、第70~71页。

② 见费信著，冯承钧校释《星槎胜览校注·前记》。《集录汇编》编于16世纪下半叶，刊于1617年。早期的一份文献中记载的航行时间至少是10天，参见黄佐《广东通志》（1561年编纂）4卷（香港大东图书公司，1977），卷66，第56页上（1776页）。

地无草木，牛、羊、马、驼皆食海鱼之干。”这种说法被后来的作者广为引用，尽管费信稍后又补充说：“田瘠麦广，谷米少收，民下富饶。”马可·波罗也说：“每年11月播种小麦、大麦及其他诸麦，次年3月收获。”但这指的是大陆。如今在忽鲁谟斯岛上仍在播种一些大麦。^①总之，我们可以作这样的推测：大部分谷物都是进口的。关于城墙和房舍，费信的观察说：“垒堆石而为屋，有三四层者。”巴尔伯萨也谈到了“用石头和泥灰建造的带平顶的多窗房屋”。泰克希拉说：在岛上开采石头。^②这把我们带到了马欢描述的色彩斑斓的山上。费信在此的记述非常简略，但像伊本·白图泰那样，他注意到了一些用盐土制作的器具，他还补充说饭菜中勿需加盐（因为碟子本身就含有盐分）。^③最后，费信谈到马的饲养以及人民善弓矢骑射。波斯以善骑术而闻名天下，在此，我们会想起四千弓箭手等待进攻奥尔布奎基的情形。^④

① 《马可·波罗行纪》卷1，第125页；Adamec主编《伊朗历史地名词典》第四卷，第181页。

② Barbosa著，Dames译《巴尔伯萨印度周边国家居民见闻录》卷1，第91页；《泰克希拉旅行纪》第167页；也可参见鄂法兰著《16世纪初的忽鲁谟斯国》第92-94页。

③ 这份古怪的附录仅在《集录汇编》本中发现。参见费信《星槎胜览》，第71页注释197。

④ 前引Barros著《亚洲——葡萄牙人在东方海域的发现和占领》，第2编，第2册，第2章。

元明文献中●忽鲁谟斯●

人 民

费信说“民下富饶”。这可能是指生活的一种较高水准，或指的是我们前面在马欢《瀛涯胜览》中已经谈到的富人与穷人之间的互助。费信还对当地人的习俗作这样的评介：“男子拳发，穿长衫，善弓矢骑射。女子编发四垂，黄縑其项，穿长衫。出则布幔兜头，面用红青纱一方蔽之。”这一点也得到了伊斯兰法（hijab）的证实，它告诉我们穆斯林妇女在公共场合的应有装束。但显然费信有机会看到她们的发型和饰品，因为他对这两部分作了详细的描述。他还注意到“臂腕腿足俱金银镯，此富家之规也”。

贸易和物产

费信未提铸造钱币的事，但他说金、银币很流行：“行使金银钱。”他提到下列物品：“产有珍珠、金箔、宝石、龙涎香、撒哈刺、梭眼（即前面谈到的 Sahala）、绒毯。”^①关于忽鲁谟斯的进口货物，他提到有：“货用金银、青白花磁器、五色段绢、木香、金银香、檀香、胡椒之属”。显然这些物品是从不同地方如中国、东南亚及其他地区进口的。



① 在《集录汇编》本中也写成“梭幅”，在其他版本中误作“锁眼”，参见费信《星槎胜览》，第71页注释197。

《寰宇通志》和《大明一统志》

如前已述，在《寰宇通志》（成书于公元1456年/回历860年）和《大明一统志》（成书于公元1461年/回历865年）两书中，忽鲁谟斯的名字分别记载为“忽鲁谟斯”和“忽鲁母恩”。由于这两部著作的影响，《寰宇通志》在传播中存在某些错误，两个条目都已全文译出，我们在此使用《大明一统志》的译文。^①译文中对两书的记述均作了按语，这些按语放在括号内，像两书中其他国家的段落一样，我们用斜体字来编排特定的“说明”：

忽鲁谟斯国。**连续发生变化：**（这些变化从未进行过调查。永乐时（公元1403-1424年/回历806-827年），（其）王遣马刺足等贡方物。有大马、西洋布、狮子，驼鸡高七尺（约2.5米），麒麟似驴，斑纹可爱，^②羚羊尾大，重

① 请参阅本书第48页注①中提到的资料。

② 马欢在《阿丹国》条中提到了“福鹿”（米勒斯著《马欢》第155页注释11），刘家港和长乐碑中提到它与摩加迪沙有关。（Duyvendak 著《15世纪初中国人海上探险日期考》第348、354页。有关“福鹿”还可参见《诸蕃志》（夏德和柔克义译注《赵汝适》第128页注释7），内中附有各种动物画图。

元明文献中 忽鲁谟斯

二十余斤，（按：12 公斤，以车载其尾，方能行赴，^①有长角马哈兽（按：角长过身体）。^②

忽鲁母恩国。连续发生变化：（这些变化）从未进行过调查。永乐三年（公元 1405 年 / 回历 808 年），（其）王遣己即丁等来贡方物。有檀香、沉香^③、胡椒等。

我们不能认为所有贡品都产自忽鲁谟斯，某些贡品须到非洲去寻找。这些贡品也在费信《星槎胜览》的“阿丹国”、“竹步国”和“卜刺哇国”等条中出现过，或许是《寰宇通志》和《大明一统志》两书编纂者把记载这些贡品的文字归到了忽鲁谟斯条下。^④忽鲁母恩的贡品则更多地具有东南亚的特征，它们有时也被列在把二国合在一起的后来的这两本书中。

① 这可能是米勒斯著《马欢》，第 171 页上描述的大尾绵羊（*Ovis platyura*），重 12 公斤可能仅指羊尾。

② 可能指某种羚羊，可参阅：Duyvendak 著《15 世纪初中国人海上探险日期考》，第 348、354 页（铭刻）；Wheatley 著《中国—非洲文选》第 93 页及注释 53。费信《星槎胜览》，第 104 页注释 112；沈福伟《中国与非洲关系二千年》，中华书局 1990 年版，第 478 页。

③ 沉香木种类繁多，参见：Wheatley 著《舆地文献考释》，第 71 页；费信《星槎胜览》，第 52 页及注释 100。

④ 费信《星槎胜览》，第 99、101-104 页。

《西洋朝贡典录》

(成书于公元 1520 年 / 回历 926 年)

该书作者黄省曾沿用了马欢、费信的书和一本名为《箴位编》的佚失的航海手册资料。但此书在某些部分比马欢、费信以前的描述结构更佳。^①

该书开头一句话：“其国在古里西北可五千里”（约 2500 公里）——可能引自《箴位编》，接下来的段落或摘录援引马欢的记述（关于伊斯兰教、婚丧礼仪、羊走高竿表演、方物等），或援引费信的记述（人的仪表、男女服饰等）。有趣的是，他未提到国王铸造钱币的特权，但他谈到银底那儿是交易的流通货币。当地特产名单中包括 8 种珍宝，第一种被误写成“雅姑刺石”（在“雅姑”后加上了“刺”）。他还提到 5 类琥珀、4 种布、4 种羊、4 等葡萄。最后他提到水果、坚果和三种当地椰枣的名字。

尽管黄省曾以“其朝贡无常”一句结束了自己的记述，但他还是提到“永乐五年（公元 1407 年/回历 810 年），遣其臣将麒麟等物并备金叶表文跟随回洋宝船进贡”。如前所述，根据《明实录》的记载我们无法证实此事。

①《西洋朝贡典录》第 3~6 页，下卷，第 106~111 页。

元明文献中●忽鲁谟斯.....

其他文献

公元 16 世纪（回历 9 世纪）的其他资料以及后来的著作中，都没有对明朝初期的忽鲁谟斯增加任何新的内容，因此我们在此只简单列举一些重要文献的名称如下：^①

1) 高岱撰《皇明鸿猷录》（成书于公元 1557 年/回历 964 年）。收入《百部丛书集成》第 16 种之 4《集录汇编》卷六第 18 页提到“忽鲁谟斯”和“忽鲁母恩”。

2) 郑晓撰《皇明四夷考·序》（成书于公元 1564 年/回历 977 年），《中华文史丛书》本 3 之 16（台北：1968 年版），下卷，第 41 页，介绍了“忽鲁母恩”和“忽鲁谟斯”。

3) 章潢编《图书编》（成书于公元 1562~1577 年/回历 970~985 年），收《四库全书珍本》五集子部，24 卷（台北：商务印书馆 1974 年版）。在其第 51 页上、第 74 页下和第 83 页下至第 84 页上，都描述了“忽鲁谟斯”和“忽鲁母恩”。

^① 我们没有得到《古代南海地名汇释》（第 512 页）提到的两则资料：一是《华夷风土记》卷 4（17 世纪上半叶），一是《华夷花木鸟兽珍玩考》（16 世纪末）卷 8。

4) 严从简撰《殊域周咨录》（成书于公元1574年/回历982年），请参阅32页注②。严从简（系嘉靖三十三年/公元1554年进士）熟谙中国周边邻国情况，但他的书有许多不确之处。他的关于忽鲁谟斯的记述大约900字，其中大半材料引自金幼孜撰写的称赞“驼鸡”的文字。明初的书常把这种迷人的动物与忽鲁谟斯以外的地区联系在一起。《寰宇通志》和《大明一统志》是将驼鸡视为忽鲁谟斯物产的首批文献（见上述），这可以解释严从简为何在自己书的忽鲁谟斯章中援引金幼孜文献的原因。另一些好奇的观察则与忽鲁谟斯人有关，所谓“其人魁伟，俊秀挺拔，崇释教，善歌舞，厌杀戮。”显然，马欢笔下一个理想化的伊斯兰港口城市变成了热爱和平的佛教社会！我们在此无需再提该文的其他失真之处。《殊域周咨录》在某种程度上为后来的文献展示了海洋国家的命运和特点，就已足够了。这些书的作者只依靠该书有限的资料，而没有尝试或对有关数据进行核实。

5) 李东阳等编撰《大明汇典》（成书于公元1503年/回历909年至公元1587年/回历995年），五册（台北：华文书局1963年版）。106卷，第8页下（1600页：忽鲁谟斯于1405年/回历808年来朝——给出了一个不同的拼写形式）；卷144，第14页上（1675页：依礼赐宴：忽鲁谟斯名列其来华外国贡使之中）；卷115，第7页上（1682页：离华贡使赐赠物品：“永乐时，忽鲁谟斯十四位贡使来京。辞还国，每三日赐：羊三只、鹅

元明文献中忽鲁谟斯.....

二只、鸡四只、酒十五瓶、面四十斤、米一石、酥饼八十块、水果四斗，外加蔬菜等。”。

6) 王圻纂《续文献通考》（成书于公元1586年/回历994年）（台北：文海出版社1979年版）236卷，于该书第11页上（14055页）、第13页下（14060页）上描述了“忽鲁谟斯”和“忽鲁母恩”。

7) 罗曰炯撰、余思黎校注《咸宾录》（公元1591年/回历999年）（中外交通史集丛刊本，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版）6卷，第158~159页上描述了“忽鲁谟斯”。

8) 《三宝太监西洋记通俗演义》（公元1599/回历1009年罗樊登序），《中国古典小说资料丛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七十九回。该书是一部类似《西游记》的结构庞大的长篇小说。郑和是小说中描述的从中国出发周游“西洋国家”的四位主要人物之一。他的船队也到了忽鲁谟斯（在第79回中“忽鲁谟斯”的最后被省略）。书中描绘的一些情节和趣事可在马欢和费信的书见到。^①

9) 徐学聚编撰《国朝典汇》（最早的序言在公元1601年/回历1010年），中国史学丛书第七种，四册（台北：台湾学生书店1965年版），168卷，第26页上~下（第1964页）：简要地描述了“忽鲁谟斯”。

① 葡萄鬼著《明代戏剧和小说中的郑和下西洋研究》，刊 Munchener Ostasiatische Studien 第41辑（Stuttgart: Franz Steiner Verlag, 1986）第211、224、228页。

10) 茅元仪编纂《武备志》（序于公元 1621 年/回历 1030 年）22 册（台北：华实出版社 1984 年版）。在名为《四夷考》（公元 1606 年/回历 1015 年）的书中描述了“忽鲁谟斯”，后来归并到《武备志》中，在卷 237 第 10081~10083 页中描述了“忽鲁谟斯”和“忽鲁母恩”。

11) 王圻撰《三才图会》（序于公元 1607 年/回历 1016 年），凡 6 册（台北：成文出版社 1970 年版），I，地理，卷 13，第 23 页上（452 页，右上方），简要介绍了“忽鲁谟斯”。

12) 杨一葵编撰《裔乘》（序于公元 1615 年/回历 1024 年），“宣兰堂丛书”2~7（上海：宣兰居士，1941 年版）凡六卷，卷三，第 44 页上及卷五第 9 页上~下 b：描述了“忽鲁思恩”和“忽鲁谟斯”。书中错误地写道：郑和于永乐三年（公元 1405 年/回历 808 年）被派往“忽鲁思恩”。

13) 焦竑编纂《国朝献征录》（公元 1616 年/回历 1025 年刊），《中国史学丛书》第 8 辑，凡六册（台北：台湾学生书店 1965 年版），卷 120，第 155 页上，5353 页和第 162 卷上，5357 页上描述了“忽鲁谟斯”和“忽鲁母恩”。

14) 沈懋赏编纂《四夷广记》（万历末年刊），收《宣兰堂丛书续集》第 87~102 种，16 卷，南京：国立中央图书馆 1947 年版。“忽鲁谟斯”的名字列入目录，但无正文记述。参见 102 卷，第 934 页下。在另一章，



元明文献中●忽鲁谟斯.....

卷 97，第 647 页上记载说：“自古里向南，坤位（南 225 度），顺风十五日可抵忽鲁谟斯，又行十四日可抵天方国，番名秩达。”

15) 茅瑞徵编纂《皇明象胥录》（序于公元 1629 年/回历 1038 年），国立北平图书馆善本丛书第一辑，四册，上海：商务印书馆 1937 年版。在卷五第 22 上~下页描述了“忽鲁谟斯”，还提到另一地名“忽鲁姆恩”。据跋文可知，该书系根据《明史》和《殊域周咨录》编纂而成。在有关“忽鲁谟斯”的部分再次提到金幼孜的名字，其描述类似下书。

16) 陈仁锡编纂《皇明世法录》（成书于公元 1630 年/回历 1040 年），收《中国史学丛书》第 4-8 辑（台北：台湾学生书店 1965 年版）。在卷 82 第 44 页上~45 页上页中，其对“忽鲁谟斯”的描述同上书。

17) 何乔远撰《名山藏》（成于公元 1632 年/回历 1041 年后），20 卷，（台北：成文出版社 1971 年版）。在卷 20 第 27 页上~下（6209-6210 页）描述了“忽鲁谟斯”。

18) 张岱撰、刘耀林校注《夜航船》（成于明末），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 1987 年版。在卷 15 第 582 页上，简要提到了“忽鲁谟斯”。

清代记载有“忽鲁谟斯”情况的文献也很多。但这些文献也只是重复明人的著作，勿需重复罗列，在此只例举几种记载稍异的书足矣。

地方编年史

19) 印光任和张汝霖编、赵春晨校注《澳门记略校注》（序于公元 1751 年/回历 1164 年），《澳门文化丛书》（澳门：澳门文化研究院 1992 年版），《澳番篇》（Aofan pian）第 135~136 页描述了“忽鲁谟斯”，援引了尤侗的《外国竹枝词》（请参见下文）。另有《澳门记略》葡萄牙文译本可供参考。^①

20) 《广东通志》（公元 1864 年/回历 1281 年）120 卷（阮元编重印本）。在第 119 卷第 53 页下描述了“忽鲁谟斯”。这是该书广为流通的一个版本，早先的版本也提到了“忽鲁谟斯”。

文学著作

21) 尤侗撰《外国竹枝词》，收在《百部丛书集成》第 32 辑之第 1015 页下的“龙威秘书”中。乍一看，《竹枝词》在形式上颇类中国的古典诗歌，但其内部结构遵循着不同的格律。尤侗是一位趣味广泛的杰出学者，他在《外国竹枝词》中用词的形式对各国进行了描述，并加上散文格调的注释，其中就包括“忽鲁谟斯”。

^① Tcheong-[-Lam 及 Ian-Kuong-Lam 著，Luis Gozaga Gomes 译《Ou-Mun Kei Leok (Monografia de Macau)》，澳门：Imprensa Nacional，1950 年版，第 161~162 页。

元明文献中●忽鲁谟斯.....

综合性的史地文献

22) 傅维麟编 (卒于公元 1667 年/回历 1077 年)《明书》，收在《丛书集成初编》第 3928~3958 页，凡 30 卷，上海：商务印书馆 1936 年版。在卷 167 第 3316 页中，介绍了“忽鲁谟斯”和“忽鲁母恩”。

23) 查继佐编纂《罪惟录》(成书于公元 1672 年/回历 1083 年)，凡 4 册，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 1986 年版。在卷 36 第 2874~2875 页中描述了“忽鲁谟斯”，在题解时加上了“此即忽鲁母恩”。

24) 张廷玉等纂《明史》(成于公元 1739 年/回历 1152)，请见 32 页注②。在前述的明代与忽鲁谟斯往来使节部分，已经摘引过《明史》中一些文献。《明史》对“忽鲁谟斯”的描述部分，综合了马欢和费信两人的记述。该书对“忽鲁谟斯”的记述实际上类似王鸿绪的《明史稿》(成书于公元 1697 年/回历 1109 年)(参见《明史稿》卷 19，第 19 页上和卷 200，第 11 页上，第 12 页下)。《明史》还包括了对忽鲁谟斯当地的气候、土壤、服饰、风俗、礼仪等的注释。至于忽鲁谟斯的“百业”，该书说与中国的相当。同时提到了一些水果和物产，另外还提到忽鲁谟斯人以咸泥烧制盘子，当食物放在盘子里的时候，无需再加盐。最后，《明史》也像《寰宇通志》和《大明一统志》等书那样，提到了马、麒麟和羚羊。

25) 龙文彬编纂《明会要》(公元 1887 年/回历

1304 年刊》，收入《中国学术名著》第二编，《历代会要》（一）第 9、10 册，台北：世界书局 1963 年版。在卷 79 第 1544~1545 页上，介绍了“忽鲁谟斯”。

26) 陆次云编纂《八纘译史》（成于公元 1683 年/回历 1094 年），收入《丛书集成初编》第 3263 号，长沙：商务印书馆 1939 年版。在卷 2 第 28~29 页上，忽鲁谟斯被描述的稀奇古怪，在第 30~31 页上则介绍说：“忽鲁忽思，明时纳贡之一西洋小国”。

百科全书类文献

27) 陈梦雷、蒋廷锡等编纂《（钦定）古今图书集成》（成于公元 1725 年/回历 1137 年），凡 808 卷，上海：中华书局 1934 年版。在卷 215 的《编译典》第卷 73 第 19 页下至 20 页上，援引了《大唐西域记》等各种文献，其中就把“忽鲁谟斯”叫做“忽露摩”。

编年史文献

28) 包括《国榷》（大约成于公元 1653 年/回历 1063 年，见本书注 133）、《明通鉴》（成于公元 1870 年/回历 1287 年）、《明记》（成于公元 1871 年/回历 1288 年）。此三书都提到郑和下西洋和外国贡使事。书的编排采用《明实录》的风格，但大多语焉不详，也未提到贡使的名字。

元明文献中 忽鲁谟斯

航海日志与航海图

《海洋的亚洲》一书按照元朝地理学家朱思本的传统方式绘制了多幅航海地图。朱氏的原著不幸已佚，但后来的文献表明，他们运用的是他及其他人士的制图知识。现存的朝鲜人于1402年（回历805年）绘制的著名的各种世界地图，就是其中的一例。该图标明了欧洲、非洲、中东和波斯湾地区。^①通常而言，明代中期的地图在好多方面彼此类似，但也有些显而易见的变化：波斯湾地区不再以其形状来区分，中东的某些地名已不复存在，另一些地方则位于海洋中，与其实际位置

① 参见：Walter Fuchs 著《1555年的48幅摹写本〈中国蒙古地图〉和〈广舆图〉考》，刊 Monumenta Serica Monograph 第8辑（北平：辅仁大学1946年版），第9~10页；李约瑟（Joseph Needham）等著《中国科技史》（剑桥：At the University Press, 1954），卷III，第551~556页，卷IV.3，第499~501页；J. B. Harley 和 David Woodward 主编《东方及东南亚社会的传统绘图法史》，见《绘图法史》卷2.2（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244~249页。还可参阅：Yi Ch'an; Han'guk kochido（汉城：Han'guk Tosogwanhak Yon'guhoe, 1997），Han'guk ui ko chioe（汉城：Pom'usa, 1991）等著作。最新出版的资料有：曹婉如登主编《中国古代地图集·明代》（168~1044）（文物出版社1994年版）图版第155、156页，元代地图收集在1990年出版的《元代》卷中。

大相径庭。忽鲁谟斯就是其中之一，它通常出现在表示“东南蛮夷”的地图中。这些地图的样本在《皇輿考》（公元1557年/回历964年）和《图书编》中都有。^①这类地图在明末时还很盛行，但当时人们也能见到体现基督教影响的地图，这些地图出现在利玛窦（Matteo Ricci）按照传统制图法制作的《坤域万国全图》（公元1602年/回历1011年）和艾儒略（Guilio Aleni）编制的《职方外纪》（公元1623年/回历1033年）中。这些地图比较接近实际。其中的一些地图上偶尔也标有“忽鲁谟斯”，只是位置出现在了阿拉伯半岛东北部的阿曼地区。

我们无心在此谈论欧洲人影响下制图学的进一步发展。相反，我们可以回顾一下郑和下西洋时代的海图情况。所谓的《茅坤海图》，收藏在茅元仪的《武备志》中，它展示了当时中国人的航海知识。尽管该海图成为众多学者研究的对象，但我们至今仍未弄清它的来龙去脉和制作者。它可能是根据明初的航海家们使用的类似的海图复制而成。这幅《海图》标明了从中国到东南亚和印度洋的海上航线，特别是穿过阿拉伯海的几条航线。这些航线从印度西南部芒格洛尔（Mangalore）港口和果阿（Goa）地区通往拉斯哈德（Ra's al-Hadd）附近的哲朗岛（Qalahat），从那里行抵忽鲁谟斯。虽然该图的最后一段航线没能正确标明航程和航向，但忽鲁谟

① 《图书编》卷51，第18页上；张天复《皇輿考》，宣兰堂丛书续集第28-35辑，（上海：宣兰居社1941年版），卷12，第4页上），还可参见《广輿图》卷2前注。

元明文献中的忽鲁谟斯

斯在海图上被清楚地标注在一个岛上。在它的附近还可看到“刺儿可束”(La'erkshu/Larak)、“假忽鲁谟斯”和“萨拉摩”(Salamo)等岛屿。有一个名叫“苦碌麻刺”(Kulumala, 即米纳布湾 Khaur-i Minab)的地方标明在伊朗大陆上, 另外有些小岛位于海对面的马斯喀特(Masqat)附近。关于该海图上“忽鲁谟斯”和“假忽鲁谟斯”, 米勒斯认为“忽鲁谟斯”相当于今霍尔木兹或加隆岛, “假忽鲁谟斯”相当于格什姆岛。其他一些资料则颠倒了这种顺序, 认为“假忽鲁谟斯”相当于伊朗大陆的“旧忽鲁谟斯”, 而“忽鲁谟斯”相当于忽鲁谟斯岛。“假忽鲁谟斯”被画得比这两个地方还要小, 因此可能指的是加隆岛。但所有的相关地点都被标在地图上, 为我们的思索留下了空间, 当然可以接受几种方案。^①

《茅坤海图》是一幅独特的海图。迄今为止, 我们找不到任何与此相似的标明了中国在印度洋的贸易航线

① 茅元仪撰《武备志》卷240, 第2019页; 米勒斯著《马欢》第296~298页; 《新编郑和航海图集》第78~82页; 《古代南海地名汇释》第714页; 徐玉虎《明代郑和航海图志研究》(台湾学生书局1976年版)第164~167页。有关茅坤地图的研究有: 周玉森《郑和航路考》, 台北: 海运出版社1959年版; 向达《郑和航海图》, 中外交通史籍丛刊, 北京: 中华书局1961年版。(假的)在“假忽鲁谟斯”中的拼音十分令人惊奇。它有语音学来源, 还是有否定之义? 此外, “忽鲁谟斯”有两个条目, 它与我们在《大明一统志》《寰宇通志》所见到的“假忽鲁谟斯”的两个不同条目是否有关?

网的地图。^①因此，我们现在可以转而对各类型航海著作，即航海书上所谓的“航路”进行讨论。这些书中有多处提到忽鲁谟斯，并指导水手们如何前往波斯湾和阿拉伯半岛。绝大多数的相关的航海文献很可能都是在15世纪初，甚至是在元代收集到的。在15世纪末期或之后，文献中没有任何关于中国私家商贾从远东前往波斯湾的记载。因此，在明末清初书籍中提到的中东港口资料，反映的都是早期的航海知识。

最早记载从印度前往忽鲁谟斯的文献资料，均出自汪大渊、马欢、巩珍的著作。汪氏说从小咀喃到甘埋里航行要两个月，马欢和巩珍则说从古里到忽鲁谟斯要25日。《前闻记》说走该航线到忽鲁谟斯需要34天，而《集录汇编》本的《星槎胜览》一书中则说需要10天。如前所述，最后一种推测值得怀疑。关于汪、马、巩三氏的说法，我们不知道他们根据的是文献资料还是个人经验。^②接下来的参考文献可以在《西洋朝贡典录》一书中找到（如前述）。据该书的推测，古里到忽鲁谟斯的距离是5000里，古里到阿丹国（亚丁）的距离是6000里。这些里数都是正确的，可能根据已佚失

① 中国的海图史和航海技术吸引了众多学者。为了解最近进行的有关研究的情况，可参阅：章巽等编《中国航海科技史》（北京：海洋出版社1991年版），第315页等（古地图）；Jacques Dars 著《公元10~14世纪的中国航海》（La marine chinoise du X^e siècle au XIV^e siècle，收《航海史研究》第11辑（巴黎：Economica 1992），第2章。

② 请阅本书第32页注释②。

元明文献中●忽鲁谟斯.....

的《臧位编》一书。^①

在明代初中期还有另外几部航海路线的专书，但均已佚失。其中一部是刊于嘉靖十六年（公元1537年/回历944年）的《渡海方輶》。据见过该书的一位叫董谷的人说，书中介绍了两条航线，一条从长江下游的刘家港到忽鲁谟斯，另一条连接刘家港到中一朝边界地区。有关这两条航线的资料大概都采自更早但现已佚失的书籍。我们可以认为《茅坤海图》与《渡海方輶》彼此有一定联系，但缺乏足够的证据来证实这种推测。其他一些可能提及忽鲁谟斯的文献有：《海岛针经》（或《海岛经书》）、《西海指南》、《海航密诀》和《航海全书》。据当时一位观察人士说，所有这些航海书籍都与《渡海方輶》类似。^②

由一位不知名的作者撰写的另一部名著《顺风相

①《西洋朝贡典录》第8页（前言）及卷下第106、112页。要了解该书记载的航线可参阅：郑鹤声、郑一钧主编《郑和下西洋资料汇编》上册（齐鲁书社1980年版），第293-297页；郑一钧《论郑和下西洋》第184-191页；徐玉虎《〈西洋朝贡典录〉中之航海针路考》，刊中国历史学会主编《史学季刊》第10期（1978年5月），第157-178页。

②田汝康著《中国出版的首部航海指南——渡海方輶》，载《通报》68卷第1-3期（1982），第77-78页。董谷《碧里杂存》下，“演义之林”卷29，9-106页（“天”后引），收入郑鹤声、郑一钧编《郑和下西洋资料汇编》上册，第248页。田汝康文章详见：《中国帆船贸易与对外关系史论集》，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27-139页（尤其见第136页）。另可参阅：杨国真《闽在海中：追寻福建海洋发展史》，“海洋与中国”丛书，江西高校出版社1998年版，第67-68页。

送》同《渡海方程》文本之间的确切关系，依然令人迷惑不解。田汝康认为，《顺风相送》以《渡海方程》为基础，但也存在着在此期间还有其他书籍问世的可能，或者是《顺风相送》包含了各时期的资料，最早的资料可以追溯到郑和下西洋时代。这些资料中含有一个简短的部分，提到自古里至忽鲁谟斯，以及从忽鲁谟斯到古里的航线。其中的一些地名与《茅坤海图》上见到的相似或一致。米勒斯等学者已对此航路作过研究，在此无需赘述。^①

在上一章“其他文献”下我们引用的好多书中，也简单地提到从印度到忽鲁谟斯的航行，但总的来说没有提供更新的内容。其中一例就是我们在前面已引用过的《四夷广记》一书。该书中曾多处提到其他各种海上航线，它反映的可能是此前的书上记载的有关知识。^②对清代书中的某些记载也可以这么认为。总的来说，后来的这类著作全都集中在东南亚航线上，对前往印度洋的航线未给予足够的重视，因此对本书的意义不大。

① 向达编校《两种海道针经》中外交通史籍丛书（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2版），第21、41页（“忽鲁谟斯”条），第78~79页（“忽鲁谟斯”条）；米勒斯著《马欢》第300页。关于《顺风相送》的成书时间，可参阅张崇根《关于〈两种海道针经〉的著作年代》，收入中外关系史学会朱杰勤等主编的《中外关系史论丛》卷1，世界知识出版社1985年版，第183~187页。在此应补充一点，米勒斯还留下了许多未发表的著作，其中包括一篇短文概述了中国人在阿拉伯海、波斯湾等地的航海路线。笔者曾于1991年在李约瑟研究所见到过该文的一份抄本。

② 郑鹤声、郑一钧在其著作中记述了有关该书各航线的更多的情况，详见《郑和下西洋资料汇编》上册，第306~327页。

元明文献中的忽鲁谟斯.....

结 语

最后的这两部分表明，明朝中期以后，中国对印度洋周围各国的认识停滞不前，忽鲁谟斯只是其中的一个案例而已。但郑和船队在上述海域的出现，给许多港口的人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们可从中文以外的文献中得出这种结论。比如：皮埃尔·巴尔蒂尤斯（Pierre Bartius）写道：“有几次中国为了购买熏布所需的香料，向忽鲁谟斯派出了由 40 艘船组成的船队。”^①卡斯帕·达·克鲁兹（Kaspar da Cruz）也间接地提到：“庞大的中国船队”在斯里兰卡附近的浅海水域消失了。^②一些人则报道了中国船队在古里等地的航行情况。

有关中国航海史最夸张的一个版本出自加西亚·达·奥尔塔（Garcia da Orta）。他不仅重申了锡兰山事件，

① Bertius 编《世界地图集》，第 715 页。中国人熏布的习惯请参见 Schafer 译《康国金桃》第 162-163 页。

② C.R.Boxer 编《16 世纪时的南中国：佩雷拉船员的叙述》（South China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 Being the Narratives of Galeote Pereira, Fr. Gaspar da Cruz, o.p. and Fr. Martin da Rada. O.E.S.A. <1550-1575>），Works Issued by the Hakluyt Society 第 2 系列第 106 辑，伦敦：Hakluyt Society 1953 年版，第 66-67 页。

而且还提到了忽鲁谟斯。他记载说：^①“中国人很久以前就航行到了这块土地（即西印度洋）。当地无知的土人从中国人那里学习法律和习俗。中国人乘着如此大型的海船，用这种方法航行。如果你有耐心，我将娓娓道来。这些故事虽然与我们的话题无涉，但对你来说可能意味无穷。”他接着说道：“我知道到航行至此的中国海船数目，我数过前往忽鲁谟斯并在他们书中记载下来的那些海船的数目，共有 400 艘海船驶入了加隆岛港口（现叫霍尔木兹）。据他们的书中记载，有 200 艘船在奇拉姆（Chilam）因触礁而沉没……。”

中国人在明初下西洋的故事始终激发着作家和学者们的想象力。在明朝的一出戏中，郑和征服了苏禄群岛及其周边属国。在清末的一部长篇小说中，说郑和通过了苏伊士运河。在现代中国喜剧和其他流行剧中，有关郑和下西洋的类似主题更是比比皆是。郑和下西洋的电影业已出现，还有专门为他撰写的航海日记，在英特网上也有对他进行的各种评介。西方作家也对郑和充满了敬意。最近美国学者乐一露（Louis Levaths，又译作李露桦）在她的《当中国称雄海上》书中，根据郑和下西洋的基本史实描述了他下洋的航线，但此书带有浓厚的想象色彩。在中世纪晚期，虽

① 前引 Pearson 主编《印度洋区域的香料》，第 5 页；葡萄牙文可参见：Garcia Da Orta 著《论来自印度的产物和毒品》（1891 版的抄写本）2 卷（里斯本：Imprensa Nacional - Casa da Moeda 1987），卷 1 第 204-205 页。

元明文献中忽鲁谟斯.....

然忽鲁谟斯不太引起上述的西方人的关注，但当大家在研读马欢、费信的著作，刘家港和长乐的石文，以及《明实录》中的各种记载之后，人们仍在撰写各种文章、小册子和献给郑和的剧本，致力于在中国和海外华人中提升郑和的名望和声威。

附录一

人名、地名、机构名及术语名录

把聃

北京大学南亚研究所

Bila 比刺

Bu'a li 不阿里

Busheng 不胜

曹婉如

Ceng tan 层檀

查继佐

长乐

陈达生

陈大震

陈高华

陈家荣

陈梦雷

陈庆

陈仁锡

陈循

Chi 尺

Dan 石

元明文献中 忽鲁谟斯

Dan liu mei 丹流眉

Dan mei liu 丹眉流

大食

道宣

丁流眉

Dou 斗

董谷

Fan 番

范祥雍

费信

冯承钧

Folang 佛朗

傅维麟

Fujita Toyohashi 藤田丰八

Gan mai li 甘埋里

Gan mei 甘眉

Gan mei liu 甘眉流

Gan li 甘里

Gan li mai 甘里埋

高岱

耿引曾

巩珍

Ha'er ma mou 哈尔马某

Ha'er ma qi 哈尔马其

海军海洋测绘研究所

大连海军学院航海史研究室

Halasa 哈拉撒

Halisa 哈里撒

杭州

Ha zhi Ali 哈只阿里

何乔远

鹤林城

侯显

胡濬

黄晋

黄省曾

黄佐

慧立

回纥

Hulimuzi 忽里模子

Hulumusi 虎六母思

Huluhusi 忽鲁忽思

Hulumo 忽卢没

Hulumo (b) 忽露摩

Hulumosi 忽鲁谟斯

Hulumosi 忽鲁谟斯 (仅在马欢《瀛涯胜览》和
1417 年的泉州碑文里出现)

Hulumousi 忽鲁谟斯

Hulumu'en 忽鲁母恩

Hulumusi 忽鲁模斯

元明文献中 忽鲁谟斯

Hulusi'en 忽鲁思恩

Hemocheng 鹤秣城

Hudumosi 火鲁没思

季羨林

Jia Hulu mosi 假忽鲁谟斯

嘉定

Jia liji 伽力吉

Jia laha 加刺哈

蒋廷锡

焦宏

己即丁

Jin 斤

金幼孜

金钢钻

纪念伟大航海家郑和研究会

进士

记施

Kulumala 苦碌麻刺

昆仑

昆仑层期

Kuo limosi 阔里秣斯

La stone 刺石

La'er Keshu 刺儿可束

Li 里

李充

李东阳
李国祥
李贤
李宪璋
李玉昆
林天蔚
灵羊
历史地理

刘兴
刘跃林
刘迎胜
刘月莲
刘家港
龙文彬
龙涎
陆次云
陆峻岭
陆容
罗懋登
罗曰琮
马欢
马哈鲁
Mala zu 马刺足
茅坤

元明文献中●忽鲁谟斯.....

茅瑞徵

茅元仪

木香

Mu luo sha 木罗纱

Nadi'er 那底尔

南冯

庞元英

Qian 钱

钱大昕

麒麟

Qing 青

邱树森

邱炫煜

去货

泉州

阮元

Sabai zhi 撒白值

Sabuji 撒不即

Sahala 撒哈刺

Sai fu ding 赛弗丁

Salamo 撒刺抹

沈曾植

沈福伟

沈懋赏

巳即丁

松江

Su incense 速香

苏继廌

孙刺

Suo fu 梭幅 (腹)

锁眼

苏州

谈迁

唐敬

田汝康

汪大渊

王鸿绪

王圻

吴文良

向达

Xiao Ju'nan 小咀喃

骁骑右卫指挥僉事

谢方

Xi ya guo shi 昔雅过失

徐学聚

许永璋

徐玉虎

玄奘

Yagu 雅姑

Ya gula 雅姑刺



元明文献中●忽鲁谟斯●●●●●

彦淙
 严从简
 扬博文
 扬国桢
 杨庆
 杨枢
 杨一葵
 耶律楚材
 印光任
 尤侗
 喻常森
 余思黎
 张崇根
 张岱
 章潢
 张汝霖
 章巽
 张天俊
 张廷玉
 张炎宪
 张宗祥
 赵春晨
 赵汝适
 郑鹤声
 郑和

郑彭年
 郑一钧
 郑晓
 中外关系史学会
 周鼎
 周满
 周闻
 周玉森
 周致中
 朱杰勤
 朱思本
 祝允明
 朱贞
 Zu ba emerald 祖把碧
 祖母绿
 祖母刺

元明文献中●忽鲁谟斯.....

附录二

中文图书文献名录

澳门记略校注
 八紘译史
 碧里杂存
 从《不阿里神道碑铭》看南印度与元朝及波斯湾的交通
 从《大德南海志》看宋末元初广州的海外贸易
 大明会典
 大明一统志
 大唐西域记校注
 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
 大德南海志残本
 岛夷志略校释
 渡海方程
 关于两种海道针经的著作年代
 广舆图
 广东通志
 古代南海地名汇释
 国榷
 国朝典汇

国朝献征录
 海航秘诀
 海道经书
 海道针经
 海交史研究
 汉文南亚史科学
 航海全书
 华夷风土记
 华夷花木岛兽珍玩考
 皇明鸿猷录
 皇明世法录
 皇明四夷考
 皇明象胥录
 皇輿考
 寰宇通志
 金华黄先生文集
 坤域万国全图
 历史地理
 历史研究
 两种海道针经
 论郑和下西洋
 妈祖信仰研究
 闽在海中：追寻福建海洋发展史
 明会要
 明记

元明文献中●忽鲁谟斯●●●●●

名山藏
 明史
 明史稿
 明实录
 明实录类书·涉外史料卷
 明书
 明通鑑
 明代郑和航海图之研究
 前闻记
 (钦定)古今图书集成
 泉州海外交通史略
 泉州伊斯兰教石刻
 三宝太监西洋记通俗演义
 三才图会
 释迦方志
 顺风相送
 殊域周咨录
 菽园指南
 四海指南
 四夷广记
 四夷考
 宋史
 宋代香药贸易史稿
 天妃显圣录
 图书编

外国竹枝词
 汪大渊生平考辨三题
 文昌杂录
 武备志
 咸宾录
 新编郑和航海图集
 星槎胜览校注
 西洋朝贡典录
 《西洋朝贡典录》中之航海针路考
 西洋番国志
 西游记
 西游录
 续文献通考
 夜航船
 裔乘
 瀛涯胜览校注
 异域图志
 异域志
 永乐大典
 元史
 元代的航海世家澈浦杨氏——兼说元代其他航海家族
 元代海外贸易
 郑和航海图
 郑和航路考
 郑和史迹文物选

元明文献中●忽鲁谟斯●●●●●

郑和下西洋资料汇编
 緘位编
 职方外记
 中国帆船贸易与对外关系史论集
 中国古代地图集·明代
 中国海洋发展史论文集
 中国航海科技史
 中国和伊朗历史上的友好关系
 中国回族大词典
 中国与非洲关系二千年
 中国载籍中南亚史料汇编
 中外关系史论丛
 诸蕃志校释
 罪惟录
 竹枝词

附录三

西文图书文献名录

Ludwig W. Adamec (ed.), Historical Gazetteer of Iran, Vol4: Zahidan and Southeastern Iran (Graz: Akademische Druck- und Verlagsanstalt, 1988).

Ando Shiro, Timuridische Emire nach dem Mû izz al-ansab, Untersuchung zur Stammesaristokratie Zentralasiens im 14. und 15. Jahrhundert, Islamkundliche Untersuchungen 153 (Berlin: Klaus Schwarz Verlag, 1992).

Jean Aubin, Les princes d'Ormuz du XIIIe au XVe siècle, Journal Asiatique 241 (1953).

Jean Aubin, "Le royaume d'Ormuz au début du XVIe siècle", Mare Luso-Indicum (1973).

Jean Aubin, "Indo-Islamica I, la vie et l'œuvre de Nimdihi", Revue des Études Islamiques 34 (1966).

Ibn Battuta (author), H.A.R. Gibb (tr. rev., annot.), The Travels of Ibn Battuta, A.D. 1325-1354. Translated with Revisions and Notes from the Arabic Text. Edited by C. Defrémery and B. R. Sanguinetti, C. Defrémery and B. R. Sanguinetti 3 Vols. (reprint, New Delhi: Munshiram Manoharlal, 1999; originally published by the Hakluyt Society).

元明文献中忽鲁谟斯.....

João de Barros, Ásia. Dos feitos que os Portuguezes fizeram no descobrimento e conquista dos mares do Oriente (Lisbon: Livraria Sam Carlos, 1973; facsimile version of the 1777- 1778 ed.).

Samuel Beal (tr.), Si- yu- ki. Buddhist Records of the Western Worlds, 2 (Delhi: Oriental Books Reprint Corp., 1969, originally ed., 1884).

Pierre Bertius, Livre premier des tables geographiques auquel est traité du monde en general (Amsterdam; 1618).

H. L. Rabino di Borgomale, Coins, Medals, and Seals of the Shahs of Iran, 1500- 1941 unpublished, 1945).

K.N. Chaudhuri, " A Note on Ibn Taghri Birdi's Description of Chinese Ships in Aden and Jedda", in 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No.1 1989).

Frei Gaspar da Cruz (author), Rui Manuel Loureiro (ed.): Tratado das coisas da China (Évora, 1569- 1570) (Lisbon: Edições Cotovia and Comissão Nacional para as Comemorações dos Descobrimentos Portugueses, 1997).

Simon Digby, " The Maritime Trade of Asia", in Tapan Raychaudhuri and Irfan Habib (eds.), Cambridge Economic History of India, 1200 - 1710, Vol.1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2).

Simon Digby, War- Horse and Elephant in the Delhi Sultanate, a Study of Military Supplies (Oxford: Orient Monographs, 1971).

R.A.Donkin, *Beyond Price. Pearls and Pearl-Fishing: Origins to the Age of Discoveries*, Memoirs of the 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 224 (Philadelphia: 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 1998).

Jan J. L. Duyvendak, *China's Discovery of Africa. Lectures Given at the University of London on January 22 and 23, 1947* (London: Arthur Probsthain, 1949)

Jan J. L. Duyvendak, *Ma Huan Re-Examined*, in *Verhandelingen der Koninklijke Akademie van Wetenschappen te Amsterdam, Afdeling Letterkunde* 32.3 (Amsterdam: Noord-Hollandische Uitgeversmaatschappij, 1933).

Jan J. L. Duyvendak, " The True Dates of the Chinese Maritime Expeditions in the Early Fifteenth Century", *T'oung Pao* 34 (1938).

Eckart Ehlers, *Iran: Grundzüge einer geographischen Landeskunde* Darmstadt: Wissenschaftliche Buchgesellschaft, 1980).

Edward L. Farmer, *Early Ming Government, the Evolution of Dual Capitals*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6).

Gabriel Ferrand, " Les îles Râmni, L'âmery, Wâkwâk, Komor des géographes arabes, et Madagascar", in *Journal Asiatique*, 10, 10.3 (1907).

Gabriel Ferrand, " Le K'ouen-louen et les anciennes navigations", in *Journal Asiatique* 14, 11, (1919).

元明文献中 忽鲁谟斯

Ronald Ferrier, "Trade From the Mid- 14th Century to the End of the Safavid period", in Peter Jackson and Laurence Lockhardt (ed.) ,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Iran, Vol6: The Timurid and Safavid Perio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6).

Teobaldo Files (author) , D. L. Morison (tr.) , China and Africa in the Middle Ages, in Cass Library of African Studies, General Studies 144 London: Frank Cass, 1972).

Bert G. Fragner, " Social and Economic Affairs", in Jackson and Lockhardt (eds.) , Cambridge History of Iran.

Wolfgang Franke, An Introduction to the Sources of Ming History (Kuala Lumpur and Singapore: University of Malaya Press, 1968).

Walter Fuchs, The " Mongol Atlas " of China by Chu Ssu - Pen and the Kuang - yü - t' u with 48 Facsimile Maps Dating from about 1555, Monumenta Serica Monograph 8 (Pekin: Furen University, 1946).

S.D. Goitein, Studies in Islamic History and Institutions (Leiden: E.J. Brill, 1966).

L. Carrington Goodrich and Fang Chao - ying (eds.) , Dictionary of Ming Biography, 1368 - 1644. The Ming Biographical History Project of the Association for Asian Studies. 2 (New York and London: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6).

L. Carrington Goodrich, " Geographical Additions of the

XIVth and XVth Centuries, A Bibliographical Notes 14 - 15, "in Monumenta Serica, Vol.15 (1956).

Donatella Guida, Immagini del Nanyang. Realtà e stereotipi nella storiografia cinese verso la fine della dinastia Ming, Opera Universitaria, Dipartimento di Studi Asiatici, Istituto Universitario Orientale Napoli, Serie didattica 2 (Naples, 1991).

Hafiz -i Abru, Sayyid Kamal Hajj Sayyid Jawadi (eds.), Zubdat at-tawarikh 2 (Tehran; Saziman-i chap wa intisharat-i wizarat-i farhang wa irshad-i islami, 1993 - 1994).

J.B. Harley & David Woodward (eds.), Cartography in Traditional East and Southeast Asian Societies, The History of Cartography, Vol.2.2 Chicago;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1994).

Walther Hinz, Islamische Währungen des 11. bis 19. Jahrhunderts in Gold: Ein Beitrag zur islamischen Wirtschaftsgeschichte (Wiesbaden; Harrassowitz Verlag, 1991).

Walther Hinz, " Quellenstudien zur Geschichte der Timuriden", in Zeitschrift der Deutschen Morgenländischen Gesellschaft, 90 (1936).

Walther Hinz, " Die spätmittelalterlichen Währungen im Bereich des Persischen Golfes", in E. C. Bosworth (eds.): Iran and Islam, in Memory of the Late Vladimir Mi-

元明文献中忽鲁谟斯.....

norsky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1971).

Friedrich Hirth and W. W. Rockhill (trs.), *Chau Ju-kua: His Work on the Chinese and Arab Trade in the Twelfth and Thirteenth Centuries, Entitled Chu-fan-chi* rpt. Taipei: Ch'eng-Wen Publishing Company, 1970).

Karashima Noboru, "Trade Relations between South India and China during the 13th and 14th Centuries", in *Journal of East-West Maritime Relations*, 1989, 1.

Nasir al-Din Munshi Kirmani (author), Abbas Eghbal (eds.), *Simt al-ula li-l-hadrati I-ulya* Tehran: Shirkat-i sihami, 1949/50).

Berthold Laufer, *Sino-Iranica, Chinese Contributions to the History of Civilization in Ancient Iran,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the History of Cultivated Plants and Products*, Anthropological Series Vol. 15, 3 Chicago: Field Museum of Natural History, 1915).

Dominique Lelievre, *Le dragon de lumière. Les grands expéditions des Ming au début du XVe siècle* (Paris: Éditions France-Empire, 1996).

Guy Le Strange, *The Lands of the Eastern Caliphate* (London, 1905, 1966 reprinted)

Laurence Lockhardt, "Hormuz", in *E.I.* (Leiden: E. J. Brill, 1960).

Denys Lombard and Jean Aubin (eds.), *Marchands et hommes d'affaires asiatiques dans l'Océan Indien et la Mer*

de Chine, 13e- 20e siècles, Ports, routes, trafics 29 Paris: Éditions de l'École des Hautes Études en Sciences Sociales, 1988)

Nicholas Lowick, "Further Unpublished Islamic Coins of the Persian Gulf", *Studia Iranica* 11 (1982).

Dieter Martinetz, Karlheinz Lohr and Jörg Janzen, *Weihrauch und Myrrhe. Kostbarkeiten der Vergangenheit im Licht der Gegenwart* (Berlin: Akademie-Verlag, 1989); Nigel Groom, *Frankincense and Myrrh. A Study of the Arabian Incense Trade* (London and Beyrouth: Longman and Librairie du Liban, 1981).

J. V. G. Mills (tr.), Roderich Ptak (ed.): *Hsing-ch'a sheng-lan. The Overall Survey of the Star Raft, South China and Maritime Asia 4* (Wiesbaden: Harrassowitz Verlag, 1996).

J. V. G. Mills (ed. Tr.), Ying-yai Sheng-lan. *The Overall Survey of the Ocean's Shores [1433]*, The Hakluyt Society Extra Series 42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1).

Maryam Mir-Ahmadi, "Jazireh - yi Hurmuz dar mutun-i jughrafiya'i wa tarikhi - yi qadim", *Fazlnameh - yi tahqiqat-i jughrafiya'i* 5.2 (1990/91).

Mu' in ad-Din Natanzi (author), Jean Aubin (tr.): *Muntakhab at-tavarikh-i Mu' ini* (Tehran: Kitabfurushi Khayyam, 1957).

元明文献中 忽鲁谟斯

Joseph Needham, *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54).

Almut Netolitzky, *Das Ling-wai tai-ta von Chou Ch'ü-fei. Eine Landeskunde Sündchinas aus dem 12. Jahrhundert*, Münchener Ostasiatische Studien 21 (Wiesbaden: Franz Steiner Verlag, 1977).

Michael N. Pearson, *Port Cities and Intruders, the Swahili Coast, India, and Portugal in the Early Modern Era* (Baltimore: 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8)

Michael N. Pearson (eds.), *Spices in the Indian Ocean World/ Introduction, An Expanding World 11* (Aldershot: Ashgate Publishing Ltd., 1996).

Paul Pelliot, "Les grands voyages maritimes chinois au début du XVe siècle", in *T'oung Pao* Vol. 30 (1933).

Valeria Fiorani Piacentini, *L'emporio ed il regno di Hormoz (VIII - fine XV sec. d. Cr.)*, vicende Storiche, problemi ed aspetti di una civiltà costiera del Golfo Persico. Memorie dell'Istituto Lombardo Accademia di Scienze e Lettere 35.1 (Milan: Istituto Lombardo di Scienze e Lettere, 1975).

Marco Polo, A.C. Moule and Paul Pelliot (tr., annot.): *The Description of the World* (New York: AMS Press, 1976).

Odoric of Pordenone, in Henry Yule, Henri Cordier (ed.): *Cathay and the Way Thither. Being a Collection of Medieval Notices of China* 4 rpt. Taipei: Cheng-Wen Com-

pany, 1966).

Roderich Ptak, *Cheng Ho's Abenteuer im Drama und Roman der Ming-Zeit. Hsia Hsi-yang: Eine Übersetzung und Untersuchung. Hsi-yang chi: Ein Deutungsversuch*, Münchener Ostasiatische Studien 41 (Stuttgart: Franz Steiner Verlag, 1986).

Roderich Ptak, "China and Calicut in the Early Ming Period: Envoys and Tribute Embassies", *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1989).

Roderich Ptak, "Images of Maritime Asia in Two Yuan Texts: Daoyi zhilue and Yiyu zhi", *Journal of Sung-Yuan Studies* 25 (1995).

Roderich Ptak, "Ein mustergültiges Barbarenland?: Kalikut nach chinesischen Quellen der Yuan und Ming-Zeit", in Denys Lombard & Roderich Ptak (eds.): *Asia Maritima, Images et réalité, Bilder und Wirklichkeit, 1200-1800, South China and Maritime Asia* 1 (Wiesbaden: Harrassowitz Verlag, 1994).

Roderich Ptak, "Notes on the Word Shanhu and Chinese Coral Imports from Maritime Asia, c. 1250-1600", in *Archipel* 139 (1999).

Roderich Ptak, "Pferde auf See: ein vergessener Aspekt des maritimen chinesischen Handels im frühen 15. Jahrhundert", *Journal of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of the Orient* 34 (1990).

元明文献中 忽鲁谟斯

Roderich Ptak, "Yuan and Early Ming Notices on the Kayal Area in South India", in BEFEO, 80, 1 (1993).

Etienne Quatremère (ed. tr.): Notice de l'ouvrage persan qui a pour titre: Matla- assadein ou- madjma- albahrein et qui contient l'histoire des deux sultans Schah- Rokh et Abou Said, Extrait des notices et extraits des manuscrits de la bibliothèque du roi 14.1 Paris: 1843).

Haraprasad Ray, Trade and Diplomacy in India- China Relations. A Study of Bengal during the Fifteenth Century (New Delhi: Radiant Publishers, 1993).

Patricia Risso, Oman and Muscat, an early modern history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86).

W. W. Rockhill, " Notes on the Relations and Trade of China with the Archipelago and the Coasts of the Indian Ocean during the Fourteenth Century", T'oung Pao, 15 (1914).

Arion Roşu, " Le girafe dans la faune de l'art indien", in BEFEO, 71 (1982).

Claudine Salmon (ed.): Récits de voyages asiatiques. Genres, mentalités, conception de l'espace. Actes du colloque EFEO- EHESS de décembre 1994, Études thématiques 5 Paris: École française d'Extrême- Orient, 1996).

Kamal ad- Din * Abd ar- razzaq Samarqandi (author), M. Shafi (notes): Matla - i sa dain va majma - i bahrain (Lahore: 1941- 1949).

Edward H. Schafer, *The Golden Peaches of Samarkand, A Study of T'ang Exotics*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3).

Paul Schwarz, *Iran im Mittelalter nach den arabischen Geographen*, 2 vols (Hildesheim and New York: Georg Olms Verlag, 1969).

Paul Schwarz, *Horumz*, *Zeitschrift der Deutschen Morgenl?ndischen Gesellschaft*, 68 (1914).

R.B. Serjeant, " Yemeni Merchants and Trade in Yemen, 13th - 16th Centuries", in R.B. Serjeant, G. Rex Smith (eds.), *Society and Trade in South Arabia* (Aldershot: Ashgate Publishing Ltd., 1996).

Nizam ad- Din Shami (author), Felix Tauer (tr., ed.): *Zafarnameh 2* (Prague: Orientalni ustav, 1937; St?tn? Pedagogick? Nakladatelstvi, 1956).

Bertold Spuler, *Die Mongolen in Iran, Politik, Verwaltung und Kultur der Ilchanzeit 1220- 1350* (3rd ed. Berlin: Akademie- Verlag, 1968).

Bertold Spuler, " Die wirtschaftliche Entwicklung des iranischen Raumes und Mittelasiens im Mittelalter", in his *Handbuch der Orientalistik*, 1. Abteilung, *Der Nahe und der Mittlere Osten*, 6. Band, 6. Abschnitt, Teil 1 (Leiden: E. J. Brill, 1977).

Pedro Teixeira (author), William F. Sinclair (tr., annot), Donald Ferguson (annot., introduction), *The Travels of Pe-*

元明文献中忽鲁谟斯.....

dro Teixeira, With his "Kings of Huromz" and Extracts from his "King of Persia" (London: The Hakluyt Society, 1902).

Shihab ad-Din' Abdollah Sharaf Shirazi (Wassaf al-Hadrat), M.M. Isfahani (ed.): Tajziyat al-amsar wa tazjiyat al-asha (Bombay: 1853; rpt: Tehran: Ibn Sina, 1959 / 60).

W. M. Thackston (tr.), A Century of Princes, Sources on Timurid History and Art (Cambridge MA: The Aga Khan Program for Islamic Architecture, 1989).

Tcheong- (Lam and Ian-Kuon- Lam, Luis Gozaga Gomes (tr.): Ou-Mun Kei Leok (Monografia de Macau) (Macau: Imprensa Nacional, 1950).

Ludovico di Varthema, Folker Reichert (tr.): Reisen im Orient, Fremde Kulturen in alten Berichten 2 (Sigmaringen: Jan Thorbecke Verlag, 1996).

Geoffrey K. Wade (tr.) The Ming shi-lu (Veritable Records of Ming Dynasty) as a Source for Southeast Asian History; Fourteenth to Seventeenth Centuries, 8 vols., Hongkong 1994 (unpublished PHD dissertation).

Gerd W. W. T'ien-fei hsien-sheng lu, "Die Aufzeichnungen von der manifestierten Heiligkeit der Himmelsprinzessin," Monumenta Serica Monograph Series 29 (Netetal: Steyler-Verlag, 1992).

Watanabe Hiroshi, "An Index of Embassies and Tribute Missions to Ming China (1368-1466) as Recorded in the Ming

Shih-Iu, Classified According to Geographic Area". Memoirs of Research Department of the Toyo Bunko 33 (1975).

Paul Wheatley, *Analecta Sino-Africana Recensa*, in H. Neville Chittick, Robert I. Rotberg (eds.), *East Africa and the Orient. Cultural Syntheses in Pre-Colonial Times* (New York and London: Africana Publishing Co., 1975).

Paul Wheatley, "Geographical Notes on Some Commodities Involved in Sung Maritime Trade", *Journal of the Malayan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Vol. 32 (1959).

Paul Wheatley, "The Land of Zanj: Exegetical Notes on Chinese Knowledge of East Africa prior to A.D. 1500," in Robert W. Steel and R. Mansell Prothero (eds.), *Geographers and the Tropics: Liverpool Essays* (London: Longmans, 1964).

John Woods, "The Rise of Timurid Historiography", *Journal of Near Eastern Studies*, 46 (1987).

Sally Hovey Wriggins, *Xuanzang: A Buddhist Pilgrim on the Silk Road* (Boulder: Westview Press, 1996).

Sharaf ad-Din 'Ali Yazdi, Muhammad 'Abbasi (eds.), *Zafarnamah*, 2 vols (Tehran: Amir Kabir, 1958).

Abbas Zaryab, *Der Bericht über die Nachfolger Timurs aus dem Ta'rikh-i kabir des Gafar ibn Muhammad al-Husain* (Mainz 1960; dissertation).



John Gibson 氏 1760 年繪制的波斯海地圖